热风学术 网刊

夏 第13期

2019年6月

2019 年 6 月 夏季刊　第 13 期

目 录

热风学术月刊

点击文章标题 自动跳转至内容

4　编辑手记

7　内容提要

14　专题 _ 基本收入与后工作的未来

15　编者按

19　有保障收入在心理上的影响
埃里希 · 弗洛姆　（董牧孜 译 | 王行坤 校）

28　有保障的收入，或者，劳动与收入的分离
迈克尔 · 哈特　（柴晓明 译 | 王行坤 校）

37　后工作宣言
阿罗诺维茨、埃斯波西托、迪法齐奥、雅德
（牛颖 译 | 王行坤 校）

83　超越工薪制社会
安德烈 · 高兹　（郑双涛 译 | 王行坤 校）

132　工作之后
詹姆斯 · 利文斯顿　（董牧孜 译 | 王行坤 校）

特稿 _

155　意志上的悲观主义，智识上的乐观主义
劳伦斯 · 格罗斯伯格　（郝玉满 译 | 罗小茗 校）

（接下一页）

（接上一页）

殊音 _

164 **“社会 – 国家”复合体的建成和瓦解（1940s–1980s）**
王晓明

来稿 _

182 **形式美学：自动化思想中的想象、文本与图像**
李沐杰

现场 _

194 **校园仪式的模式与功能：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季**
文化研究讨论课记录 | 王敦 等

n 地域 _

215 **带着社会学视角的人生漫游笔记**
小乖

221 **这么远，那么近**
尹舒慧

书讯书评 _

229 **“业余者”：一群大马读书人的游离与驻扎**
李志勇

235 **马来知识分子：传统与当代挑战**
吴小保

242 **啊，青年！**
业余者

247 “n 地域”投稿指南

248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249 封面故事 & 网刊信息、下载方式

点击文章标题 自动跳转至内容

编辑手记

曾在本科通识课上介绍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构想，意在了解当代中国青年人，特别是二三流大学的学生们，对这样的构想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倒也并不意外，反对者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最集中的理由便是此举鼓励“不劳而获”，是纵容懒汉的糟糕举措。他们这样担心和反对着的时候，议论重点的倒也并非自己，而是如此一来“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办？”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现状良好。当被询问起今天中国最令他 / 她忧心的问题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把矛头指向了文化的凋敝、道德的滑坡。然而，要把这样的凋敝和滑坡，与自己对于基本收入的“本能反应”联系起来，思考当前社会中的“不劳而获”与实施基本收入而导致的“不劳而获”，究竟有何不同？到底哪一个对我们这个社会更糟糕一些？这些问题却似乎超出了他们的思虑范围。

类似的屁股和脑袋、脑袋和手脚、甚至于左脑和右脑的“分离”或“毫不配套”，不仅仅出现在当代大学生的身上，也是当代中国极为普遍又毫无自觉，或者说即便察觉也别无他法的社会常态。小到学校，大到社会，此类现象，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世界里，青年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自然沦为一对难兄难弟。理解力的匮乏，导致了想象力的衰竭，而想象力的不足，又反过来让理解力的缺损隐而不显。它们之间的包庇、纵容和掩护，好像智子一般，日益封锁起人们对于未来的热情，甚至于替他们径直取消了未来。

在此，特别感谢本期专题“基本收入与后工作的未来”特约编辑王行坤老师，和我们分享针对这一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这是在“天下苦‘996’久矣”的今天，打破封锁、给人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输送营养和底气的重要工作。相信大家在读完本专辑之后，对于即将出版的《后工作理论读本》会有更大的期待。

“特稿”刊发劳伦斯 · 格劳斯伯格在 2018 年 Crossroads 文化研究双年会上接受霍尔奖时的获奖演讲。显然，在格劳斯伯格看来，不管是左翼政治，还是文化研究，都不是每况愈下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法定避难所。躲在定见背后的思考，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愈发加速了这个世界的蛮荒。

“殊音”刊发王晓明教授的文章。经编辑部换位思考、严格审查后，有所删节，以较健康和谐的方式面世。阅读文章后，有兴趣了解更为整全的看法的朋友，欢迎移步《思想》第 37 期（台北，2019 年 4 月）。

此外，重点推介本期的“现场”和“n 地域”这两个栏目。

其中，“现场”《校园仪式的模式与功能：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季》一文，王敦老师带领学生，展开了关于大学品牌化、仪式化、大学空间和文化生产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提供了详细的案例和有趣的思考，更要紧的是，他们明确提出了明明处于当代中国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中的核心位置，但在 2003 年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大辩论之后，被一波又一波的量化考核弄钝了神经、搞坏了口味的当代社会少有关注、近乎放任自流的“大学应该具有何种文化”的公共议题。

“n 地域”提供的是，两位经过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训练的青年人，他们“入世”后的所感与所思。在此，特别感谢这两位

在学院之外继续思考着“文化研究”和自身关系的朋友，对工作议题的分享。也希望经由这一专栏（欢迎各位踊跃投稿），分享彼此的经验、困顿和教训，逐渐明确文化研究与“入世”之间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文化研究既不会让青年人的社会生活变得更艰难，也不会“无中生有”地创造或加重个人和社会 / 体制 / 老板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相反，文化研究努力教育人也帮助人，看清这个艰难时世，辨识个体与这个世界之间或可以和解或无法通融的基本问题，从而为一个真正独立而有意义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也恳请大家关注“书讯书评”的《业余者》。这是一份以马来西亚青年知识群体为主的不定期刊物。在当代中国的年轻人困于“996”和“佛系”之时，让我们感受一下不同社会里的年轻人，他们对责任和理想的思索，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活力。

《热风学术（网刊）》

2019 年 6 月 10 日

■ 内容提要

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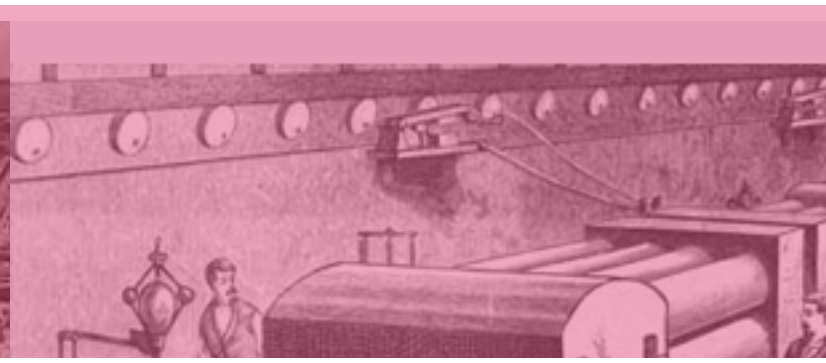
从匮乏的心理转向富足的心理，这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匮乏的心理令人变得焦虑、嫉妒和自我中心（这一点在全世界的小农文化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富足的心理则令人富于进取，对生命的团结产生信心。事实上，当工业社会迈向经济富足的新时代时，大多数人在心理上仍然停留在经济匮乏的时代。受制于这种心理上的“滞后”，很多人甚至不能理解有保障收入这一概念中体现出的新思想。这是由于人们的传统观念往往受到那些发源于早先社会存在形式的情感所制约。

——埃里希 · 弗洛姆《有保障收入在心理上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现在开始能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一种神秘化，即个人的劳动与价值之间会存在某种度量关系。我们从新的劳动和生产形式中看到的是，生产并不局限于工作日之中。生产的的时间逾越了实际工作的时间，实际上充斥了全部生活时间。工作日不再能够有效地度量所生产的价值。区分工作与休闲区的边界正在消解，或者如我更愿使用的说法，工作与非工作的边界正在消解。而且，越来越清楚的是，所生产的价值不再是个人化的，而是集体性与社会性的，因此无法再以任何单个个人或一组个人的劳动时间为标准进行认定与度量。

——迈克尔 · 哈特《有保障的收入，或者，劳动与收入的分离》

专题



依靠权力、“世界领导人”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充满激进参与式民主和公共责任伦理的世界。不工作的未来说明任何资本主义市场都不可能终结苦难。“没有工作的未来”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公共责任伦理，人们明白有工作需要完成，人人都有义务分担相关工作。

——阿罗诺维茨、埃斯波西多、迪法齐奥、雅德《后工作宣言》

对于足够、普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的需求符合这样的愿景。它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我们必须在概念上进行论述，并从现在开始就为此做好准备。这个观念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它反映了蕴藏在当前发展背后的最基本和最先进的意义。相反，它昭示出了当下体制的无意义，一方面空前节省了工作时间，但另一方面却让节省下来的时间成为劳动者的灾难，因为这个体制既不能分享时间，也不能分享生产出来的或具有生产性的财富，也不能认识到从事“更高级活动的闲暇和时间”（马克思）的内在价值。

——安德列 · 高兹《超越工薪制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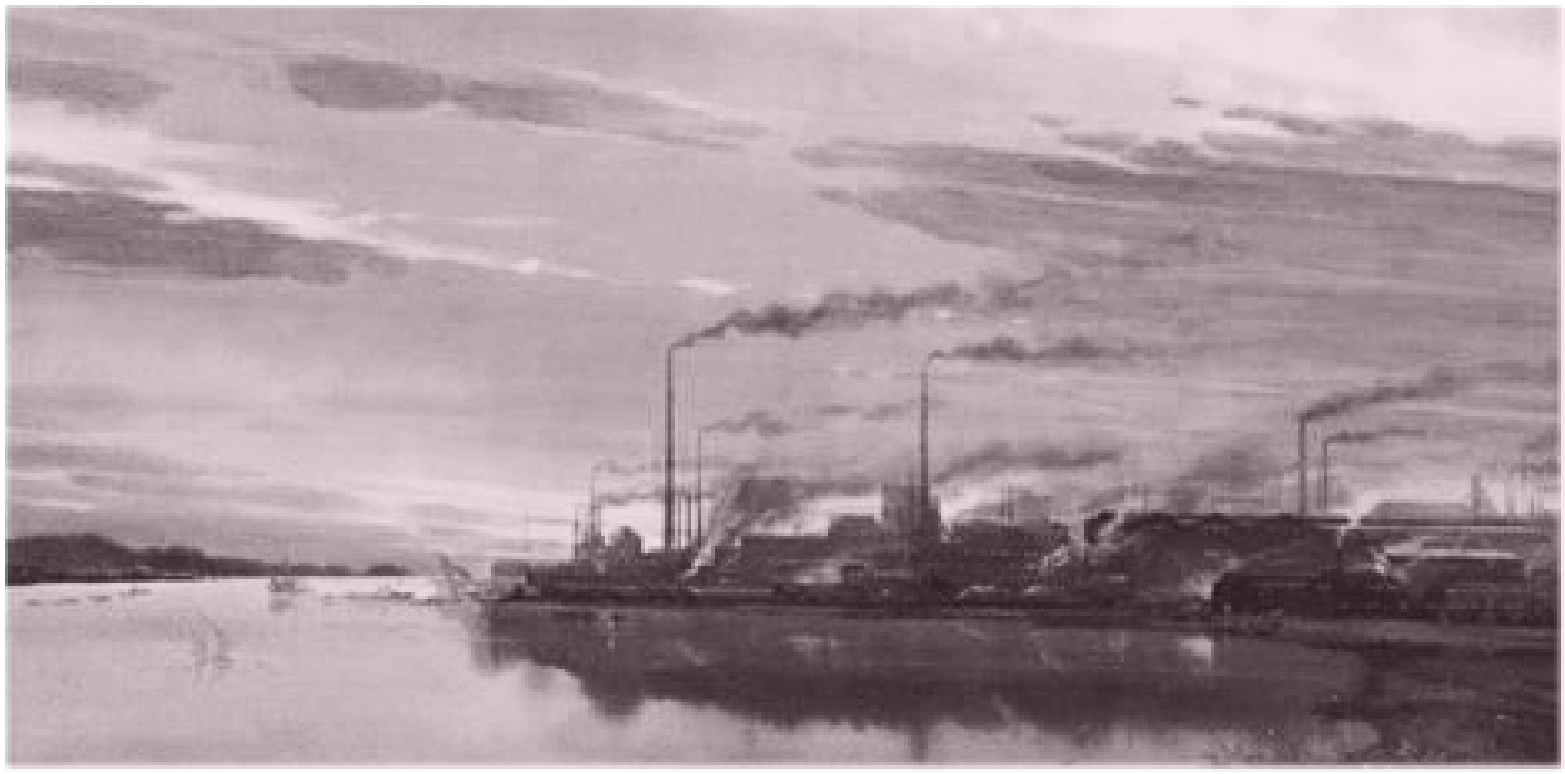
特稿

我想要指出，文化研究正在太过轻易地弃守三个阵地，而它们本是文化研究真正能够有所贡献的领域。

——劳伦斯 · 格劳斯伯格《意志上的悲观主义，智识上的乐观主义》

图片来源：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塗鴉。攝：Alberto Pizzoli/AFP。
2019年6月10日 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427-opinion-zhangyueran-luosihang-Gramsci/?utm_medium=copy

殊音



在各地的生物——不仅是人类——世界愈益密切地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小国寡民”式的自足状态是很难维持的，大型的公共权力因此就不可避免；即便“愚民”状态如巨厚的冰层难以打破，“劳心者治人”的精英政治模式终究不是未来该有的选项，只有实现了民主，世界才能安稳：如果这两个判断大致不错，如何创造真正指向民主的公共权力，在运用和改造这种权力的过程中，锻炼和发展公众——而非只是其精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形成指向民主的公共权力与公众的民主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应该就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吧。

——王晓明《“社会－国家”复合体的建成和瓦解（1940s-198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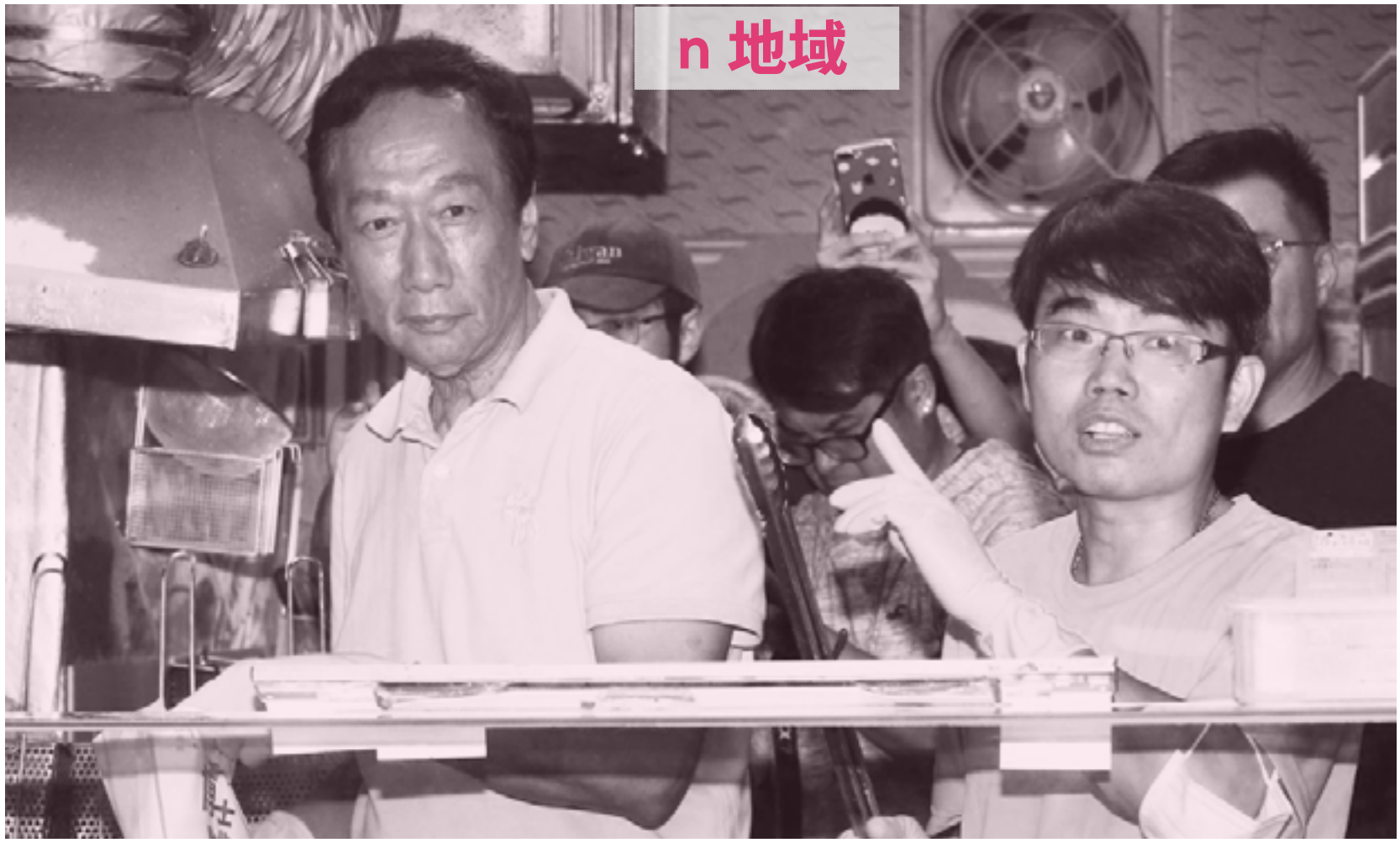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降仙的晚霞”，郑永万（1973）。

现场

在中国待的时间足够长了之后，发现中国的仪式还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做戏的成分与国外似乎又还有些不同。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戏？好像除了商业和大学要维系自己的品牌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就业形势以及进入大学之后整个社会空气的压力，使得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有一些想法……各种因素使得校园仪式具有意识形态化和“维稳”的意味在其中。

——王敦 等《校园仪式的模式与功能：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季》

图片来源：2019年6月10日取自 https://www.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11927/2018/20180708115225056698571/20180708115225056698571_.html



这一路的转折似乎是许多偶然的组成，但又仿佛是必然历经的过程。我大学期间学得的文字能力的基础功，参与草根社以及就读社发所奠定的待人处事的方式与价值观，在一次次人生的重大抉择与职涯转换时，就像是无形的指南针般隐约地为我指引着方向而不至于迷失。即使碰到困难，也比较能看清问题的结构以及自己处于何种位置，而不至于沦为个人命运注定论的自怨自哀。

——小乖《带着社会学视角的人生漫游笔记》

在经历了工作上初期的不适应后，工作上逐渐变得得心应手。以往被培养的表达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乃至持续学习的能力都使我受益良多。照说对这种顺利，自己应该觉得开心。不过在开心的同时，会有另一轮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轻易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

我会为一个文案终于通过，一篇文章的转发数据很好，一本书在排行榜的排位上升而升起雀跃之情，而在这种时候偶尔也会与自己拉开距离，去审视自己究竟是在为什么而开心。不能让表面的数据来代替思考、代替意义。

——尹舒慧《这么远，那么近》

图片来源：2016年6月10日 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25/3805804. 郭台铭与台湾博士鸡排。

书讯 书评

“业余者”当然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而仅是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学徒，并且念兹在兹的疑问是：身在马来西亚，未必受过良好和专业学术训练的“读书人”，到底在当今马来西亚社会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李志勇《“业余者”：一群大马读书人的游离与驻扎》

图片来源：2016年6月10日 取自“业余者”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amateursaid/photos/a.1195191207180005/2323548651010916/?type=3&theater）。

专题

基本收入与后工作的未来

返回目录

编者按

王行坤 *

天下苦“996”久矣！ 2019 年 3 月 27 日，一个名为 996ICU 的项目在 GitHub 上传开，程序员们在线上揭露并且抵制实施“996”制度的互联网公司。所谓“996”指的是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工作制度。这种严重违反劳动法的制度在中国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了五年之久，极大地损害了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场反 996 运动在网上大有燎原之势，劳动者（不限于程序员）中恣意诉苦者有之、冷静算账者有之、出谋献策者亦有之。一场基础广泛的线上反 996 运动就这样展开了。

在我看来，反 996 运动不仅仅应该是程序员的诉求，因为中国的非农劳动者普遍存在过劳状态，有些行业的从业者的工作时间甚至比软件开发要多得多。[1] 另外，运动的诉求也不能仅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因为这只是最低纲领。另外，在以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日益取得霸权地位的当下，我们的劳动时间已经溢出了工作场所。就算我们争取到了朝九晚六的工作制度，如果资本的力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在工作场所之外依然要或主动或被动的去操心工作。换言之，最根本

*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据统计，2016 年中国的平均周劳动时间为 46.1 小时，排在前列的行业分别为住宿和餐饮业（50.5 小时），批发和零售业（48.9 小时），建筑业（48.1 小时），制造业（47.7 小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47.7 小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周工作时间为 43.4 小时，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7》。

的不是工作制度，而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对自己时间所享有的主权。只有在工作场所之外掌握时间主权，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自由。这是我所说的“时间的政治”。

若要展开这种时间的政治，我们就不能不对工作场所进行另类的组织，不能不去反思我们一直以勤劳为冠冕的工作文化，不能不去反思工作（这里专指受雇于资本的劳动）在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这正是本专题所致力于厘清的问题。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短文《有保障收入在心理上的影响》虽然写于 1960 年代，但其关于有保障收入的思想在 1955 年出版的《健全的社会》中就已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业革命以来所谓自由的雇佣劳动不过是一种雇佣奴隶制，雇佣劳动者有的只是形式上的自由，他们“自由地一无所有”，被饥饿所驱使，只能“自由地”选择为这个或那个资本家而卖力。[2] 对此弗洛姆并没有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让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化，而是采取理论迂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先保障所有人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体面收入的权利，让饥饿不再成为人类自由的威胁，从而可以让每个人都不再为毫无意义的工作所束缚，可以追问更深的意义，探求更高的价值。

当然，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它关键的征程还有：从消费的最大化转向消费的最优化，从非理性生产走向理性生产，真正的民主参与等。但是弗洛姆也认识到，不工作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伦理——两者都相信“不劳动者不得食”——都有所冲突，对此他给出的是伦理上的辩护。

2　雇佣劳动者属于奴隶的思想也为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所分享，例如昆廷•斯金纳就指出：马克思对新罗马政治词汇的使用，让我非常吃惊。他谈及雇佣奴隶，也谈及无产阶级专政。他坚持认为，如果你只有出卖劳动（其实应该是劳动力，引者注）的自由，那么你就完全不自由。他指责资本主义是一种奴役形式。这些观念其实都是新罗马的道德观念。见 Richard Marshall and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Liberalism and Surveillance:a historic overview,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pendemocracyuk/liberty-liberalism-and-surveillance-historic-overview/。对激进共和主义与劳工运动之间关系的梳理，见 Alex Gourevitc, *From Slavery To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Labor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迈克尔·哈特则是基于历史发展即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在《有保障的收入，或者，劳动与收入的分离》一文中解释了为何那些看似不工作的人也在劳动，也应该享有收入。这个论断在大多数人都已成为网民、都在为大数据添砖加瓦的当下，日益被证实。我们都在贡献“免费劳动”，如“建造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建造虚拟空间”等。在人工智能时代，免费劳动的形式将从线上扩展到线下，出行、购物、娱乐、交往甚至睡眠等日常活动的踪迹都将可能直接转化为数据，被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垄断平台，经过处理后用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因此，全体人口都将可能成为标签数据的生产者。[3] 当然，哈特也并没有停留在有保障收入的诉求，而是期待诸众可以发展出外在于雇佣关系的社会创造和生产活动，如此才能让所有人分享在社会中所创造出的共同财富。

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与其他人在1990年代所合著的《后工作宣言》针对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中产阶级的萎缩”和“工作的两极化”（好工作愈来愈少，坏工作愈来愈多）——这种趋势在当下也愈演愈烈——正如作者们所指出的，“二十一世纪是后工作(post-work)的时代：是自动化和工作重组快速取代人力的时代。”从今天来看，阿罗诺维茨等人所预言的趋势并无扭转的迹象，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多行业从业者的境况变得岌岌可危，新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大都是低端服务业[4]，收入低、福利少（或者没有）且极不稳定，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有些人面对逐底竞争时，不得不过度工作或者工作至死，有些人则无所事事，或者只能从事短期的低收入合同工作。但这并不是未来的必然。

我们需要想象另类的未来，这就需要我们对工作有另类的想象。

3　见夏永红：“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与正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2 期。

4　关于当下的就业趋势，见王行坤，房小捷：《狗屁工作、劳动分工与后工作的可能——以中国调查数据为基础的考察》，未刊稿。

《后工作宣言》的结尾、安德烈 · 高兹的《超越雇佣社会》以及詹姆斯 · 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的《工作之后》都就如何对雇佣工作进行根本改造甚至消灭[5]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在工作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将我们身心掏空[6]的当下，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期文章也收入了我和徐志伟教授所合编的《后工作理论读本》中，希望这本书能够早日付梓。另外，新一辑的《热风学术》也将推出对工作和劳动进行反思的专题，敬请关注。最后，我要感谢本期文章的译者：董牧孜、柴晓明、牛颖和郑双涛，希望这组文章能够推进我们对工作文化的反思，为争取**善好生活**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

5 “消灭工作”或者“消灭劳动”的说法看似难以接受，其实青年马克思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的著作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2 卷，第 254-55 页。马克思特意将劳动打上双引号，或者使用斜体标示（中文翻译用黑体），所指的是异化劳动，对于异化劳动当然不能解放。马克思反对“解放劳动”这个说法：“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已经是自由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3 卷，第 223-24 页。这并不意味着在消灭此种劳动之后，人类就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意味着在共产主义阶段，劳动将不再呈现为阶级社会所表现的形式（“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是在质上出现了根本的变化，成为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所说的能够展现人类自由本性的感性的人类活动，成为《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劳动将成为*劳动*，或者高兹所说的多元活动。

6 在英语里用 burnout（倦怠）来形容当下的工作社会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正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不无夸张地所指出的，“（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存活变成了至关重要之事。它不再关心（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善好的生活。……对善好生活的关系让位给要存活下去的歇斯底里心态。”Byung-Chul Han, *The Burnout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50。韩炳哲将这个论断作为全称命题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日益增加的不稳定劳动者和不断下沉的中产阶级的确面对这样的困境：存活下去的歇斯底里心态。

有保障收入在心理上的影响 [1]

■　埃里希·弗洛姆 *

董牧孜** 译　　王行坤*** 校

本文将专门集中讨论有保障收入在**心理层面**的影响，还包括它的价值、风险及其给人类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接受有保障收入这一概念，最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自由。[2] 有史以来人的行为自由始终受到两种因素限制：统治者对于暴力的使用（究其本质乃是杀死异见者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一点：饥饿威胁着那些不愿被迫接受工作条件和社会存在的人。

任何人若是不愿意接受这些工作和社会条件，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即使没有其它暴力加诸其身。一条普遍原则贯穿了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如是，苏联亦如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威胁迫使人们不单要在行为上符合社会要求，还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与之相符，不会做出出人预料的举动。

---

*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寻找自我》、《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使命》、《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等。

**　董牧孜，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哲学硕士，曾任香港01哲学频道记者，现任《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

***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译者注：本文最早收录于罗伯特希尔博德（R. Theobald）主编的专著《有保障收入：经济演化的下一步？》（*The Guaranteed Income: Next Step in Economic Evolution?*）（纽约：双日出版社，1966 年），后重印于弗洛姆的文集《论不服从》（*On Disobedience and Other Essays*）（纽约：西巴利出版社，1981 年）。

2　可参阅我在《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一书中对于“普遍生存保障”（universal subsistence guarantee）的讨论（纽约：荷尔特、莱茵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55 年，第 355 页以后）。

过往的历史建基于饥饿威胁的原则之上，这一事实归根结底是源于以下事实：除非在原始社会，人们始终处于稀缺匮乏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和心理上都是如此。在过去，从没有过足够的物质产品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通常只有一小部分“领导者”（directors）才能得到他们所欲所求的一切，许多不能坐享其成的人则被告知：这是上帝意志或自然法则，理应如此。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并非“领导者”的贪婪，而是物质生产力的低下。

有保障收入在经济富足的时代成为可能。它将第一次使人类从饥饿的威胁之中解放出来，继而可以无视任何经济威胁，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再不会有人仅仅由于惧怕饥饿而被迫接受某些工作条件——有才华或有抱负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学习新技能，为投入不同类型的事业做好准备。妇女可以撇开她的丈夫，青年人可以离开他的家庭。当人们不必害怕挨饿，也将学会不再恐惧。（当然，这情形只适用于一定的条件，即没有政治上的威胁会压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自由。）

有保障收入不但要使自由成为现实而非口号，还将建立一种深深根植于西方宗教和人道主义传统的原则：无论如何，人拥有生存的权利！生存权，即享有食物、居所、医疗护理、教育等的权利，此类固有人权无法被任何条件所限制，甚至不必然要求那人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匮乏的心理转向富足的心理，这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匮乏的心理令人变得焦虑、嫉妒和自我中心（这一点在全世界的小农文化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富足的心理则令人富于进取，对生命的团结产生信心。事实上，当工业社会迈向经济富足的新时代时，大多数人在心理上仍然停留在经济匮乏的时代。受制于这种心理上的“滞后”，很多人甚至不能理解有保障收入这一概念中体现出的新思想。这是由于人们的传统观念往往受到那些发源于早先社会存在形式的情感所制约。

有保障收入所引发的进一步影响在于，伴随着工作时间的日益减少，人类生存的精神和宗教问题将变得真实而迫切。迄今为止，人们始终忙

于工作（或着说人们下班之后已经太累），以至于无法严肃地关切这类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有什么信仰”“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是谁”，诸如此类。假如人们的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再是工作，他就能自由地直面这些严肃问题，不然他就会被那种直接或间接的单调乏味逼得半疯。

综上而言，当我们获得经济上的富足，并从对饥饿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时，这情形将标志着前人类（prehuman）社会向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过渡。

为了权衡这一图景，我们有必要提及那些针对有保障收入概念的反对与质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有保障收入是否会降低人们工作的动机。

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大量增长的人口了，因此对于这些人而言，工作动机的问题可谓无关紧要。但撇除这种情况，激烈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将物质激励当做了努力工作的唯一动力。当然还存在其它的工作动机，比如内心的自豪感、社会认可以及工作本身的乐趣等等，这种情形不乏其例。在这里我援引一个最易于理解的例子，就是科学家、艺术家等的工作，他们的杰出成就并非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而是基于各种因素的混合：其中最关键的是他们对于所从事工作的兴趣；还有他们对于自身成就的骄傲，或是对于赢得声誉的渴望。不过即便如此明显的例子也不见得令人全然信服，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些卓越之人之所以会付出此等非凡的努力，正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他们无法代表普通人的状况。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不具备伟大创造者那般杰出品质的人们，想一想他们的行为动机，就会发现此类反对意见似乎不够充分。在体育运动的各个领域之中，在各式各样的兴趣爱好之中，人们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却不是为了追求任何的物质激励！梅奥（Mayo）教授在对西部电气公司芝加哥

霍桑工厂的经典研究中首次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工作过程本身的兴趣是如何成为了激励工作的关键因素。[3] 事实上，当那些未受过技术训练的女工被吸引到以她们为主体的、关于工作生产力的试验之中时，她们变成了这场试验中的兴趣者和积极参与者，结果是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她们的健康状况甚至也因此得以改善。

若是考虑到更早期的社会形式，工作动机的问题就显得愈发清晰了。传统的普鲁士公务员以工作效率和品质廉洁著称，尽管他们实际上所得的报酬相当低。在这种状况下，荣誉、忠诚和责任等观念才是高效工作的决定性动力。如果我们再参考前工业化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或者本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会）的状况，那么其它的工作动机因素也得以显露。在这些社会中，比如说木匠，他们赚钱是为了满足自己惯常的生活水平，并不会为了赚取超出所需之钱而去做额外的工作。

其次，就事实而言，人的本性并不懒惰；恰恰相反的是，消极无为会让人难以忍受。人们或许愿意一两个月不开工，但绝大多数人会恳求获得一份工作，即便他们无法从中取得什么报酬。儿童发展研究和精神疾病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信息。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些系统化的研究，从“懒惰作为一种疾病”的观点出发来组织和分析现有数据，并在相关的新调研中收集更多资料。

无论如何，假若金钱不是工作的主要动机，那么工作本身的技术因素或社会因素就要足够有吸引力和趣味，胜过消极无为所带来的不愉快。异化的现代人深切地感受到无聊（常常是无意识地），因此他们更渴望懒惰而不是活跃。这种渴望本身就是一种“正常的病理学”（pathology of normalcy）的症状。我们可以假设，人们对于有保障收入的误用现象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正如我们可以假设当糖果免费供应几周之后，人

3　参见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The Human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第二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6 年）。

们就会停止过量吃糖。

另一种反对意见如下：消除了人们对于饥饿的恐惧，真的会令人变得更加自由吗？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有一部分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或许恰恰就是那些害怕丢掉工作的人，比方说那些一年赚 15,000 美元的人，如果他们失去工作恐怕就会挨饿吧？如果这一异议是有根据的，那么有保障收入会提升社会大多数人的自由，而不是增加那些中产或上层阶级的自由。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这种异议，我们需要思考现代工业社会的精神。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已经将自己改造成为**消费人**（homo consumens），他们贪婪而被动，并透过持续不断且与日俱增的消费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这种机制有很多临床实例，比如透过暴饮暴食、过度购买、过量饮酒来应对抑郁和焦虑）。他们消耗香烟、酒、性、电影和旅行，也消耗教育、书籍、讲座和艺术。他们**看似**活跃而“激动”，但内心深处却感到焦虑、孤独、压抑且百无聊赖（无聊可以被定义为那种能够透过消费得以成功补偿的慢性抑郁）。二十世纪的工业主义创造了这种新的心理类型：**消费人**。这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也就是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受到广告的刺激与操纵。不过，一种人格类型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满足感日益增长的原则似乎成为理性而现实的了。[4]

当代人对日益增长的消费抱有无限的饥渴，这造成了一系列后果：如果消费的贪欲不被限制，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哪种经济能满足每一个人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只要**消费人**的性格结构占据支配地位，就

4　这一问题因下述事实而变得愈发复杂：在美国，至少有 2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在欧洲的部分区域，尤其是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准仍然不尽人意；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大多数人口几乎还不能达到吃饱的程度。任何要求减少消费的论述都会遭遇这样的反驳：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需要更多的消费。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也存在危险，即使对于现今尚属贫困的国家亦是如此：最大化消费的理想引导着人们的努力，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因此就算最优化（不是最大化）的消费已经实现，最大化消费的理想依然会持续发挥作用。

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富足”（从心理学上来讲）。对于贪婪的人而言，匮乏永远存在，无论拥有多少，他都不会感到充足。此外，他还会对其他每个人都怀有一种垂涎或竞争之感，因此他基本上是孤立和惶惶不安的。他无法真正地欣赏艺术或其它文化刺激，因为他从根本上是贪婪的。这意味着那些靠基本收入保障为生的人会感到沮丧和毫无价值，而那些赚得更多的人依旧是环境的囚徒，因为他们感到害怕，害怕会丧失最大限度消费的可能性。针对以上原因，我相信若是不能改变消费最大化的原则，那么有保障收入也只能解决某些问题（经济和社会层面），而无法带来那些它本应具备的激进影响。

那么，要实现有保障收入该采取何种措施呢？一般来说，我们的消费体系必须改变，从最大化消费转向最优化消费。这意味着：

要实现工业上的巨大转变，就要从以个人消费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转向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学校、剧院、图书馆、公园、医院、公共交通、住房。换句话说，重点生产那些作为个人展开其内在生产性和积极性之基石的商品。可以表明的是，**消费人**的贪婪主要指向个人消费之中所“吃掉”（吞并）的东西；而免费使用的公共设施虽能使个体享受生活，却不会因此而激发贪婪。从最大化消费到最优化消费的改变，需要配合生产模式上的巨大转变，比如大量降低广告之中刺激欲望的洗脑技巧等等。[5] 这种变化还要与文化上的巨变结合起来：复兴生命、生产力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反对“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6] 和那些被操控的蚁群般的人群所奉行的物质主义。

这些考量还引发了其它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存在客观有效的标准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需求、好需求与坏需求，或者说，主观感受到的需

5　在我看来，倘若没有国家政府大范围干预，诸如限制广告，甚至将生产方向转为建设更多公共设施之类的需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6　指依附于组织没有创造性的人，这是威廉·怀特在同名专著中的概念。——编者注。

求是否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好”在这里被定义为能够增进人类活力、意识、生产力和敏感性的需求；“坏”则是指那些会削弱或麻痹此类潜能的需求）。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一些情况加以区分，比如吸毒成瘾、暴饮暴食和酗酒等。研究这些问题会引发以下的实际思考：个人最低限度的合法需求是什么？（举个例子：一人一个房间，大量的衣服和食物，还有多种具有文化价值的商品，比如收音机、书籍等）。当今，在美国这样相对富足的社会中，应该很容易计算出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是什么，弄清楚最大限度的消费会有多少。可以考虑对超越一定限度的消费征收累进税。在我看来，贫民窟那样的生活条件应该避免。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有保障收入的原则连结着我们的社会转型，即从最大化消费转向最优化消费；也连结着我们的生产转型，即从为个人需求而生产转向为公共利益而生产的巨变。

我相信有保障收入的概念之中还应加入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这一观念同样需要加以研究：免费消费某些特定商品。首先是面包，其次是牛奶和蔬菜。让我们假设一下，在某段特定的时期内，所有人都可以去面包店拿取他所需要的面包（国家会向面包店支付制作面包的所有费用）。如前所述，一开始人们的贪婪会致使他们拿取过量的面包，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贪婪消费”就会恢复正常，人们只会拿取他们真正需要的面包。在我看来，这种免费消费会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一种新维度（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是对特定原始社会之中消费模式的高级版重现的话），人们将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中解放出来。这种免费消费在展开初期甚至可能构成一种关乎自由的新奇感受。政府可以透过相应的税制，轻而易举地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面包，即便那些不是经济学家的人都觉得这个道理显而易见。然而，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假设我们不但可以免费获取面包、牛奶和蔬菜等最低限度的食物需求，而且连最低限度的衣物需求也会得到满足（比如说在某些系统下，每人无需付款就能每年得到一套衣服、三件衬衫和六双袜子）；交通是免费的，私家车则要越来越贵——当然这需要极大地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最终，我们

也可以设想透过同样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大型的住房规划会为年轻人提供卧室，为老年人或夫妻提供小房间；人们不必支付任何费用就能选择这些房间。这促使我建议借助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有保障收入的问题，也就是以免费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来取代现金支付。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连同极大改善了的公共服务，将促使生产不断发展，正如有保障收入的支付一样可以持续运作。

这种方法或许会因较为激进而遭到人们的反对，不像其他作者的建议那般易于接受。或许的确如此。但不能忽略的是，一方面，免费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这一方法在理论上是能够与现存制度相协调的；另一方面，很多人无法接受有保障收入的概念并不是因为它难以实施，而是因为在心理上抗拒废除“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我们还需要研究另一个哲学、政治学及心理学上的问题：自由问题。西方的自由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由占有和使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只要他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即可。实际上，西方工业社会的这一原则已经在很多方面被侵蚀了，税收是一种征收形式，也是国家干预农业、贸易和工业的方式。与此同时，作为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也日益被大公司典型的的半公共财产（semipublic property）所取代。尽管有保障收入的概念意味着额外的政府调控，但有一点不能忽略：在今天，普通人的自由观念与其说是占有和使用私有财产（资本）的自由，倒不如说是凭喜好进行消费的自由。现如今很多人觉得无止境的消费若被限制，那他们的自由就等于遭到了干涉，尽管实际上只有那些上层阶级才真正拥有选择的自由。同类商品及不同商品的品牌竞争创造了有关个人自由的幻象，但实际上，个体也只能欲望他们在有限条件下有资格去欲望的选择罢了。[7]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解决自由问题的新方法，只有将**消费人**转化为生产性的、积极的个人，人们才能在真正独立的意义上感受自

7　在这方面，苏维埃阵营国家的消费极权主义官僚化对任何的消费监管都造成了糟糕的影响。

由，而不是仅仅在商品的无限选择中理解自由。

有保障收入的原则只有与以下几种情况同时出现，才会起到完整的作用：(1) 改变消费习惯，即从**消费人**转变为生产性的、积极的人（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2) 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态度，即人道主义的态度（不论是以有神论或无神论的形式）；以及 (3) 复兴真正的民主方式（比如，建立新型的下议院，这个议院的所有决策，都是综合和统计成千上万个团体面对面讨论的结果，活跃参与其中的全体成员分别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作者）。[8] 国家政府由于养育全体社会成员，它有机会变成具有独裁性质的圣母，因此只有在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同步大幅推动民主进程，这种危险才可能被克服（事实上，即便在如今，国家仍然极其强大，虽然它并没有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

总之，我们在展开有保障收入的经济研究时，也要着手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心理学、哲学、宗教学和教育学方向。在我看来，只有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变同时展开，有保障收入的大步跃进才会成功。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只有我们停止将 10% 的财力投放到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军备武器上时，有保障收入才有可能成功。如果我们停止传播无谓的暴力，为那些欠发达国家提供系统性的帮助，如果我们找到遏制人口爆炸的方法……假如没有这些改变，任何有关未来的计划都不会成功，因为我们根本不会拥有未来。

8　参考弗洛姆的著作《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荷尔特、莱茵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55 年）。

返回目录

保障的收入，或者，劳动与收入的分离

迈克尔•哈特 *

柴晓明 译　王行坤 校 **

近来关于福利问题的公众争论中最令人关注且在政治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劳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劳动与获得收入的权利之间的关系。1996 年（美国）的福利改革以及对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 program）的废除通常被明确地视为努力强化或修补劳动与收入之间社会联系。事实上，自从 1960 年代以来，可能甚至自从 1930 年代以来，对社会福利项目的主要批评就是针对如下事实：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之类的福利项目使收入与劳动脱钩。而且事实的确如此。这些福利项目的逻辑就是确保特定人群在特定阶段内有权享有一定的收入，尽管事实上当时他们并没有工作。就此而言，支持福利政策的观点一直以来就与如下主张背道而驰：收入应该与劳动相挂钩。1996 年的福利体系改革推出了各种工作福利制度（Workfare，领取政府福利补助的人群必须参加指定的劳动，译者注）本质上就是为了否定收入与劳动脱钩的观念，重新确立劳动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联。

那些抵制工作福利制度和相关命令——所有获得收入的人必须工作——的人通常接受了收入与劳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关注那些穷忙族的命运。有些人相当正确地提出，美国经济无法向所有人提供工作岗位，充分就业与经济的正常运转之间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还有人则会关注可获

*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是美国杜克大学助理教授（1990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1993年出版的*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hy* 一书的作者，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94年合作出版了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2000年合作出版了《帝国》（*Empire*）等书。他也与*Paolo Vimo*等1996年共同主编了《意大利激进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一书。

**　柴晓明，媒体人。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返回目录

得工作岗位的种类，而且也再次相当正确地观察到这些工作是多么有损人格和耗费生命，并且工作的收入少得可怜。这些推论就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另类的政治立场：是的，我们想要工作，但是我们希望得到一份能给我们提供体面收入与美好生活的工作。

这是一个符合逻辑且合理的政治立场，但是我想探寻一条不同的路径，一条并非基于劳动与收入之间关联的路径。事实上，我愿意用这样的说法来修正此前对于工作福利制度的回应：不，我们并不真地想要工作岗位，我们并不真地想要工作；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只是一份体面的收入。也许我们不必去接受这样的概念，即雇佣劳动是获取收入的唯一途径。或许我们也可暂且把与工作相挂钩的道德主义、其莫须有的昭示德性、塑造品格的能力置于一边。

我之所以对有保障收入的提议感兴趣，恰恰是因为它表明，与劳动脱钩的收入不是例外，而是常规。这当然会导致福利体制的毁灭，而且会彻底地改变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在这点上我完全赞同路西·威廉姆斯（Lucy Williams）的观点，她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福利的政治与雇佣劳动的政治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批判福利制度与批判雇佣劳动之间的联系。[1] 有保障收入的提议则是这种批判的现实后果。

考虑到当下美国的政治环境，有保障收入的提议似乎是空想性或者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一些看起来完全不现实的政治主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势在必行。现在在欧洲地区，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就存在大规模的关于有保障收入的争论。在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时期，政府内也有人提出了有保障收入的主张。从我的视角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有

1　路西·威廉姆斯（Lucy A Williams）撰写的“福利与法律权利：贫困的社会根源”（“*Welfare and Legal Entitlements: The Social Roots of Poverty*”），发表于由大卫·凯利斯（David Kairys）编辑的 1998 出版的《法律的政治：一个进步的批判》（*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第三版）一书。

返回目录

保障收入的提法，无论其是否过于空想，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功效——迫使我们去质疑所谓的工作伦理、我们对于工作所赋予的道德意义、重新评估非工作的社会价值与产出，即我们在雇佣劳动之外的创造性活动。

明确地论述有保障收入或者基本收入的内体内容，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大概说来，我所认为的有保障收入是给社会中所有人发放的收入，让人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许更合适的称呼是公民收入。无论是否工作，公民都会得到这笔收入，从雇佣劳动中获取的收入或者其他来源的收入与此无关。但在这里，对我们更为重要的不是这种方案的具体内容，而是其根本性的理论认识：让收入与劳动相分离。

劳动与收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劳动与收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如果我们着手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财富分配的方式，例如基于亲属关系、社会威望和以及其他方式，将会非常有趣且有用，但我们绝非是想要摹仿这些模式，只是想要证明，我们社会所认定的劳动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一分析将揭示出，收入基于劳动的量和质这种观念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中，人们将收入的等级理解为与劳动和生产力水平相匹配的机制。（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与这种资本主义观念是若合符节的。）

“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基本法则。劳动赋予了我们获得收入的权利；贫困与饥饿是迫使我们遵守工作伦理的恐吓之鞭。而根据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个体的劳动时间与生产力是决定收入等级的标准。正如过去的口号所说，“等量劳动获取等量产品。”对于这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收入观念的反证，我

返回目录

们可以回到福利制度问题上。正如我所说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这一规则的例外，而且是促成废除这一（劳动决定收入）的意识形态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更一般来看，我们可以说获取收入的权利或资格正如其他权利一样，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恰恰因为这就是构成这些权利基础的功能性逻辑，我认为批判性法学研究中最强有力的路径就是通过劳动权，即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逻辑。换言之，有些人提倡公民收入、或者获得与劳动相分离的基本收入的权利，是基于超越于资本之外的逻辑基础。例如，有些人主张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是因为我们有慈善之心或者是因为我们对穷人负有社会责任。另外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所有以保证收入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方式。而我是基于劳动权的观念和资本自身的逻辑而支持公民收入的。换言之，我主张现代经济的转变——如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非物质劳动形式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社会工作日的转变——让劳动权转变为与工作相分离的基本收入。通过关注当下劳动与生产本质的变化，我想厘清资本的逻辑，展开逻辑推论，并最终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我们需要对近来资本主义生产与劳动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分析。当然在此我只能在非常理论的层面给出几个粗略说明。[2] 我所提及的整体的经济变化可归纳为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向以信息与服务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的转变。在这种新的范式下，工作岗位的有效期更短，而且要求更灵活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工作整体上的特征是知识、信息、交往与情感等起到关键作用。换言之，虽然我无法在此确切地说明，但我的主张是在当下的经

2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劳动近来变化的一个整体前景分析，可参考罗伯特·瑞希（Robert Reich）1996 年撰写的《国家的工作：为 21 世纪资本主义做好准备》（*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1996) 和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1996 年撰写的“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关于非物质性劳动的定义与分析可以参考由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 1996 年共同主编的《意大利激进思想》中由马里齐奥·拉扎雷托（Maurizio Lazzarato）撰写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章节，以及哈特所写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见 boundry 2, Vol.26, no. 2, Summer 1999。

返回目录

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是我所称之为的非物质劳动——知识劳动、信息劳动、交往劳动、情感劳动等。这一描述也许会立即让人想起符合这一范畴的高层次工作，如软件程序工程师、医疗健康专业人员：软件工程师主要是处理知识与信息，而医疗健康专业人员很大程度上从事的是情感劳动，旨在创造出美好生活的感受。但是我将这种非物质性劳动的概念也应用于低层次工作，例如快餐行业工人。毕竟，情感很明显是他们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带着微笑的服务。我想强调的是伴随着经济的变化，一系列传统的经济分化消失了，结果导致经济度量的机制也随之消失。

在有着明确工作日的工厂体制内，资本家将个人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力与一定的收入水平相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在这一背景下，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与生产力至少看起来是可以通过量的标准而得到度量的。但是，当社会生产的中心逐步溢出工厂，我们从福特主义进入到后福特主义体制，并走向我所称之为的非物质劳动形式的主导，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界定和度量价值的生产就变得日益困难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开始能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一种神秘化，即个人的劳动与价值之间会存在某种度量关系。我们从新的劳动和生产形式中看到的是，生产并不局限于工作日之中。生产的的时间逾越了实际工作的时间，实际上充斥了全部生活时间。工作日不再能够有效地度量所生产的价值。区分工作与休闲区的边界正在消解，或者如我更愿使用的说法，工作与非工作的边界正在消解。而且，越来越清楚的是，所生产的价值不再是个人化的，而是集体性与社会性的，因此无法再以任何单个个人或一组个人的劳动时间为标准进行认定与度量。知识、信息、交往与情感都是通过社会和集体而得到生产，其结果就是，它们的价值无法以任何个人的劳动来度量。

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以嘻哈说唱音乐为主题所进行的广告宣传。将这种生产的源泉认定为某个具体的广告从业人员，并且用他 / 她在办公桌前所待时间来度量，这是否合理呢——而事实上这一创意是基于他 / 她前一晚上在俱乐部所听到的说唱音乐？另外把这一创意的生产归功于当晚在俱乐部里表演的饶舌歌手同样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个作品源自于某种音乐习俗和亚文化，而后者又是社会性与集体性地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在这样一个案例中，没有度量关系能够自圆其说地将价值与单个个体乃至一群个体的劳动时间勾连起来。

如果所生产的价值是集体性与社会性的，如果生产的时间弥漫全部生活时间，那么与生产相匹配的收入观念就无法局限于单个个体的工作日。而进行计算的合理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换言之，如果劳动是集体性与社会性的，那么收入同样也必须是集体性与社会性的。因此，如果将劳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推到逻辑终点，我们会得到社会收入、公民收入的概念，这反而吊诡性地废除了个人劳动与收入之间的任何关联。将劳动与收入勾连起来的资本主义逻辑失去了度量标准，除非在最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即与一般社会生产力相符合的一般社会收入——这样一来，收入也就与任何针对单个个人劳动的度量标准彻底分离了。

全球公民权

当我提出公民收入目标的时候，我也想质疑和解构作为基础的公民的概念。换言之，我想探究的是什么界定了这部分人口有权得到有保障的收入？何种逻辑将这种社会性收入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我的观点是，公民收入的主张应该与呼吁全球公民权的目标联合起来，因为两者都是基于正义与平等的概念，而且更是因为两者都推导自对当代劳动与生产变化的分析。虽然两者都源自于相同的逻辑，但是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结合不会产生新的效果。

返回目录

两者自身都是激进的政治主张，但是正如某些化学物质一样，两者各处一处的时候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如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则具有爆炸性。

基于非资本主义的逻辑，我们当然可以呼吁全球公民权，正如我们可以呼吁社会收入的权利一样。例如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圣谕”中宣称，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因此也是世界社区的公民，他将全球公民权奠基于我们共同的慈悲与友爱之上。[3] 但是一个更为有力的论述必须超越主导性的资本主义逻辑，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颠覆。公民权利，正如获取收入的权利一样，在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时代被视为劳动与生产的一个职能。一个国家的财富由其公民生产所得，反过来说，公民权利则奠基于劳动的贡献。因此，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往往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的需求紧密相关。当美国需要大量工人修建西部铁路的时候，就欢迎大量的中国劳工入境，而当其不再需要的时候，则禁止所有中国移民入境；同样的，当法国的汽车工厂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会欢迎马格里布的工人。劳动力为国民经济提供的生产力一直是取得公民权的基础。

但是考虑到近日来全球化的进程与跨国企业的迅速增多，也许不再有必要讨论什么国民经济。生产流通早已覆盖全球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一件商品的不同部件，如汽车或者计算机等，也许是由几个不同国家的工人生产出来的，而这（生产布局）又是由其他几个不同国家的资本投资所决定的。另外，在单个民族国家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共同生产。由此看来，已经不可能在个体工人的生产和单个国家的财富之间确立任何稳定的联系。当我们考虑到非物质劳动与后福特主义生产的不可度量性，这一计算就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当下的境况中，当我们遵循传统的资本主义逻辑，即公民权利来自于为国家从事生产，那么唯一合理的结论就

3　1963 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颁布的圣谕 （Pope John XXIII, Pacem in Terris: Encyclical Letter, Huntington Ind:Our Sunday Visitor, 1963）。

返回目录

是所有人都有公民权，因为作为整体的全球社会正在集体性地生产财富。

灾难与乌托邦

公民收入与全球公民权的提议可能会激发担忧与恐惧。有人会担心，有些人会靠有保障收入过活而选择不工作，穷国的居民会想来我们富国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全世界的穷人都会依靠我们慷慨的布施而无所事事地活着！这将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末日！好吧，这些对新的自由的恐惧也许被过度夸大了。抵制移民背后有很多原因，即使全球公民权普及时也依然会存在。我们每个人都通过情感网络、家庭关系、地理面貌和其他诸多因素而系于自己的故土。移民外迁一直以来不得不克服强大的抵制因素。

就有保障收入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当收入不再与劳动相挂钩的时候，我们会停止创造与生产。在生产与创造中存在巨大的愉悦，但总是会因为工作中的痛苦与乏味而消耗殆尽。正是有基于此，我认为将收入与劳动分离的提议对于摧毁工作的意识形态来说大有裨益。这将迫使我们认识到外在于雇佣劳动、存在于生产性活动中的价值和满足感。这将促使我们去模糊与摧毁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区别。

露西·怀特（Lucie White）对伊莱恩·普雷斯顿（Elaine Preston）的分析非常精彩，后者是一个靠福利维生的人。[4] 露西·怀特正确地指出，懒惰是普雷斯顿在面对各种各样糟糕选择时所采取的防御形式。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会说，懒惰是贯穿各种社会实践、对拒绝工作主张的表达。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罗宾·凯利对自己和朋友的描述：他们在麦当劳工作总是遵循有色人种的时间节奏（colored people’s time），人们将这种懒惰明确视为在整个美

4　露西·怀特（Lucie White）1993 再版（1961 年首版），《毫无出路：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福利依赖》（*No Exit: Rethinking Welfare Dependency for a Different Ground*），81 Geo. L.J. 1961 (1993)。

返回目录

国黑人工人阶级中非常普遍的的拒绝工作实践。[5]

这种通过有保障收入而得到强化的拒绝工作实践必须与如下的肯定行为相结合，即外在于雇佣劳动的社会创造和生产活动。因此，有保障收入的主张或推行并非目的，而只是这一最为重要任务的开端而已。

5　罗宾·凯利（Robin Kelley）1994 年出版的《种族反抗：文化、政治与黑人工人阶级》（*Race Rebels: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

后工作宣言[1]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 、道恩·埃斯波西托、威廉·迪法齐奥、阿加雷特·雅德 *

牛颖 译　王行坤 校 **

前言

底层正在下沉，一同下沉的还有我们的幸福感。两个世纪以来，尽管历经了经济萧条和战争，美国依然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金色大门”。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的临近，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工作减少、安全感丧失、希望和期望落空的国家。对于很多人来说，近期的经济和政治变动表明，“有前景”的舒适全职工作正慢慢枯竭。失业还导致了福利恶化甚至消失，包括曾有雇佣合同保证的优质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之类的保险，而在美国这些保障只得到了最小程度的实施。

如果任由现状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届时将只有少数人才能在没有经济担忧持续压力的情况下享受生活。其他人则将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工作中，为购买日用品甚至是维持生计而担忧，结果甚至连对另一种不同类型生活展开想象的自由都将越来越像是一种奢侈。我们越来越难以腾出时间进行反思、写作、感受周边了，当然也没有时间进行改变。我们所处的时代，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的雇主不断要求“退回福利优惠”[2]（give-backs），包括健康福利到养老金到节假日。随着寻找安全有偿工作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多，这种焦虑——而非经济——已经变得十分普

---

*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教授。道恩·埃斯波西托(Dawn Esposito)，圣约翰大学圣文森特学院的社会学副教授和副院长。威廉·迪法齐奥（William DiFazio），圣约翰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阿加雷特·雅德(argaret Yard)，社会学和护理学教授，在纽约市三家主要医疗中心任教。

**　牛颖，北京大学翻译硕士。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本文选自 Stanley Aronowitz 与 Jonathan Cutler 编写的 *Post-Work: the Wages of Cybernation* 一书，该书 1998 年由纽约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校者注。

2　工会术语，指的是削减或者取消工人之前所获得的福利。——校者注。

遍，焦虑将从事各种工作、属于不同阶层的人——从蓝领到中上管理层——团结了起来，而这是几个世纪来前所未见的。随着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开始瓦解，这种区隔并因我们时代发生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而变得越来越毫无意义，没人能置身其外。

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产业工人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外逃工厂[3]和技术变革的威胁。三十年前，劳动人民反抗的是雇主通过保持工资不变或削减工资或减少自由时间从他们那里榨取更多的劳动。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由于担心失业，这些劳动人民现在却默默忍受着更多的提速、强制加班和工伤事故（以免老板搬家跑路）。尽管统计数字显示经济正在增长，但合法工厂的工作岗位数量却仍在减少，而非法工厂的劳工却不断增加。而且，我们本以为血汗工厂已经永远消失了，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却目睹了血汗工厂死灰复燃。很多人在地下经济领域工作，其劳动“不计入账中”（off the books），他们每天工作 10 至 12 个小时，所得工资却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之下。这些血汗工厂为我们生产更多的服装和玩具，童工也重新出现。童工要么待在父母旁边劳动，要么单独劳动，他们经常遭到毒打，有的还被绑在机器上，锁在通风条件恶劣的房间中。

深受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产业工人或蓝领工人。医生为了赚钱在保健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HMOs）中工作，在成本削减的无情驱动下，他们正在失去对自己工作的控制。在保健组织这一新环境中，由经理而非医生来决定谁生病，谁没病，谁该得到治疗，谁无需治疗。很多其他专业人员也不得不屈从于紧锣密鼓的裁员行动。例如，作为一个群体，在拥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工作和在教室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方面，学者似乎比大多数人要更自由。但是，终身教职本身也不再安全，教职是有保障收入（guaranteed income）的一种形式，一种权利，无

3　指为逃避本地工会的要求而外迁的工厂。——校者注。

怪乎跟我们享受的其他任何保障一样，教职也开始受到威胁。当大学教育似乎已经转变为一张通向稳定工作的入场券时，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费也急剧上涨。不管上学是为了快乐还是作为一种展开事业的工具，由于学生援助快速消失，很多学生再也上不起学。公立机构学费的上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工人阶级的学生——其中很多属于少数族裔——需要从事一个或多个兼职或全职工作，结果就是剩下的学习时间寥寥无几。大学再次变成特权阶级的领域。

但是我们现有的发展方向也是有可能改变的。新方向将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控制更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我们仍然会生产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但是花费的时间将大大减少。要生产的还有很多：我们需要数百万间房屋，以可以负担的价格租给大家。我们的环境需要清洁、改善和维护；我们需要恢复已经停止的饮用水供应，我们需要降低污染水平。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孩子们需要儿童照管和娱乐活动。普通人也可以运营电视频道，与独立电影和视频制作公司一起，更加真实地参与当代媒体。社区将拥有自己的剧院、音乐厅、体育设施和集会场所。图书馆再次全天开放。人们也有时间去图书馆了。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很多相关服务都是免费或低价提供。更短的工作时间这一梦想看起来遥不可及，却有可能让我们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摆脱我们现在经常感到的压迫感。

我们是在走向自由还是地狱？公司、政府和教育“裁员”属于自然趋势，还是一些人为了特定目标刻意而为？我们能负担得起“自由”市场吗？能让 200 万人走上街头、上无片瓦吗？能让四分之一以上的美国人陷于贫苦吗？能让每年 100 多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吗？我们是否想要一种经济，压制 80% 工作人口的工资，继续向低工资国家输送工作岗位？这到底是谁的市场？当穷人不再领取“我们所知的福利”时，当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最终实现私有化时，中产阶级并不会真正受益。福利国家失去的那些雇员只会席卷劳动力市场，破坏私营部门中产阶级工人的议价能力。只有企业高管的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工资和股票期权雷打不动——尽管对于上述高管来说这些资产也不完全是安全的，而其余的工作岗位则将遭到削减或消灭。

这是怎么回事？“全球化”这个过度使用的术语对于一般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 1993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时，克林顿政府许诺美国工人得到工作岗位要多于墨西哥所夺走的岗位。但情况却恰恰相反。1995 年，墨西哥从美国工人那里夺走了 4 万多个工作岗位，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工人创造的新工作岗位却不到 1 万个。三大汽车公司已将汽车零件外包给边境工厂（border plants），工人的工资仅为每周 80 美元，而在美国，相同岗位工人的工资却为每周 400 至 500 美元。大量的工作正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取而代之的是临时工作、兼职和应急工作（contingent work），这些工作也被统计人员乐观地称为“工作岗位”。

此外，数字控制、机器人技术和激光技术在制造车间的应用，给很多美国生产工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例如大型企业兼并、小型企业被行业巨头吞并之类的组织变化，也削弱了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职业地位。现在计算机现已经成为每个办公室的必备工具了。语音邮件淘汰了秘书；新的软件包大大减少了公司对会计和记账员的需求。

对于成千上万的文员和技术工人们来说，计算机意味着他们可以把工作带回家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家工作一直被看成是一种削减工资的工具，而计算机的出现却让在家工作死灰复燃。有了寻呼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所有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此外，文字处理人员、编辑、电话销售人员，甚至是编程人员，如今也不再是稳定的工作，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合同工”（contractor），从事应急工作和没有福利的兼职工作。

这些合同工很少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健康保险、休假、节假日和养老金福利。这些人是企业家吗，还是没有福利的临时工，他们受到工作大量流失和不断降低的经济安全性的影响？

就算应急工作确实暂时爆发，经济增长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工作岗位真的增加。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笑话：“国家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我得到了其中 4 个”。然而事实是，今天的技术变革可被用来代替各种工人，包括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有几个例子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程序员发明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Aided Design, CAD），将工程师从制图等费时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设计上。如今制图专业已成为了历史：而讽刺的是，拜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所赐，工程师很快也失业了。

另一个例子是，今天的医疗保健体系由管理型护理（managed care）主导。1996 年，所有的被保险人中有 60% 采用管理型护理体系。管理型护理公司建议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用药物代替治疗方案，否则将对其进行惩罚，没收治疗费。不管对于病人来说是药物好，还是治疗方案好，之所以建议开药是因为药物的“成本效益”更高。在相关过程中，开药治疗可以为高薪的专业人员节省数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最终，兼并和收购导致了公司总部和研发机构大量裁员。毕竟，当两、三个组织可由一个组织代替，通信技术也可实现相同产出时，为什么要复制整个管理、技术、科学、专业和文职人员的阵容呢？今天，在金融服务领域或零售公司，五十岁的经理就像斑点猫头鹰一样濒危。

当几乎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与另一家公司兼并，当机器开始定期更换人力时，任何一位有工作的人能自信说他或她的工作是安全的吗？我们迎接的是好工作将会进入博物馆的未来吗？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同政客和经济学家关于伟大美国工作机器（Great American Job Machine）

运行良好的保证。消费者的信心从未如此高涨。但是工人工作的不安全状况同时被视为得到抑制的工资通胀的原因。

我们知道的是：就算统计数字显示失业率仅为 5%，大公司还是没有显示出不再毁灭岗位的迹象。仅仅是工作岗位遭到破坏的威胁（以及大规模裁员的生动形象）就让工人失去了平衡，导致过度工作和工资削减。就算政客和媒体声称经济正在好转，更多美国人从事的是被统计为全职工作的兼职、临时性和应急性工作。尽管麦当劳一类的零售连锁店在窗户上贴上了“员工招聘”的通知，工资依然停滞不前。根据人类学家凯瑟琳·纽曼（Kathryn Newman）最近的一项研究，在黑人社区或拉丁裔社区，麦当劳的每个工作岗位都会吸引 14 名应聘者。甚至是专业人员也被迫当起了“顾问”。一种没有福利、没有工作安全感的新兼职形式开始兴起。一些人可能认为美国的工作机器会像爆米花机那样吐出大量的低薪工作岗位。但在经济中心，大多数工作都会被绝望的坚硬内核卡住，就像爆米花机被硬物卡住一样。

我们必须看清以下事实，克林顿在执政期间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但其中至少一半的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很多甚至不能算真正的工作，只能算兼职、临时或应急工作，这几种工作甚至无法提供全面的健康、休假和养老金福利。尽管政客们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近二十年工资还是下滑了 20%。大公司付给总经理的薪酬以每年 8% 到 12% 的幅度增长，而大多数工人的薪酬增长率平均只有 2.5%，这一速度甚至赶不上通货膨胀。如果说在此期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没有出现下滑的话，也是因为双薪家庭已经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需要两份或三份收入才能赶上 20 年前一个人的收入。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之所以比以前赚得多，是因为很多人每周工作 60 至 70 个小时，而大多数产业工人必须十分努力才能维持生存。一些汽车工人每年能赚 9 万美元，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他们

没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本身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工资是不错，但是工作量太大了。如今，汽车行业的劳动冲突主要由工人抗拒强制性加班和员工数量不足导致。汽车工人的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他们想要振作起来。我们注定得接受更低的工资和薪水，更少的工作福利，接受教育和健康等公共品的严重恶化吗？在 1996 年秋法国卡车司机为争取更短工作时间和提前退休的罢工中，司机们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些工人以令人钦佩的决心成为了一个榜样，证明忍受着无穷无尽工作导致的身体和精神危害的工人，是有可能作出屈服之外的其他选择的。法国司机赢得了多项权利，包括周日不上班，55 岁就可以享受所有的退休福利，大幅加薪，减少工作量。相比之下，美国的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则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其加薪幅度也相对较小，并且失去了多项福利。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本钱在 62 或 65 岁时就退休的；社会保障“改革”已于近期将退休人员的退休年龄提高至 67 岁，据说还会再次提高至 70 岁。年长的工人在进入市场时还可发挥作用，但这只能是在他们的工作安全感被解聘和年长解聘（age-biased firing）摧毁之后了。

法国、德国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的工人都坚决参与了争取更短工作时间的斗争，在法国有很多地方，人们已经通过斗争成功地将每周的工作时间降至 37 个小时，在德国工作时间已成功降至 35 小时，同时两国工人一般每年可享受 5 周和 6 周的带薪休假。与此同时，却鲜有美国工人能享受到每年 3 周的休假，美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却不断上涨。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担心工作，工作时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却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被动、更紧张，我们似乎被困住了。与此同时矛盾的是，二十一世纪是后工作（post-work）的时代：是自动化和工作重组快速取代人力的时代。但是不为未来而奋斗，美好生活是不会自动到来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从根本上说，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与现状严重脱节的观念。除非我们开始转变对工作的观念——即工作岗位是否仍将存在，能否继续存在，我们是否想花更多的时间同时从事几份工作（有时甚至工作至死），我们在下个世纪能够且应该过上怎样的生活——否则集体焦虑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除非我们重新思考基本愿景，否则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说，对于穷人来说，在接下来的数个世代中他们将毫无希望。只要期望仍未实现，失望继续弥漫，不满就会将我们联合起来。

1992 年比尔 · 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如果不能说他掌握了有效权力的话，他还是严厉地谴责了前几任总统的保守风格，谴责他们忽略了美国工人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克林顿对保守派们彻底否定经济的行为进行了嘲讽。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似乎超出了预测人员的预期，克林顿在竞选中承诺将带领整个国家进入安全和繁荣的新时代。克林顿承诺让美国实现福利国家也没能实现的重要特征：真正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为长期失业人口提供工作岗位，增加教育和岗位培训。但是克林顿却没能兑现上述承诺。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经济逐渐从五年衰退中复苏，克林顿及其主要经济顾问并未将失业看成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相反，对于克林顿及其顾问而言，失业只不过是技能还未匹配工作场所快速变化需求的产物。四年后，克林顿政府只缩小了服务企业，小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在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失败后，为下岗工人提供了可带走的健康福利，除此之外，克林顿政府放弃了没有兑现其他所有提议，许多美国人已经对政府解决经济难题不抱希望了，经济在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的同时却消灭了更多的岗位。

因为民主党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承诺，且不抱期望，无怪乎到了 1994 年美国人开始通过支持反对党来表达不满，美国人开始支持以纽特 · 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鲍勃 · 多尔（Bob Dole）为首的共和党国会。当然，美国人又一次失望了。共和党的回应也不起作用。对于大

多数美国人而言，当谈到削减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等难以实现的社会福利时，谈到将穷孩子扔进孤儿院（正如金里奇早期提出的那样，之后他发觉如此深入是一个错误）时，共和党国会本身就是非常极端的。金里奇让我们再次紧张起来，带来了一种政治注定失败的感觉。然而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用来构想世界，所以并非毫无希望，并非无法走出困境。将这一目标铭记于心，本宣言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将分析我们在上文中描述的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我们将证明问题不在表面，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全球化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之中，紧接着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当前文化氛围中流传的“一切如常”的回答为何以及如何不能长时间内成立。除了论证人们如何坦然接受各种说法中存在的缺陷外，这一部分还分析了其他几个关键议题。一是劳动回应工作岗位毁灭的历史；二是我们认为我们所知的国家已经被掏空了，只有重新构想才有可能复兴（在明确承认二十世纪末资本主义转型影响的基础上）；三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依旧将穷人、“非”白裔看成是替罪羊，而不是直面结构性的困境；四是美国人不顾现实中的失败和不平等现象，仍认为毫无束缚的自由市场是完美无缺的，这已成了美国的当代宗教。第三部分围绕的是如何超越现在看起来仍非常沉重的未来：具体来说，如何改变现状，如何更真切地应对我们的焦虑？我们将详细地论述将更短工作时间和有保障收入作为具体政策措施的优点，[4] 然后在第四部分和结论部分，我们将详述如何在实践中实现更为人道的集体梦想愿景。

所有这些愤慨都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和没有出路的，除非我们直击困难的核心，否则这些愤慨将导致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肤浅，一切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现在看来，我们中有很多人如此努力地工作——如果还有工

4　本文事实上并没有第三部分，可能为作者所遗漏。——校者注。

作的话——结果竟然没时间享受生活，甚至没时间认真考虑除了现状还能怎样。是时候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了，是时候坚持更高的收入了，是时候拒绝工作至死了。是时候好好生活了。我们如果改变立场、转变视角，将看到什么？如何才能以历史视角来看现状，并塑造一个跟过去相比显著改善的未来？毕竟，尽管我们在九十年代经历了剧烈恶化，但现在依然没能走出困境。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工作安全性破坏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工作的美德却以更加讽刺、更加坚定的方式得到了美化。

第一部分：结构性转型

就在我们写作本文的同时，在美国，有 4 万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工人，其中包括 2.4 万名管理人员，遭到了解雇。随着企业重组、企业再造（re-engineer）、延迟、自动化和运营缩小，各种工人都面临着大规模裁员的残酷事实。解雇工人的公司名单令人震撼：

- 美国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1993 年裁员 5 万人
- 波音公司（Boeing）1993 年 2 月裁员 2.8 万人
- IBM 公司 1993 年 7 月裁员 6.3 万人
- 美国通用电话电子公司（GTE）1994 年 1 月裁员 1.7 万人
- 纽约电话公司（NYNEX）1994 年 1 月裁员 1.68 万人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1994 年 2 月裁员 1.5 万人
- 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1994 年 4 月裁员 1.5 万人
- 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1994 年 5 月裁员 2 万人

尽管到了 1995 年裁员率有所下降，但仍不时传来大规模裁员的消

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裁员 1.5 万人；化学 / 大通曼哈顿银行（Chemical/Chase Manhattan Bank）裁员 1.2 万人；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裁员 5 千人；凯马特公司（Kmart）裁员 5.8 千人；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裁员 4 千人，苹果公司（Apple）裁员 1.3 千人。到了 1996 年，大规模裁员蔓延至服装和面料行业；1995 年，14.1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1996 年，一则更为劲爆的裁员消息传来，阳光公司（Sunbeam）决定裁掉 2 万名职工中的三分之一。1996 年 12 月，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ransWorld Airlines, TWA）宣布将减少航线，专家预测将有数百个工作岗位随之消失。

如此大规模的裁员现象出现在被官方称为“繁荣”的美国经济中，在华尔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每天都会打破纪录。但就算是华尔街的繁荣也没能让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服务业的工人免于解雇。甚至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and Co.）在宣布实现大规模盈利的同时，也裁掉了 250 名员工。纽约甚至没能达到证券业 1987 年 16.2 万名雇员的峰值。在过去五年内，仅股本金水平一项就翻了番，达到了 230 亿美元。但即使是朝阳行业中最好、前景最光明的公司，更多的利润也意味着得精简管理，减少雇员。这导致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即除了少数极富有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均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甚至在经济发展时也是如此。一个非同寻常的悖论是，一方面官方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工作安全感极低。因此即使失业率不高，工资却不会增长。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在过去，以生产力为主导的经济扩张可以实现就业快速增长，更好的工资情况。然而在全球高科技新经济中，工人可能被一种所谓“经济结构调整”（economic restructuring）的东西所取代，被诸如激光、机器人、数字控制、电子通信和文字处理器之类的计算机机械所取代。在从 1971 年到 1990 年的这场技术变革中，工厂外逃和兼并收购一起消灭了 8 百万个工厂工作岗位。自动化和国际竞

争导致机床行业的大量高薪技术工人失去了工作。橡胶、玻璃、纺织品和成衣制造商裁掉了一半的劳动力。1996 年 11 月，一家欧洲纺织品制造商称，一种织造机器可以生产出三倍于行业标准的面料，这种发展使得雇主能够替换纺织工人，和 / 或通过威胁使用自动化来降低工资。

四十年前，当大型汽车公司向引擎工厂引进自动化时，人们看到了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可能同时带来的威胁和希望。这些机器对于工作时间、休闲、收入和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那场传奇性的会面中，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主席沃尔特·路德（Walter Reuther）和一名福特工程师进行了如下交谈。根据作者约翰·伯纳德（John Bernard）的描述，当路德参观福特公司位于克利夫兰的一家高度自动化的引擎工厂时，一位工程师嘲笑他说，“‘你知道机器是不会向联合汽车工会支付工会会费的’。路德反击说‘这些机器也不会购买新的福特汽车’。”当然，机器取代人类劳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工业化早期便已出现，只不过当时大多数人还是农场主或农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厂工人高达 2500 万，占所有劳动力的 40%。虽然机械技术不断进步，产量不断增加，但工作岗位的数量却保持不变。例如，汽车工人 1946 年生产了 550 万辆汽车，1960 年生产了 1100 万辆汽车。1990 年，在诸如机器人和数字控制等自动化技术的压力下（也是由于工作时间延长），汽车和卡车的产量上升至 1300 万辆，但就业率却开始下滑，仅汽车行业就减少了 25%，相当于失去了 15 万个工作岗位。

在钢铁行业，工作岗位的毁灭更具戏剧性。1959 年，钢铁行业雇佣了大约 60 万名生产和维护工人，与 1945 年保持不变。但到了 1990 年，计算机化消灭了劳动力密集型的爆破工作，让膛式炉采用了碱性吹氧炼钢法，给机械轧钢厂装上了计算机控制装置。新技术实现了更小的设备和更少的劳动力，让小型炼钢厂成为了可能。公司兼并连同进口增长导

致 60% 的行业雇员失去了工作，最后只剩下 22.5 万人。然而，正如汽车行业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经过三十年的技术变革和就业缩减，美国钢铁产量不降反升。

在美国南部的纺织品和成衣制造领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失去工作的工人人数超过 70 万（相当于整个行业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在许多情况下，一家炼钢厂关门便意味着整个社区都将变成鬼镇，而在南方有很多社区都是依靠单个公司维持生计的。

难怪现在很多人都感到害怕和焦虑。但是在此期间工会运动在哪里？我们现在又身处何处？

第二部分：当代“常识”批判

二十世纪末，美国陷入困境，感到灾难已经爆发，并竭尽全力避免下一次打击。然而不知为何，即使不使用“结构性转型”这一说法，很多人还是模糊地察觉到了我们的深层经济问题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

不管媒体是否强调我们所处的当代困境——我们暂且称之为焦虑流行病，事实是，就算是麦当劳和连锁超市之类的公司仍在招聘兼职和低薪雇员，作为“美国梦”基础的中层和高层管理岗位仍在流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IBM、柯达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十几家其他行业领军公司在已经解雇了成千上万生产工人的情况下，还宣布不仅要解雇“工人”（根据传统定义，工人指的是蓝领和文职性的“粉”领工人阶级），还要解雇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雇员，这些人被迫提早退休（除非从事兼职或以少量的失业救济金作为补充，否则以他们的收入将不足以维持生活现状）。很多四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发现，就算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他们在技术要求较高的领域仍然找不到工作。令人震惊的是，有一大批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接受了销售岗位和生产线技术岗

位（line technical jobs），而技术工人则被迫干起了生产工作。因此即使是入门级别的岗位，其资格也被衰落的工资中产阶级拉高了。

焦虑还弥漫至曾经一度非常稳定的公共就业领域。例如，就算1996 年末政府公布了较为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拥有 11 家市立医院和数千名雇员的纽约健康和医院公司（New York’s Health and Hospital Corporation）还是威胁要裁掉几乎所有的 1600 名护理监管雇员和多位医生。无论这 1600 名雇员最终是否失去工作，这种威胁本身能够也确实助长了焦虑的情绪，人们因害怕失去生计不敢展开反对。联邦政府也不禁开始夸耀，给将近 25 万名雇员下达了解雇通知书，理由是需响应“重新建构政府”的号召，这一举动甚至成了荣誉徽章，而不是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

故意唱反调的人会说，好吧，就算没了工作那又怎样？新工作岗位出现的速度要高于我们换掉老工作岗位的速度，这就是美国经济的力量。但是消失的工作岗位真的能够恢复吗？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整个情景就会发生改变，而且不会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

随着工厂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高薪岗位连同越来越多的监督性和专业性岗位不断消失，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岗位呢？就业增长大多出现在零售和批发行业（一半是在食品服务行业和其他诸如麦当劳、温蒂汉堡和汉堡王之类的零售业）；在连锁百货公司；在各种没有工会的建筑业中；在雇佣人数不足 25 人的公司中，这些公司的工资和薪水都比大公司要低，福利也更少。1992 年，零售业非管理性工人的年工资只有 1.4 万到 2 万美元，仅相当于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

显然经济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如果就此认为随着新岗位数量的增长，其内容和质量也同样令人愉悦、赚钱、安全，并使我们对未来感到放松的话，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更有可能的是，人们从

事的是零星的细分工作，跟大多数人以前从事的工作相比，这些工作可能只能提供低工资，以及少量福利。根据《纽约时报》著名系列文章《美国裁员》（The Downsizing of America）（之后以著作的形式出版）的作者，大多数人就算失去全职工作后又找到了新的全职工作，其报酬也不如从前，或者他们根本再也找不到全职工作，只能找到兼职。因此，人们可能会发现只要有工作就很“感激”或“幸运”（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挫败和 / 或不满）了，但跟几十年前相比，人们更不可能对新稀缺岗位所提供的少量福利或工资提出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可能不会再质疑一个工作是否有趣，是否允许实现个人价值。

因此，新工作岗位产生的条件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仍然感到焦虑，而不是对自己的经济安全性和长期前景感到高兴。新工作是有代价的，即在这种工作岗位不断消失的经济体中，我们只要有工作就非常高兴了，因此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忍受福利和工资的减少，忍受满足感的降低（甚至消失）。事实上，就整体而言，似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如果说还有福利的话，工厂、办公室和各行各业的福利就没增加。从 1973 年开始，人们的工作时间变长了，可实际得到的工资和薪水减少了。

就工资而言。很多新岗位的周平均工资可以达到甚至超过 400 美元。但有将近 60% 岗位的工资和薪水是低于标准的，还有很多岗位的工资只能达到最低标准，或只略高于最低标准。以 40 个小时为基础，1996 年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为 170 美元每周，远远低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比一家四口维持贫困状态所需的工资还要少 150 美元。就算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 4.75 美元涨至每小时 5.75 美元，要想达到贫困工资水平，最低工资上涨后，每周仍需额外的 100 美元，比每人每周的平均工资少近 200 美元。

就福利而言。就算是报酬相对较高，但在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带薪

休假等福利方面，新的工作岗位要么压根就没有福利，要么仅有少量福利，这样的岗位是无法负担大型公司计划或设立工会的商店实行更好的保护措施的。

大多数零售企业是不受工会合同的制约的，其健康保险计划的免赔额也相对较低，但雇员享受养老金计划。就算小型企业或零售巨头也提供这样的福利，其免赔额也通常较高，且不提供长期护理和灾难保险，很少提供养老金。当雇员退休或下岗时，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可以证明他们提供过服务的材料，这在高营业额的零售行业中相当普遍。

当然，就算是在艰难时期——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一些快到或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人也能够在离职时获得一笔还算体面的养老金和福利。但是尽管许多人还是以温和的方式被迫离职的（有的人甚至在没有未来就业保障的情况下受到鼓励“提前退休”），有的人干脆直接离职。但是许多人发现自己在四五十岁正当年的年纪失去了工作；许多人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其他那些认为自己已经享受到养老金福利的人发现，他们的雇主会偷养老金来偿还债务，或中饱私囊。还有些人会发现，在失业了一年或多年后，他们在找到下个工作前积蓄就已花光，因为由国家管理的失业救济金在六个月后就停发了。

不管与充斥于我们周围、并已成为事实的“常识”有多相悖，还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澄清。正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以焦虑和恐惧普遍存在为标志，我们不能再说贫穷只会影响穷人了。贫困正逐渐变为一种“常态”。

然而，讽刺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让我们越来越难以将穷人同中产阶级区分开来。不仅穷人越来越有理由感到恐惧。甚至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层阶级）中，很多人也开始感到经济扭曲所产生的影响了。

谈到繁荣，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体面标

准水平之下。这一数字与 1973 年相比增长了 50%。有失公允的公众看法认为，穷人主要由酒鬼、瘾君子、失足妇女和骗取福利金的人组成，只有少数人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但贫困的秘密在于，尽管大多数穷人都是为了生计才去工作的，但工资太少却无法谋生。大多数忙穷族（working poor）需要食品券（这是一种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无法再享受的援助形式）来勉强过活，越来越多的忙穷族开始每天前往私人赞助的施食处，就是为了得到体面的一餐。当然，福利不仅补贴穷人，也补贴雇主。收入援助计划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影响，其中一项便是允许低于生活所需的工资存在。因此为了让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用税款来补贴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工作福利制（workfare）[5] 保留了下来。

我们想说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震撼的新闻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而不仅仅是针对穷人，美国梦已经破碎了。的确，正是“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习惯性分界线，上文中提及的结构性转型已变得模糊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工厂岗位遭受了巨大打击，而九十年代对于文职、专业和低中层管理人员来说，则是失去的十年。当然，工厂岗位的数量继续下滑；在这一部门，一般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2.5 倍，但几乎没有就业增长。但是只要经济还在为知识性工人、计算机编程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创造工作，很多人还是认为我们负担得起抛弃“铁锈地带”工厂岗位和薪水较低文职岗位的代价。未来属于那些被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称为“符号分析人员”（symbolic analysts）的人，即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人。美国东北部可能出现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但其他地区将会迎来繁荣。

里奇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继续向我们保证，是培训不足导致了失业。

5　与社会福利（welfare）相对，要求享受福利者去干指定的工作或参加职业培训。——校者注。

在他看来，政府应该帮助年轻人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将有助于被换掉的工人接受再培训，以满足从事符号分析工作（计算机编程、金融服务、政策分析）的要求。然而这种想法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合格人员找不到工作。例如，为什么护士和医生也会失业？此外，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层管理人员还是收到了解雇通知书？一些计算机从业人员——符号分析人员的原型——也在找工作，但在找到工作后发现新工作的报酬远低于上一份工作。会计师、财务经理人和很多其他专业人员曾经是符号的操纵者，现在他们却成了“咨询”，说白了也就是临时工。成千上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只能跟符号打交道，而且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只能从事兼职，担任临时教师 / 助手。随着技术工人数量快速增加，压沉了高科技经济的救生艇，为得到相关工作岗位而接受培训的工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充斥了整个市场。

最近出现了一则以“大众踊跃消费，经济保持强劲”为题的报道。可能有些商店和制造商正忙于销售和盈利，但很多经济报告却显示个人债务正在不断增加。1996 年有超过一百万人宣布破产；其他人则踩着信贷上限购买必需品，他们之所以没破产，是因为银行依然渴望向个人放贷。例如，有些人每年只能赚 2 万至 2.5 万美元，但他们的信用额度却高达 1 万美元。如果他们以 18% 的利息购买了价值 5 千美元的商品的话，那他们每月 200 美元，要花三年时间才能把所有贷款还完。但是这种无限放贷的做法必然是无法持续的。最终，等到下一次衰退到来，因为失去工作和工资削减而被迫拖欠贷款的人，数量肯定会增加。

经济复苏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就是不断膨胀的个人债务。破产的人越多，下岗的人就越多。但是这一次，千疮百孔、不断缩小的安全之网就网罗不了那么多受害者了。

第四部分：劳工的回应[6]

劳工运动应该如何应对上文中描述的变化和问题？大多数工会选择的不是争取工作共享（work-sharing）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来应对技术变革毁灭工作岗位产生的影响。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工会的回应是，就各种间接减少工作时间的举措展开谈判，其中包括延长老资历工人的“离职休假”（sabbatical leaves），公司最多支付两年补充失业救济金，工作三十年后才可享受全额养老金。但是这些福利只属于那些签订了工会合同的人，却帮不了那些数以百万计不属于工会或在技术变革尚未出现的行业工作的工人。此外，相关措施只涉及老资历的工人，年轻的工人依然得承受行业裁员的重担。

在海滨地区以前掀起过一股技术驱动型改革的风潮。作为允许装卸公司进行“集装箱化”（一种自动化）的回报，两家沿岸工会为一部分工人赢得了最低年收入保障（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GAI）。这意味着不管工作与否，工人都能得到全额年薪。实际上，工人是在用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换取享受生活的空闲和收入。沿岸是后工作制度化的典型案例。

但是最低年收入保障的制度化只是例外，而非惯例，当管理层提出要用“冷排印刷”（cold type）（计算机化在印刷业的说法）换掉印刷人员时，都市日报社的印刷人员才无奈地接受了最低年收入保障。然而时至今日，尽管制造工厂、办公室和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大量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作，除了纽约的建筑电工，每日 6 个小时或每周 30 个小时工作时间的承诺依然没有兑现，尽管制造工厂、办公室和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大量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作。

更糟糕的是，尽管争取更短工作时间的运动——是劳动力对技术变

6　原书第三部分阙如。——校者注。

革和经济起伏的关键历史性回应——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崩溃了。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大萧条以及战后经济重建后，对更短工作时间的要求将会在劳工运动的中心舞台和进步政治的平台上再度出现。相反，在各行各业中，从汽车到飞机制造，大规模裁员的幸存者们每周得工作 50 至 60 个小时，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甚至连这项“特权”也没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公司更愿意给少量工人支付 1.5 倍薪酬的加班工资，因为这比给一批新全职工人提供各种福利的成本要低。这样的公司还从较高的失业率中受益，因为较高的失业率使得公司可以压低工资。因此，当生意好转时，公司无需雇佣更多的新员工；相反，额外的工作只好堆在现有劳动力的身上。

在那些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雇主将工作转移到低薪地区的成本更低，目的地包括美国境内的一些地区和 / 或拉丁美洲、亚洲、东欧的一些国家，跟美国南部非工会工人的最低报酬相比，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工资水平甚至更低，这一点对于公司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例如，随着公司将工作转移至墨西哥、中国和波兰，将有数以千计的纺织品和成衣制造工人失去工作。但是高薪工作也在流失。墨西哥边境的美国工厂，即所谓的美墨联营工厂（maquiladores），既生产汽车和机器零件、装置，也制作服装。这些工厂拥有高科技机械，在与美国工厂的竞争中大获全胜。此外，公司还利用自己的能力将工作转移到上述工厂，结果对美国工人构成威胁。在通常情况下，工会谈判者面对的是公司有权将工作进行“外包”，雇主公司甚至可以压低工资和福利，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更大的“灵活性”（这是对加速生产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的粉饰）。

与此同时，随着各大公司在海外找到了更便宜、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专业人员，尤其是设计工程师、计算机编程人员、医疗和其他科学工人，都将面临风险。印度人和中国人为美国公司开发软件；印度和中国的科学实验室和工程公司与美国的医疗和工业公司达成协议，采用

美国实验室和设计公司的方式进行工厂设计和产品开发。像许多美国大学一样，这些公司将自己的发现、发明专利权与资金进行交换，以支持相关研究。在此过程中，“美国”科学或“美国”技术的概念快速成为了历史。

上述情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劳工运动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口号“同工同酬”已经死亡：各种劳动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通过建立强大的工会，争取体面的工资和福利，劳工有能力获胜。当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无法控制全国市场，不得不面对来自于欧洲邻国和亚洲国家公司（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竞争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生存措施。首先，他们以“如果不能击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为原则，与竞争对手组建国际或跨国公司。例如，通用汽车与德国和日本的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了合资企业，并于近期与丰田合作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他们将更多的工作从美国的高薪区域转移到低薪区域，转移到亚洲（特别是韩国和中国），转移到拉丁美洲和其他任何劳动力便宜的地方。

在国防部和美国政府的帮助下，特别是在美国税法的保护下（根据美国税法，不管是否摧毁了劳动力，国家都会奖励资本投资），各大公司开发出了各种摧毁劳动力的新技术。这些技术使得他们享有在全球、在网络任何地方安置工作的极大灵活性，公司现在可以打败劳工运动了，作为跨国公司他们不用再理会劳工运动倡导的体面生活标准了。对于企业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以更低的工资雇佣更少的工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失业，这种做法也很快成为了一种国际战略。而现实却是工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生活标准不断下降，贫困加剧。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给失业人群提供的资金只属于一小部分。国家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退伍军人福利和医疗保健。正如克林顿总统和我们发现的那样，里根时代并没有随着克林顿当选而终结，但所谓“大政府”的角色已经被削弱，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中扮演的角色。政府已经放弃了工作岗位创造者的角色，从在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重要角色中快速全身而退，并如公司所愿迅速放弃了商业监管者的角色。虽然保护职工工作安全和健康的法律依然存在，但执行相关法律所需的监督人数却在不断减少，处罚也变得微不足道，由于不存在真正的监管威胁，雇主公司开始公然违反法律。交通监管的放松导致了货物装载量的增加，导致了卡车司机的收入不断降低，随着限速标准不断提高，交付时间不断缩短，很多州甚至开始出现道路安全不稳定的情况。

跨国公司不断架空政府，将其变成了所谓的“空心国家”（hollow state）。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过去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执政的 25 年间，支持健康、教育、娱乐、低成本交通等具有广大民众基础需求的政府资源不断减少，但军费预算却一直居高不下，以满足冷战后新治安任务的要求，军费预算依然是新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政府似乎要从我们眼前消失了。在这个一度声名狼藉的理念——每个人都得靠自己，应该限制政府的作用，政府只用负责治安充当大公司利益的附属即可——强势回归的时代，“善良国家”（compassionate state）时代的遗产在公司和其政治同盟的控制下迅速消弭。这个同盟正在挖空国家的善良功能，只保留了与打击犯罪、部署军队治理全球、国际商业交易谈判（往往被粉饰为政府外交）相关的任务。

政府不提供全民医疗保健，也不提供其他保证大多数人安全的措施，政府加强刑事司法体系。政府颁布了多部法律，将非法药物的使用、销售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用于监狱建设，以关押每

年送往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罪犯。今天，有超过 600 万的美国人，占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的 2.5%，要么进了监狱，要么在刑事司法体系的控制之下。在很多社区，监狱成了最大的雇主，由于缺乏其他收入，镇或县被迫对监狱设施进行投标，为建设工人、保安、厨师和机械师提供工作。

但是与打击犯罪同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通过让半个国家的人来保卫另一半，来实现全民就业，除非我们想把走私、公共场所吸烟、看色情产品、喝啤酒、喝葡萄酒、喝烈酒统统列为犯罪。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诺列加（Noriega）[7] 和侯赛因 [8] 已被证明是纸老虎了，美国可能还能找到一个新的冷战伙伴。也许叙利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或者卡扎菲，或者两者皆可。但是就算是战争，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作为创造工作的机器了。由于没能成为更强大的警察国家，国家的空洞性变得显而易见。

国家的民主目标也受到了侵蚀。民主的定义越来越局限于投票。民主只存在于工厂大门或办公室门以外。

愤世嫉俗的公众情绪不断上涨，只有 50% 的美国人参与国家选举，参与地方选举的人就更少了。很多人，不仅包括穷人还包括一大批中产阶级和年轻人，都感觉到了政府在日常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们因为明白国家的空洞性，所以更没有理由通过选举这一象征行为来表达他们对瘫痪政府的赞同了。事实上，比尔 · 克林顿就像是一位无法掌权的中层管理者。不仅是因为他不由自主地采取了保守的方向，还是因为他的政府已经公开意识到了平权政府（affirmative government）的局限性。克林顿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即管控性和福利性国家）已成为历史，在经历了诸多痛苦后，他签署了一份共和党起草的法案，有效地终止了已经实行了 60 年的保障金体系，而对于那些出于各种原

7　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1934 年出生在巴拿马城一个穷苦人家庭，1983 年成为巴拿马实际领导人，1989 年 12 月 20 日美军出兵巴拿马，迫使诺列加到美国受审。——校者注。

8　此处应指萨达姆。——校者注。

因——其中包括没有足够的工作——需要收入的人来说，所付金额从来都是不够的。任何冒犯两大政府顾问——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总统或国会法案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灾难。在这些方面人们可能还没清楚地意识到问题之所在，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政府就是一个公共关系的诈骗犯。或者说政府就是警察。但是政府并不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政府当然也不是“我”。

显而易见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和保守政治的环境下，政府的积极作用都前功尽弃了。只要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机制，情况就毫无转机。联邦政府是保护美国石油、制造、通信、文化和农业跨国公司的世界警察。除了用武装部队和外交力量来支持美国国际利益的政策外，这些公司还想从国家那里得到三样东西：公司能够接受的的监管体系、低税收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当然，显而易见，低税收和提供教育之间存在着矛盾，而教育才是大多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支出。答案是？向更少的人提供质量更高的教育；用学校和监狱来控制剩下的人口。总而言之，跨国公司想要的是一个不碍事的政府，一个能控制大多数人的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每个国家政府都愿意满足这些愿望。目前缺乏的是与人民订立契约，规定为了回报社会和平，经济统治阶级同意向社会服务设施大量注资，例如教育、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让大多数人拥有安全感。福利国家本身不是问题，为跨国公司利润服务的空洞国家才是问题之所在。但是只要还没威胁到社会和平，就不会有社会工资。

人们被告知联邦政府遇到了危机；债务正在摧毁我们的未来和我们下一代的未来。我们被告知债务是我们建设“福利国家”造成的后果。美国政府为穷人和那些懒得工作的人提供保障的时间太久了。解决方案是对这些人缩紧相关策略，并通过取消食品券（food stamps）、救助无自理能力儿童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教

育和住房，来实现预算平衡。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由于这些计划成本高，受益人不工作，所以导致了税收居高不下，预算无法平衡。上述计划的总成本高达 1370 亿美元每年：其中救助无自理能力儿童计划为 140 亿美元，食品券为 270 亿美元，医疗补助计划为 960 亿美元。但是即使削减相关支出也无法实现预算平衡，事实上，这些支出跟政府为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提供的其他计划相比并不算多。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是一项主要用于中产阶级的大众计划，其成本为 1770 亿美元，而社会保障的成本为 3350 亿美元。

与此同时，高达 2710 亿美元的 1996~1997 年国防预算实在是天文数字，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冷战已经结束而美国又没有主要军事敌人的情况下。当谈到税富济贫时，富人阶层总是义愤填膺，而当谈及他们每年从政府那里享受的高达 4000 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时，他们竟缄默了。如果贷款，企业可获得 1000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比食品券和救助无自理能力儿童计划加起来还多），如果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牧场主可得到 20 亿美元的成本减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使用卫星通讯系统可得到 200 亿美元的补贴，核工业的补贴更是高达 970 亿美元，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用 10 亿美元的补贴帮助美国公司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更便宜的国外劳动力市场。公司的福利比穷人的福利更重要，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更别说抱怨了。如果削减公司补贴，很容易便可实现预算平衡。而我们有的却是富人获得税收减免，其他人忍受服务缩水。

预算危机被视为坏账的一种，如果坏账得不到解决，将会摧毁美国未来几代人的生活。但是政府从未提及的是，预算危机在伤害一些人的同时，也令另一些人受益。在里根执政期间，预算危机被放大了，里根政府一面向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提供税收减免，一面增加军费开支。里根在八年任期结束时，留下了 2 万亿美元的赤字。他将公共资金（public

monies）从 80% 的美国人那里转移到 20% 上层美国人手中，堪称一种政治战略。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而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穷人则越来越穷。储贷危机让美国政府付出了 5000 亿美元的代价，我们却被告知将公共资金转移到富裕人群手中对大家都有好处。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得到一定的好处。

国家被掏空，只有压制性的功能保持完好。但是这还是降低了通过公共行动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可能。空洞的国家意味着随着自由民主的标准越来越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张将不断趋同。两党之间当然依然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指望的是选民正确地认识到投票标准急剧下滑，因此大规模地远离票箱。最后，我们可能会提出现实的问题：政府到底代表谁？是不是政府也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答案还是政府代表有组织的利益，但是随着劳工运动日渐衰弱，很多以社区为基础的独立运动——例如穷人运动——日渐崩溃，以及女性主义和黑人自由运动不成气候，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区别似乎只存在于表面了。克林顿总统必须保证在第二届任期内阁高层中加入一定数量的女性和少数裔。因此，国务卿和卫生部长是女性；劳工部长是黑人女性，负责退伍军人事务的是黑人男性，能源部长是拉丁族裔。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基本政策依然是那些推动国家政府的政策：强调外交政策，特别是与有限战争或治安相关的政策；架空六十年前资本和劳动通过罗斯福新政曾经达成的历史性妥协。克林顿除了敏锐的政治感外，与其共和党前任之间不存在任何显著差异，就算对跨国公司唯命是从，克林顿还是知道如何摆平各种庞大的政治支持团体。除了克林顿，跨国公司找不到更好的合作伙伴了。

让穷人充当替罪羊

领薪中产阶级越来越害怕落入更低的阶层，他们越来越会保护自己，变得越来越保守。由于缺乏扭转颓势的力量，很多人选择让穷人充当替罪羊。

一种普遍存在的迷思认为，只要努力穷人也能找到工作，但是只要仍然困在“依赖循环”（cycle of dependency）中，他们会一直抵制有酬工作的。很多人还认为骗取福利的人和享受福利的妇女之所以生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增加自己的福利。

一种普遍的谣言是，穷人大多由少数族裔组成，但实际上其中有65% 是白人。在救助无自理能力儿童方面，人们认为只有少数白人妇女才享受相关福利，但事实是享受福利的白人和黑人比例相当，分别为38% 和 39%。我们总是听到懒人才会领福利这种说法，但是如果有足够的体面岗位的话，大多数人还是会工作的。但是这却不适用于救助无自理能力儿童计划，因为其中只有 450 万是成人，而 940 万是儿童。不仅大部分是儿童，而且 60% 是不到 6 岁的儿童。我们是否应该放松对童工的管制，然后回到过去孩子和大人一起努力工作的美好岁月？如果不应该，所谓的福利改革支持者们要怎样才能证明在 2 年或 5 年后停发公共援助是合理的?

一种普遍的谣言是，这些计划根本没用，因为一旦开始，人们就会领一辈子福利。实际上，70% 的女性会在 2 年内停领福利。全国各地的福利都很微薄，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在纽约，一个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到的公共援助拨款最高可为 577 美元，食品券为 270 美元，两者加起来仅达到贫困水平的 81%。而如今这些份额又减少了四分之一。其实减少得更多，因为资金在联邦层面便会遭到阻拦，最终只拨出一小部分，所以资金总额不是根据需要援助的人数来确定的。

每天工作6小时

在工作日人们根据合约用劳动换取金钱，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多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并将此看成人类欲望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射。这种观念暗示了人们会快乐地从事并满足于对时间进行强制性组织的工作。一般人认为，工作日体现了我们的身份和欲望，而非压制人类精力、消磨人类意志的经济体系的冲动和倾向。

工作日不是人性的延伸；长时间的工作也并非出于需要，也不是什么工人乐意、自愿或高兴从事的事。事实恰恰相反。在所有存在工资（一种每日购买面包的需要而非欲望所导致的强制性）的社会历史中都出现过冲突，工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劳动，而雇主则坚持认为工人的每一分钟、每一丝心力都应全身心地奉献给生产。长时间工作早在十六世纪资本主义早期便已出现。从那时起，工人就开始为缩短工作时间而不断斗争了。1886 年，美国工人和工会率先行动，举起了每天工作 8 个小时的大旗。自此以后，在各个工业国家，资本家和工人围绕工作时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一些行业的工人甚至在罗斯福新政批准 1938 年《工资工时法》中的相关福利前就已经开始享受八小时工作制了。很多人认为八小时工作制只是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的开始。但是资本及其代理是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反制梦想（counterdream）的，即将每天工作 10 小时和 12 小时重新定义为一种文化标准，将任何缩短工时的行为都定为不道德的。直到最近，劳工运动历史上的关键议题才变为工作时间大幅延长是否“正常”。当工作人员采取不同的标准时，当他们将更长的工作时间看成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强加事项时，他们便会展开罢工、静坐抗议和示威游行，以期缩短工作时间。

通过斗争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事例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从十九

世纪七十年代现代劳工运动伊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工人以及工会都将更短的工作时间列在要求清单的首位或前几位。就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工会面临大规模失业并处于弱势时，也组织劳工提出在不降低报酬的前提下每天工作 6 个小时——当时人们一般每天工作 8 个或 10 个小时。这种斗争说明，所谓的正常只不过是社会权力和文化习俗的问题。在领导整个工业世界追求更短工作时间后，美国工人不得不被灌输如下观点，即有报酬的工作在本质上是有益的，是人类实现自我的手段。在整个十九世纪，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说明工人一直在抵抗。在工人展开追求更短工作时间斗争的同时，资本正以生计威胁工人没日没夜地工作。

斗争的条件和情况以及终结斗争的事件都值得重新探索，因为尽管工作时间不断增加，工人的收入却一如既往地微薄，甚至连本就很少的工资却也在快速减少。对于工人来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他们也没享受到高质量的休闲时间，到处都是压力及社会症状，人们规划的黄金未来正在快速崩塌。关于工作时间的斗争已经打响，人们面对一组对立的选择：一边是工作和工资的增加，一边是工作时间的减少。但在今天的美国，人们的愿望不再以追求更短工作时间的形式出现，而是变成了个别人反抗公司强压、工会默许的强制性加班。以 1994 年通用汽车罢工为例，说明工人追求更短的工作时间，在罢工中，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和兰辛市的工人要求招聘更多的人，这样现有的工人才能不再加班。由于罢工导致所有生产链的生产骤减，通用汽车不得不立即妥协，立即为弗林特工厂招聘了 800 多名新工人，为其他工厂招聘了更多新工人。在上述例子中，更短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八小时工作制的回归，意味着工人有权拒绝加班。

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人们从工作福利、家庭福利、宗教、道德和幸福出发，对与更高工资相关的更短工作时间展开讨论。限制工作时

间理论的假设是，物质进步是实现非物质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工作则是生活的一种手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者提出“休闲伦理”，主张用自由时间代替工作。“休闲伦理”主张工人享受资本主义福利，享受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样资本家便无法将其变成利润了。当时人们认为，经济体系越利用技术扩大生产力，就越能使工人从长时间的加班中解脱出来。资本家也注意到了，技术有助于将大多数人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拥有空闲意味着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传统的工作动机已不再显著。

于是人们创造了消费，作为新的动机：塑造新“人性”围绕欲壑难平的购买和囤积需求。在关于更短工作时间的辩论中，这种意识形态意外地取得了成功。经济学家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赞同减少工作时间（1992 年），她认为工人不得不放弃消费以便减少工作时间。匮乏和牺牲成了减少工作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赞同。我们坚持认为是技术革命可以同时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生活水平。

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更短的工作时间被认为是可以快速解决资本主义非理性生产的问题。减少工作量被认为是解决过度生产和失业问题的一剂良药，因此也得到了商业部门的支持。胡佛执政时期流行的“分享工作”理论，是大萧条理性立法的基础。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出现了新的二元思潮：工作减少了，但所有人都有工作；或者增加工作然后进行分配。前者由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一些自由主义政客提出，后者提出每周工作 30 小时法案，用以解决失业问题——提出来，是罗斯福总统公共工程和最低工资计划产生的后果。当时有组织劳工中规模最大的联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它虽然支持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时间，却反对政府干预工资设定的结果——最低工资。“分享工作”很容易导致人们一起变穷，这种想法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令人沮丧的。短工作时间和低工资之间的联系对当代思想影响显著，

即要想缩短工作时间，必须减少工资，而不仅仅是减少工作量。罗斯福政府大力提倡、更受人欢迎的理论是，增加生产必然会增加消费。更短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小的生产力，更少的支出和更低的增长。后来工人们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计划得到了公共项目岗位。这些项目产生的工作与争取缩短工作时间背道而驰。这些岗位属于劳动密集型岗位，会想方设法避免应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大约有一百万人受益于该计划。很多职位属于公共工程领域，例如修建新公路或邮局，清理河道和森林。该计划还为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提供工作，让他们用自己的时间来丰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就在提出该计划的同时，联邦已经将立法减少工作时间提上政治议程上了。参议院实际上已经通过了《布莱克三十小时法案》（Black thirty-hour bill）[9]。创造就业成了解决失业问题和收入大幅降低问题的一种备选方案。

罗斯福政府重新树立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工作，而非不用工作的自由，才是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这种观念的基础是，如果没有工作，人们会遭到精神和情感折磨。空闲和自我毁灭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让我们心生恐惧，从而对减少工作量的想法敬而远之。罗斯福为了对抗大萧条，采用了扩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与资本主义在大萧条中显现出的特征背道而驰：是科学和技术太过成功，导致人们失去了工作。如果美国人继续把工作和消费的循环当成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话，就必须对这种趋势进行校正。在政府的管理下，资本主义主要想降低科学效率，减少科学应用，创造就业机会。

罗斯福新政通过强化更少的工作、休闲与经济崩溃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来反驳参议员雨果·布莱克提出的、劳工支持的《三十小时法案》，

9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胡果·布莱克（Hugo L. Black）于1932年提出，旨在确立30小时工作周制度。——校者注。

反而建立了每周 40 小时的标准，而在当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降至 40 小时或者更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强化了一种观念，那就是休闲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非美国式的倾向，而快乐只能通过增加劳动生产力来获得。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在此背景下，美国原本打算限制过长的工作时间，但加班却受到了被账单压垮的工人们的欢迎。直到五十年代还有人仍在为更短的工作时间而奋斗。到了六十年代，年轻人开始认识到自动控制技术在发展新的后匮乏（post-scarcity）文化方面蕴含着巨大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过去三十年来的政治史：右派成功地让美国人民患上了社会遗忘症，消除了整个国家开始认真思考后工作未来的记忆。

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放弃了过去的要求，放弃了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转而接受更短的工作时间会减少工资的观点。劳工已经放弃了参与控制工作日的斗争了。人们不再幻想工作的终结。

“工作狂”曾被视为一种疾病，现在却成了需要强制执行的道德标准；工作日再次成为人类存在的核心特征。从 1983 年开始工作日不断增加，最终达到了每年多 30 天的程度，而工作日的增加不再是公共主题，如果现状继续，工人每周要工作 60 个小时，每年工作 50 周。

是时候创造替代方案的话语了，创造超越工作、关注尊严的话语了。是时候要求并实现每周工作 30 个小时的制度了。大多数研究表明，分享工作将会提高个人生产力，并减少失业率。周工作时间的减少——每周工作 20 或 30 个小时——与如今经济创造的工作岗位是相适应的，这进而将终结以全职工作为标准的晚期资本主义的观念，并揭示存在以更短工作时间享受全职工资的可能性。分享工作将解放工人，使之摆脱资本主义提出的二元选项。我们可以同时缩短工作时间，享受休闲，领取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我们之前所有的想象，如人类发展、智力增长、社区参与、公民责任以及陪伴孩子的家庭生活，都可变为现实。在薪水

合理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购物，可以维持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直到我们也开始考虑替换这种经济。

呼吁有保障收入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你向别人提到有保障收入时，你肯定会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这非常讽刺。有人可能会问（不仅是右翼人士，很多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也会同样感到惊讶），“在过去几十年的保守时期，你怎么讨论有保障的收入？”无论是否参与过学术圈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专业讨论，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还是会或多或少地知道一点。人们可能不清楚有保障收入政策需要多少花费，如何实施，但是下文中即将论述的内容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非常常见。

大多数人都正确地认识到了，如果美国实行有保障收入的话，则不管有没有工作，政府都会承诺给每个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他们维持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标准都得到了保证，基本的营养、住房和娱乐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与此相关，但是很多人还未认识到的是，有保障收入并不会消除工作激励因素，因为人们肯定希望对有保障收入进行补充，使其远高于基本舒适水平。有保障收入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永远不用工作，并不意味着消除社会必要劳动。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每个人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来生产公共品并参与社会必要劳动（收垃圾、补充警力、做文员或服务员）；此外，私营生产部门将面对很大的压力，需要用高于有保障收入、与公共部门工作相匹配的工资，来引导人们参与日常劳动。不，有保障收入的关键特征不是可能突然剥夺我们工作的欲望，或是剥夺地方社区对社区成员参与社会劳动的期望。正确的认识是，有保障收入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意味着不再有人挨饿，不再有人被工作奴役，或囚禁于工作之中。鉴于此，有保障收入消除了绝望和贫穷，提供了一个收入不能继续滑落的底线，也

正因如此，在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有保障收入才显得十分荒谬、激进和不切实际。

但是在有保障收入的概念中，有哪些关于文化的部分，让我们认为提出一个不再挨饿的基本措施如此奇怪和令人反感呢？有保障收入真的荒谬吗？据此，我们可以给出非常有力的反击论据：即，有保障收入在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大量失业的背景下是非常现实的。如今情形出现了反转，在向着兼职、临时工作和失业发展的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找到一个高薪水工作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变得越来越荒谬。正如个人主义预设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那样，即在寻找已经不复存在的好工作时，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后我们已不再指责自己，而是指责社会，因为出问题的不是我们的心态，而是我们所处社会的结构。像社会保障一样，就算有什么不同，有保障收入也是务实且合理的。有保障收入承认而非否认了我们需要被保护的事实，这种保护不仅针对衰老和死亡的不确定性（在文化上如今已被接受，但是曾经一度看起来非常“共产主义”），还针对资本主义晚期出现的社会淘汰：其中涉及各个年龄层工作安全性的丧失，这迫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迫使人们为了生存相互竞争。

有保障收入之所以不是荒谬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概念已出现过，试验过。西欧国家已经通过收入补贴实现了各种形式的有保障收入，以保护失业群体。此外，在欧洲，这一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活跃，并由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等经济学家进行推广，其原因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失业加剧和经济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保障收入是有道理的。从法国到瑞典到挪威，各种证据表明，在实行了有保障收入后，没人会停止工作。没有证据表明事情会因此分崩离析，没有证据表明不再提供和维持基本的服务和需求。相反，有保障收入证明了实行有保障收入的社会将会展现出经济优越性。这才是富裕社会的标志，因此考虑到美国的富足，更应该且能够很容易地实行有保障收入政策。这一概念在美国其实也不算新奇。在丹尼尔·莫伊尼恩（Daniel

Moynihan）1973 年出版的《有保障收入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 Guaranteed Income）一书中，作者强烈呼吁尼克松政府接受收入保障这一合理的理念；莫伊尼恩对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厌烦，因为后者想要自由主义在关于应该保障多少收入的争论中淡出，而不是团结一致关注这一理念本身。十年之后，艾伦·希安（Allan Sheahan）在《有保障收入：经济安全权》（Guaranteed Income: Right to Economic Security）一书中，梳理并再度引入了这一理念。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为什么人们对有保障收入如此抵触并认为它“过头”了呢？原因肯定不是因为这一理念真的太乌托邦了，因为历史发展已经让这一概念变成了一种有意义、符合逻辑的潜在改良原则；原因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有保障收入意味着未来我们不再需要起床上班，不是因为有保障收入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陌生，因为这一政策在其他地方已经存在，而且一再被引荐给国会。原因也不会真的是因为有保障收入政策成本高昂（因为莫伊尼恩、希安和其他人认为可以用合理的成本来执行这一政策，特别是当我们可以从军费预算中划拨一部分资金出来，实行累积税收然后用有保障收入代替当前的福利体系）。也许，讽刺的是这一政策之所以无法实行不是因为存在缺点，而是因为这一政策拥有优点，并且可能让人们感到幸福。也许，有保障收入之所以看起来荒谬无比，是因为我们尚未习惯人类不仅享有生存权还享有幸福权这一理念。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有保障收入理念真正令人不安的核心，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荒谬的原因，就是这个：有保障收入让我们感到诧异，我们竟然让政策以无条件地为人类提供幸福为中心；我们已经可悲地习惯于以工作谋生存，甚至到现在依然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习惯工作至死。工作至死已司空见惯，除此之外的任何想法都会吓到我们。

其他想法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有保障收入可能产生好的结果。显然，如果有了有保障收入，就无需福利体系了，因为工人和“闲人”的划分将消失。医疗保健（包括咨询和治疗）、教育和社会工作之类的服

务也将扩展，通过一般性税收支付其费用，因为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工作”和劳动分工，所以会从工作转向解决问题、探索可能性、寻找新的伦理和社会意义。

例如，学校课程将专注于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音乐、体育、艺术和科学将在课程中占据中心位置，人们也将开始关注传统工艺的美学和职业价值。我们认为这将复兴所谓的“休闲研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研究人们如何以不同于三十年前的方式消磨时间。紧接着，空间和时间将成为知识的主题，而以传统科幻小说的视角来看，空间和时间也将变成个人和社会探索的对象。结果，终身学习、旅行、业余爱好、小买卖和手工将会产生新的意义，所有人都可参与，而不仅仅是中产和中上层阶级。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参与技术文化，并将其视为在有保障收入的协助下实现幸福权和工作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人则可避免通过技术建构社会和个人的意义。

关于有保障收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将允许我们生存，幸福地生存下去。有保障收入政策可以促进并改变休闲和劳动、需要和欲望、工作和娱乐之间二元对立。因此，除了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有保障收入既是务实的也是有远见的；如果执行起来，有保障收入将成为理智改革和激进情感所取得成就的象征。因此，重要的是将有保障收入纳入本宣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措施之中，以解决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技术人力成本问题。结合减少周工作时间、普及儿童护理和实行单一支付方医疗体系（single payer health care）[10] 来看，有保障收入对于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来说也是必要的（如果说还不够的话）。

10　单一支付方医疗体系是一种由政府作为唯一支付方，负责筹资和购买医疗服务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来自雇主、个人和政府的资金会由政府筹集起来统一管理，并用于支付每个公民的医疗开支。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这种单一支付方体系，比如加拿大的医疗保险、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校者注。

结论：后工作宣言

后工作的新世界与经济和文化关于工作永无尽头的假设之间出现了断裂。过去人们所谓的乌托邦如今却变成了一种必需品。后工作的世界并不一定充满贫穷、劳苦和匮乏，可能也是一个个人和社会拥有无限潜力的世界，保证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如果展开运动并进行斗争，工作可以吸引和满足所有人，可以表现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

我们认为后工作时代的到来合情合理。现在已经到了发起运动，为减少工作、提高工资而斗争的时候了。我们认为至少得保证每个人都享有体面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保证个人和社会能力充分施展。

我们敢于想象一个超越了匮乏的世界，一个失业不再意味着痛苦和绝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时间将获得解放，自由将成为可能。我们不仅想象未来的可能性，还承认有可能将现在塑造成我们梦想的样子。想象就是拥有梦想，就是超越常规和现实的边界。想象不仅存在于发挥个体创造性的梦想中，还存在于创造新生活方式和新梦想的文化运动之中——新方式、新梦想会在社会团结、希望和信任中现显出来。

温和的反思和大胆的想象往往会让人感到紧张，感到不安，感到焦虑。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想象总是在冒险。但是在这样一个工作已被全球资本和计算机辅助技术摧毁了的世界中，不就替代方案展开想象才是在冒险。如果不考虑替代方案，个人和集体就不得不依赖于现有权力，毫无逃脱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右派支持资本霸权，而左派只需要动员的空间，他们几乎无法进行改变，无法维护社会正义和平等。

我们既不认同右派也不认同左派，我们想要一个存在工作限度的世界。我们想要一个可以激进参与民主、进行自我时间管理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新技术，不会导致监督增加、自由减少，而会造成对劳工的要求减少。如果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塑造生活了：家庭、社会和政

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种不同的控制体系来进行生产和分配。生活必需品也将通过参与式民主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样我们就不用再依靠企业的利益和利润动机来决定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了。所有人不仅会享受有利可图的住房，而且是好的住房。我们在考虑市场利润前，将先强调环境因素，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提供教育，而不仅仅是为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在这个想象的新世界中，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人权。权利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开始提要求，这是最低限度。新技术和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导致了断裂，使得我们得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空想而现在却很务实的世界。要想生存，我们的需求就不要局限于体制改革。我们呼吁以普通人为中心建设世界。我们呼吁建设一个任何新社会运动均以激进、参与式民主和普遍自由为主的世界。

想象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

无工作未来的设想一提出，就立刻引发了人们对不可想象未来的惊恐。即便技术进步创造的劳动生产力让不用工作的未来成为可能，传统观念依然将工作提升到神圣使命的高度。历史让西方文明注定沉迷于劳动文化。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分辨，“维持收支平衡”的压力是在担心失业将导致挨饿，还是担心死后下地狱、永远受诅咒。这就是不工作产生的巨大文化性内疚。个人安全受到威胁，价值感被挫败，这两种情形在当今社会中进行了奇怪地混合，人们既担心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也害怕在晚期资本主义绩效驱动型的文化中无法实现自身价值。

过上不以雇佣工作来定义的生活，每周只用进行几个小时的必要劳动，光是想一想就会让统治者和很多被统治者感到恐惧。对自由时间不受约束的想象，对我们所认为的经济生存和物质福祉基础来说，是一种令人倒胃的威胁，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甚至不能忍受这一理念。因此，我们希望自己的功能性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希望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实

现自己设定的目标，但这种想象却受到了公共观念的压制和蒙蔽，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荒谬的笑话。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人类在现代工作伦理（最早诞生于18世纪）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我们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不断工作的教条看起来这么自然、正常和正义。更具体的是，在关于工作伦理的讨论中，为什么公众和个人都保持沉默？社会“事实”力量的“秘密”就是：雇佣工作是人性的一个条件而且“我们必须工作到死”？

工会在哪？左派在哪？激进分子在哪？可悲的是，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是革命人士都认为工作是一种救赎。甚至列宁也称赞泰勒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方法。但是不幸的是，公众缄默，甚至连一些政治反对派也因为害怕而不敢发声，这一点更加剧了缄默。

但是那些想要表达自我、拥有更多创造性价值、经济安全感和与人为善的人，而非服从、感到不安和残酷的人，却无法保持沉默。在新千年即将开始之际，我们认为，人类面对的是能否自由度过一生的门槛，而不是无穷无尽、日夜不停的工作。

我们不认为未来必然或应该重演过去。冷战已经结束。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国防工作及较高薪酬快速消失。美国不再主宰全球汽车和钢铁市场。媒体和网络仍是美国的优势，但是这些领域产生的好工作与过去的技术相比要少得多。所以除非认为有生产力的人才值得活下去，否则我们需要替代方案来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富足的生活。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未来对每个人都绝对公平，但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从跨国公司手中夺取权力的民主社会，因为跨国公司正在设计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届时饥饿和失业将再次变为人类“常”态。只有积极、主动、激进的公民才能找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法。老板让我们不停地工作，让我们走进信息的山洞，在洞内我们只能看到阴影，而不是现实，所以我们必须从老板手中重新夺回时间。我们不能重建十八世纪的城市，绝不能让工

人再次从全球经济过剩的废弃物中拾取残羹剩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自由，实现伟大民主革命尚未兑现的承诺。

迈向未来的新愿景

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是使用充满可能性和变革的语言。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和无限制全球自由市场的人力和环境成本是灾难性的。我们认为当前，大规模的贫穷和失业令人无法忍受。此外，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和不可持续的无限增长和剥削伦理，导致了全球流行病的出现。癌症、肺结核、心脏病、艾滋病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疾病”，与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有关。我们的自然环境正陷入混乱并逐渐毁灭，如臭氧层、雨林、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我们可以从阶级的视角理解这种毁灭，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会威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但是依靠权力、“世界领导人”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充满激进参与式民主和公共责任伦理的世界。不工作的未来说明任何资本主义市场都不可能终结苦难。“没有工作的未来”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公共责任伦理，人们明白有工作需要完成，人人都有义务分担相关工作。这些工作之所以过去没有出现，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本太高了。因此，尽管我们已经有能力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学校还没建成，房子还没盖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医疗保健，空气也不够洁净，依然有人食不果腹。只有在一个人的生命高于市场成本的世界中，我们才能重新确立并保证所有人都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当然，如果无法好好保护地球生态的话，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必须展开根本斗争。为争取每周 30 小时、每天 6 小时、没有加班、收入不降的工作而斗争，这对于保证体面的生活标准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大众民主伟大梦想的复兴来说也非常重要，大众民主即所有人在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享有决策权。要想创造新机会、保证工人健康就需要

减少工作时间。既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加班才能生存，那么即使减少货币工资，也不一定会降低生活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方案。例如，多个西欧国家均对医疗保健、住房和很多其他公共财产的成本进行去商品化。

以下是我们对去商品化的定义。与私有化不同，相关服务变成了“普适权利”，通过公共税收来支付其成本。服务首先按需分配，然后才考虑成本。对于领着平均工资的普通人来说，这一方案是否会产生更多的花费？如果我们将一部分国防预算转为社会工资（即满足社会基本需要而非私人特殊需要的资金），重新制定一套谁赚钱多谁就要缴费的累进税制，那么就不会产生太多的花费。公司和富人不再享受公共福利，不再能钻税法的空子，人们再不能逃避缴税。去商品化会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好日子将不再是一项特权，不再是在特定时代和地点偶然出现的东西，好日子将成为一种权利。去商品化不仅将从市场上消除核心生活必需品，还将消除作为商品的工人本身。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目前仍然受制于利润法则，对其进行的去商品化也只是更大斗争的开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生活不再由工作主宰、不再“捉襟见肘”的世界。没了负担，人人可以成为公民，在社区和其他政治和公民领域参与规则制定，而不用附和他人制定规则了。广泛的民主参与需要空闲时间，之前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空闲时间，而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人人都能享受空闲时间了。现在，我们对公民身份的定义也不再以投票为中心，而是以治理为中心，以集体管理生活为中心了。

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世界越变越小，所以我们不能再用国界来限制愿景或斗争了。以美国公司为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终将蔓延至其他地方。

正如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场为赢得八小时工作制而展开的伟大

斗争一样，我们也想发起一场缩短工作时间的国际运动，在欧洲保留、在其他地方建立有保障收入制度，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其他公共服务。

为建立一个超越强制性劳动、以人类自由为社会生活衡量标准的世界，我们提出以下方案：

1、有保障收入制度：每个人都将获得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其中包括营养、住房、穿着、交通和休闲要求。每个人都将承担整个社区的生产和维护责任。健全的男女将分担保持环境清洁健康工作，并且负责为其他成员提供各种服务设施，例如教育、娱乐和文化发展。如果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收入，私营部门将付给工人高于有保障收入的工资，以激励他们。（毕竟，这才是最低工资的设立初衷：通过提高底层的生活水平，提高整体生活水平。就算大多数人赚得更多，工资底线还是根据基本足够的收入水平进行计算的。）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将进一步开发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将以更多公共服务和更短时间的形式进行分享。

因为有了收入保障，所以不再设立福利部门，依赖的堕落恶性循环也将不复存在。诸如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工作之类的服务，将通过累计所得税制度实现扩大并募集资金。结果，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工作视角，其重心不再是为购买消费品而工作，而变成了为解决问题、探索各种可能性、探寻新的生活伦理、社会和个人生活方式而工作。

2、激进参与式民主：随着工作终结，我们无需再将时间束缚在利润需求之上，我们最终将获得时间，真正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我们将最终获得时间来构想替代方案，构想建设美好未来的可能性。随着工作时间逐渐减少，我们将让所有人都参与到民主决策中去。举例来说，用电子邮件和网络来提供信息，有助于让更多人知道相关信息。这取决于计算机的可用性和培训。通过改善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公民社会，其中所有成员均可参与到针对政治、经济、文化、

环境和休闲的话语中来。我们将以个人自由结社的形式通过大众集会来进行决策。这将创造大众政治。

从不断工作中解放出来时间，赋予普通人新权力，以参与日常政治和社会事务，是个体解放的先决条件，个体将因此获得管理生活的自由。但是除了参与公民事务，还有很多。八小时运动的口号是“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目标。我们的时间因为各种义务而变得少得可怜。尽管其中有些义务既必要的也令人愉快，还有很多义务并非如此。减少工作时间会增加用于提高自身能力的时间，会增加自我娱乐的时间，也包括远离外部权威，进行个人享受。

3、新劳工政策：我们需要考虑技术变革的步伐，考虑企业重组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我们必须根据对个人和社区的影响来衡量这些发展。尽管我们不反对技术创新，不反对通过工作重组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它们必须接受公众审查，相关规划也应邀请公众参与。在工作场所推行民主决策可以在个人、社会和环境层面对人类生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开发新技术的成本必须由公司承担，公司将对公众负责。其成本既根据工作和工资损失来衡量，根据其对社区和区域机构和服务的影响来衡量，也根据开展业务、取消生产基地计划的潜在环境危害来衡量。拥有稳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生物圈，对于人类生存来说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一样重要。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可能会需要通过服从生态和民主标准，对生产、商务和技术创新进行重新调整。在这方面，科层监管机构将不再拥有最终裁定权。感染艾滋病的人在确定新药研究预算、优先事项和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艾滋病政策一样，工人及其工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将在企业层面和监管机构层面对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拥有实质性的发言权。

4、缩短工作时间：自 1938 年以来，美国的法定工作时间就没有出现过大幅减少了。相反，因为很多雇主需要用加班来弥补罚款或收入不足，工作时间不减反增。对新技术效益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只有公司、一些专业人员和企业家才享受到其效益。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新技术只产生了不安全感，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工作，损失了工资，不得不从事兼职或临时性的工作。是时候让大多数人从缩短工作时间中受益了。因此，我们要求在不降低薪水的前提下规定每天工作六个小时并取消加班，除了非强制性加班。这将使那些依靠加班勉强为生的人感到焦虑。收入保障和医疗保健、教育成本的去商品化，将有助于一些人减少收入损失。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直有到少数人的标准也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人时，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才能出现真正的提高。除非所有人都不再遭受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伤害，否则一些人已经拥有的特权将面临风险。

5、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高等教育：新技术需要增加知识性的工作。应该向所有人持续不断地提供从事相关工作所需的教育。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和新身份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一个更全球化的世界而接受教育。这就需要一套全球性的课程，来代替以欧洲为中心的课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需再读《哈姆雷特》和希腊哲学了，而是意味着我们既需要读莎士比亚，也需要读非洲民间故事、印度和中国哲学。一套全球化的课程需要给教育留出更多的时间，就像曾经给科学和哲学的新发展留出更多时间那样。每个人在任何年龄都能以个人发展为目的，追求自己的教育目标，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当我们将自己从无穷无尽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时，教育便不仅仅是为了就业而存在了。在后工作的世界中，学生的知识兴趣和美学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学生将根据自身需要而不仅仅是工作要求来决定接受还是放弃教育。

6、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尽管存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我们的公路、桥梁、供水系统、学校和公园仍然需要重建和修复。我们需要在全国各

个城市建立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样才能逐步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我们需要对环境和公共空间进行维护和翻新，需要对人进行药物和情感护理。癌症、心脏病、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既需要研究也需要大量的护理设施。

7、人们不仅仅依靠面包而活：大萧条时期和六十年代，国家曾经不吝为艺术提供公共资金。而当一些反动的政治家们发现罗斯福新政艺术计划的受益者中也包含激进分子时，便叫停了该计划。到了九十年代，另一批反动分子解散了资金更为丰厚的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因为基金会也给异见艺术家提供拨款，特别是那些破坏清教主义性原则的人。创造视觉、文字和音乐艺术，是新公共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通常不支持大多数人进行文化生产，特别是那些启发我们以不同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我们需要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建立一个资金丰厚的国家级计划，艺术家们得向我们进行自由宣讲，我们将反对所有以道德为借口的审查。

8、我们想要普及公共服务，所有工作均由大家分担，包括脏活累活：事实上我们建议公共服务岗位的薪水以逆向付酬（reverse renumeration）为原则。这意味着工作越辛苦，越有助于增加公共品，工资就越高，例如垃圾收集、街道清理、重工业工作、重复性的科层制工作、照顾小孩和老人等。随着工作价值实现增长，新技术得到开发，上述工作所需的时间将会缩短。这就是在参与式民主的世界中我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在后工作的世界里，人类将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不用说整个计划，要想实现上述内容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黑人自由、同性恋和生态运动——建立新的联盟。斗争将在车间展开，在社区展开，在各个层级的立法机构中展开。我们相信本宣言可以作为劳工运动复兴的组织方案。那些觉得工会不会传达他们内心想法的知识分子、体力工作者和文员们，现在

有理由参加新的劳工运动了。如果我们的分析准确的话，美国两党都不可能支持运动。我们需要对将很多运动同民主党联系在一起的观点重新进行审视。我们认为，只有劳动与社会运动形成独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才有可能找到现行政治体系的替代方案，后者已经形成了代表跨国资本利益的共识。要想突破这一共识绝非易事。有些人仍然抱有单一政党体制足以孕育激进变革的幻想。有些人已经彻底绝望，认为任何政治替代方案都是毫无希望、不切实际的。尽管如果不与过去进行彻底决裂，将不可能实现本方案，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在此提出的方案是非常现实的。无论如何，考虑到主导性政治文化的空洞性，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超越工薪制社会[1]

■　安德列·高兹 *

郑双涛 译 王行坤 校 **

一、作为关键社会问题的多元活动（multiactivité）

人们对于一份固定且充足收入的迫切需求是一码事。去行动、奋斗从而证明自己并得到他人欣赏的需求，却是另外一码事。资本主义将这两种需求系统地联系起来并加以合并，基于这种合并资本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实现了对人类思维的意识形态掌控。除“工作”以外，资本不认可其他任何活动。除了从“工作”中获取的薪酬，它不承认任何其他固定收入。对固定收入的迫切需求被用来说服人们，他们“对工作有着迫切需求”。行动、奋斗从而得到他人欣赏的需求被用来说服人们，无论做什么，他们都需要得到报酬。

因为（无论是必要的还是过剩的）社会生产对工作量的要求越来越低，在薪酬收入上所体现的分配份额也越来越少，因此，想要从有偿工作中谋取一份充足、固定的收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资本术语”的角度来说，这种困难被归因为“工作的紧缺”。这其实遮蔽了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并非工作紧缺，而是财富分配失当。目前的财富是由雇佣越来越少的资本所创造出来的。

---

*　本文译自 André Gorz, *Misères du présent, Richesse du possible,* Paris : Galilée (collection Débats), 1997。校对时参考了英译本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trans, Chris Turn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校者注。

**　郑双涛，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 20 载。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本文译自 André Gorz, Misères du présent, Richesse du possible, Paris : Galilée (collection Débats), 1997。校对时参考了英译本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trans, Chris Turn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校者注。

当前局势的补救措施显然不是“创造工作”，而是要对社会中的必要工作和创造出来的财富实现最优分配。这样做的效果将是，资本主义人为合并的事物将再次分道扬镳：人类拥有充足、固定收入的权利将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长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行动、奋斗和得到他人欣赏的需求将不再采取听命于他人的有偿劳动形式。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中，这样的工作所占据的时间都将越来越少。人们将有能力在广泛的活动范围内做出取舍，规划自己的生活，而这些活动不会把报酬或盈利作为它们必要的条件或目标。社会关系、合作纽带和个体人生的意义将会由这些与资本无关的活动来创造。工作时间将不再是主导性的社会时间。

大致来说，这些就是未来社会和文明的大致图景了，新的社会和文明正在用尽全力突破这个工薪制社会。它们与目前正在发生的文化转变相一致。它们与民众对多元活动的生活的渴求相一致，在这种生活中，人人都能够将工作限制在特定场所之内，而不是将自己的生活降格为“工作”枷锁所宽限的有限时间。但是，这种新的图景却是以一个政治上的突破为前提，这种突破与当下的文化变迁以令人困惑的方式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突破同等重要。它的另外一个前提是，行动、并且得到社会承认的需求应摆脱听命于他人的有偿工作；工作本身应摆脱资本的宰制；人类摆脱工作的支配，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实现自我。简言之，它的大前提是彻底消灭资本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霸权所赖以存在的（前述两码事的）合并。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总结出该问题的根源与核心冲突：要么工作融入多元活动的生活之中，成为其组成部分；或者多元活动本身被融入“工作”，成为其形式之一。要么工作时间被整合进多维生活差异化的时间体制之中，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上的渴望保持一致；要么人类的生活节奏与资本的步调保持一致，满足资本对于盈利的需求和公司对“弹性”的

需求。总之，我们可以让生产的机制和社会进程服从于生活行为的力量，也可以让这些生活行为更加彻底地屈从于生产的机制和进程。在掌控时间的权力问题背后，不过是权力的问题：权力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配，以及社会前进的方向。掌控时间的权利，以及掌控用于进行多样化活动的时间的权利是文化冲突的核心问题，而这种文化冲突势必会蔓延到政治冲突中去。

这种冲突已经不能算是新鲜事物了。但是它有两个新趋势：一是不可避免，再就是日益重要。大多数劳动人民在“文化”观念上所渴望的多元活动并非简单反映了他们个体私密的欲望和愿望。它并不仅仅是个体对自主的渴求所表现出的形式。它是自主能力在主体中的体现，而这种能力是“非物质经济”和企业本身向企业员工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对多元活动的渴望中，劳动人民现在希望夺回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主的能力，同时让这种能力超越企业所设置的限制和要求。自然，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且，这种争斗涉及到自主的程度和范围——**对自身的自主权利**：行动权和自决权。总之，它涉及到**对自主的自主**，在这里意味着，它并非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并且服从于竞争和利润的命令，而是被当做一种至关重要的价值，其他一切观念都依赖它，并将其作为衡量参照物。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视企业需求的民众自主性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摆脱资本权力、市场权力以及经济领域权力的可能性，即在摆脱了工作的时间内所展开活动的领域。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两个方案来具体阐述“多元活动”，这两个方案已经提交法国的公众讨论。方案一走的是典型的雇主路线，将民众——得到严格限制——的自主视为增进工作弹性和生产力的手段。方案二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将“多元活动”视为社会问题：在其远景中，从现在开始要改变每个人的生活重心，这样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和工作行为将仅仅占据从属地位。

1. 方案一是法国规划总署办公室在“二十年后的工作”报告（布瓦松纳 [Boissonnat] 报告”）中制定的。报告提及了“多元活动”的理念，这是之前在管理界讨论过的议题，该报告构想了一个企业为员工提供所谓的“活动合同”的蓝图。这些合同的主要功能是，当企业在一定时间内不需要工人付出劳动时，仍然维持工人和“他们的”企业之间的纽带关系。“活动合同”的主要目标是增进劳动力的“弹性”，在保证工作稳定和杜绝临时工的基础上，让雇佣关系变得更具非连续性。

其实，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方式一：由几家公司出面，联合培养自己的永久性员工（这也是最初雇主们所讨论的“多元工作”的本义）。当某一家或几家当事公司有员工闲置情况发生时，他们可以将暂时闲置的部分员工租赁给暂时劳动力短缺的相关公司。简言之，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为几家公司的联合管理服务。这样，他们就能携手管理自己的员工团队，保证他们得到最理性的利用。同时，在不经常求助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前提下，应对市场需求上的波动。

布瓦松纳报告将这一“多元活动”的理念拓展到一些新领域内。当某个企业群体不需要他们的某些雇员时，他们可以将自己暂时闲置的过剩劳动力借给“其他公立或私营机构使用，比如：地方社团、学校或各式各样的组织等等”，或者允许这些雇员放“社会福利假（比如探亲假）”或“培训假”[2]。

但是，请别误会，认为这批休假员工能由着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以外的活动，去拓展自己的兴趣、技能，丰富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该报告的作者们清晰地阐明，“包括培训、自由职业行为或志愿活动在

2　参见 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 *Le Travail dans 20 ans*, Odile Jacob/La Documentation francaise, Paris, 1995, pp. 30-31。

内的各种工作形式”必须要与“所签署合同之企业的集体或特殊利益[3]”保持一致。虽然他们休的是“社会福利假”，但是，这些工人不能跳出为自己企业服务的圈子，即使是他们自选的志愿活动或文化活动。他们依然受自己雇主的逻辑和控制所限，在生产主义的狭隘空间之内，在自己生涯短暂的间歇期内处处受限。“人的自主性”在这里被工具化，目的还是为“生产用途”[4]（utilité productive）服务。最后，“活动合同”强化了生产主义的逻辑和工作以外的活动对企业利益的服从，即使这些活动适合在非雇佣时间从事。

2. 青年领袖中心（CJD）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他们反对雇主“多元活动”的观念，提出“放任个体重新掌管自己时间”的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对时间的规划利用将代表“未来几十年的真正财富”，还能“结束对经济领域的从属关系。如果我们想把这种处置时间资本的能力重新分配给所有公民，那么他们就必须摆脱僵化的时间表——从以谋生为目的人生需求模式中解脱出来”[5]。

CJD 所提倡的方式跟我们之前提倡的理念非常吻合，在“永久协商”框架之下，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角度，都能做到削减工作时间（前者为一到几年以上，后者为一周到一个月以上，每个工人都能选择并调整自己的工作时段）。企业保障“员工收入和岗位的安全，”换言之，保证他们非连续性工作下持续获取收入的权利，而非持续性工作依据的是以员工本人的选择。“工作时间选择权”势必将衍生出新的对待工作的方式，“它将帮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参与集体生活、参与社会方式的道

3　Ibid., pp. 286-288.

4　Ibid., p. 282.

5　参见 Centre des jeunes dirigeants, *L'Entreprise au XXIe siècle*, Flammarion, Paris, 1996, p. 125。

路[6]。”“企业因为薪酬制工作在民众生活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将荡然无存……无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在整个社会，都需要对工作的组织方式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从而为一系列的变革提供原动力[7]。”工薪制社会将不得不为“多元活动”社会让路。对失业的回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再社会化进程的排斥和需求，必然需要多元活动的增加和社会支持的多元化。正因如此，才需要多方面的收入来源：“社会应该要求商界打破雇佣的枷锁，允许人民依照自己的步幅逐步进入多元活动活动的逻辑……相反，构建适当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则是社会的职责所在[8]。”

在此境况下，出发点显然是出于政治考量。“多元活动”和削弱工作和公司“过度的重要性”，这些**都是通过共同愿望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个共同愿望要通过社会变革来找到集体表达和政治实现**。该变革对于一个社会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在这样的社会之中，通过充分利用生产力的创新特征，个人和企业都能实现兴盛繁荣。如果这个社会想要长久稳固，必须对其进行如此组织：灵活的、非连续的和不断演变的工作形式必然要带来新的社会性和凝聚形式。

无论在其他方面有哪些局限性，CJD 在这里都超越了传统主流思维，因为它清晰地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企业”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只当该社会让所有企业都向往这种社会时，才能真正出现**。这种以“多元活动和协定时间”为基础的社会必须让个人和企业真心接受，才能真正确立。它必须因为**如下意愿而得到确立，通过这种意愿，自主和“丰**

6　Ibid., pp. 43-44.

7　Ibid., p. 11.

8　Ibid., p. 119-120.

富的个性”——这也是企业所需要的——超越其生产性功能，同时永远不会被化约为这种功能。

简而言之，我们应该依据源自于不断强化的个人自主性的意愿来反思社会，而非从资本束缚和控制这种自主性的需求角度来认识社会。这种方法对我们的政治任务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后福特主义企业让它们无力掌控的工人“臣服”所赖以维持的社会条件将烟消云散，而与之相应的，资本对劳工的操控也将随之消失。CJD 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普遍智能”理论相呼应：

当今价值的源泉在于智能和想象力。价值体现在非物质事物之中。人类知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操控机器的时间。作为自己知识资本的持有者，个人也是公司部分资本的持有者。

这种价值转变将在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区分将越来越明显。公司将被赋予一种与正式股份公司完全不同的人格。如果 [人人] 都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份额，那他们也将掌握更多的公司价值，因此，就有必要通过共同协商来处理公司日常组织、运作、以及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在未来，谁又能将自己视为公司的所有者呢？[9]

让我们说清楚：雇佣劳动必须消失，资本主义也必须随之消失。

如果搞清楚这种设想的意义和后果，那么多元活动的社会就不仅仅是“工薪制社会”的改良版本了。它标志着一个重大突破，导致了质变。如果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这样的多元活动，比起为社会创造一个“法律和政治框架”或让“企业摆脱雇佣关系的控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为了多元活动的发展，社会将不得不出台一**

9　Ibid., p. 27-28.

系列具体政策来实现自我重组。必须把社会时间和空间组织起来，来体现出这样一种普遍的期待：人人都会参与一系列不同的社会活动，扮演不同的社会成员角色。 标准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属于——或至少每个人都能加入——自给自足的合作社、服务交流网络、科研实验小组、管弦乐队或合唱团、戏剧、舞蹈、或绘画工作室、体育俱乐部，瑜伽或柔道团体等；并且，在这样的体育或艺术“社团”之内，目标并非选拔、淘汰个体或排定个体的名次，而是**鼓励每个成员在与他人的竞争性合作中实现自我更新和超越，这种人人对超越自己的追求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这就是“基于文化的”社会（其西方原型为雅典社会）与基于工作的社会之间的区别。

出路

我现在试着勾勒出一整套打破工薪制社会的“整套的具体政策”，这套政策会有助于构建以多元活动和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尝试还处于试验探索阶段，它所追求的目标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一些人提出的“革命性改良”相类似：

一、首先，我们必须解放民众的思想和想象力，让他们摆脱主导性的社会话语所依赖的那些不容置疑的假设。我们必须对探索其他形式的生产合作、交流、团结和生活的模范经验进行深入彻底的考察。

二、我们必须采纳一个全新社会与经济的视角，这种新的社会与经济已经出现在当下变化的地平线上，并且代表了正在解体的社会的最终命运。一方面，这会敦促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些变化的意义，更好地领略到破茧而出的新事物的梗概。另一方面，这也迫使我们去领会到：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局势不是通过恢复过去局势就能解决的“危机”，而

是一种转变，在该转变过程中，资本摧毁了它自身存在的根基，同时也为超越自身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有必要知道，如何紧紧把握住这些条件，以及如何从其最终可理解的术语出发，来思考这个过渡的过程。因为，只有在那种最终形态的烛照之下，我们才能做出判断：自己能做什么，或者没能做到什么。

三、最后，我们要“让社会与资本主义尽可能保持距离”，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地扩大让另类社会性得以生产的空间和资源，这些另类社会性会让独立于资本和国家机器的多样的生活方式、合作与活动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将“走出资本主义”的路径数量最大化。“走出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圣经里的“出埃及记”(Exodus) 而得到理解，后者正是在人们迈步前行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自己的“应许之地”。

那些有权决定是否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们不会成为正在艰难诞生的新社会中的行动者。我们唯一能对政治所提的要求就是，创造一个可供另类社会实践发展的空间。因此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估一个允许和鼓励多元活动的政治安排，这里的多元活动既是“出埃及”的源动力，也是其最终目标，既要削弱工资关系的重要性，也要用不同的合作模式来代替“工作”。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与“改造城市”的政策目标相关，社会环境的变化加快了改造思维方式的速度，而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社会环境也获得了发展动力。系统理论家把这些能导致自身效应成因的效应称之为“反馈循环”。

福斯托·贝尔蒂诺蒂（Fausto Bertinotti）为这一切作出了相当精彩的阐释，而且并未夸大政党在“革命性的抉择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因为革命性的抉择可能意味着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将与过去的决裂、对主体性的新的组织、具体经验和‘模范’制度层面的建设、以及研

发新理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为全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提出的建议，必须**同时发挥**两大要素的功效。要素 1：回答“怎么办”问题；要素 2：关于“全新的社会”，“不同的发展”和“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的蓝图。从而基于共同的视角，将大家的愿望和经验汇集在一起，而在以往，由于缺乏彼此沟通，它们仅能以割裂的形式表达出来[10]。”

这些愿望和经验包括超越市场、金钱和劳动的性别分工逻辑的新的社会关系；包括雇佣劳动范畴之外的新的时间领域；包括尊重自然平衡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新的人与环境关系等等。而且，这一切的核心是个人和集体对时间和时间组织的重新占有。

阐明这一点很重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演化进程之中，就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证明，社会演化成这个样子，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正是本着这个精神，我现在简要概括一下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整套政策”。每条政策都有可取性，但是，只有当和其他政策相结合，并相互支撑，每条政策才能体现出它们真正的意义。可以说，每条政策都已露出端倪。但是，每一条孤立的政策都可能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让其失去吸引力。下面，我将介绍这一整套政策的主要目标，如下所示：

1. 保障所有人享有足够的收入；

2. 把对工作的再分配和个体与集体对时间的掌控结合起来；

3. 鼓励新的社交活动繁荣发展，激励新的合作和交流模式，通过这些模式，超越工资关系的社会纽带和社会凝聚力就会被创造出来。

10　参见 Fausto Bertinotti, ‘Una domanda’, *Il Manifesto,* 26 January 1996。

有保障收入

收入有保障是建构在多元活动社会的首要前提。但是，收入不够（1）或足够（2）使获益人远离贫困，并无条件地保证每个人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这二者将会产生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效果。

（1）收入不够。低于贫困线以下级别的基本收入保障，它起的作用不外乎就是逼迫那些失业人口廉价地接受肮脏的、地位低下的工作。基本收入保障的倡导者们希望看到，这可以用来替代多数的收入再分配形式（例如：家庭补助，住房基金，失业和疾病津贴，基本国家养老金等等）。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nite）新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同时也是像米茨克（Mitschke）这样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和英国保守派的立场。他们认为，失业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很多低技能和低生产力的潜在工作在正常工资率条件下根本无利可图。因此，这些工作必须得到补贴。途径就是允许工人将微薄的基本社会收入与同样微薄的工作收入叠加起来。这样就会创造出一个“二级劳动力市场”，免受低收入国家的竞争的压力，同时也免受注定退出历史舞台的劳动立法条款的“保护”。基本收入越少，就越能“鼓励”人们什么工作都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奴隶主”利用不守信用的投机行为去雇佣廉价劳动力，给他们提供以合同和外包合同为基础的服务性工作。

1996 年 7 月下旬，美国工作福利制（workfare）政策由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批准。该政策让公民享受微薄福利津贴的权利与他们替某市政府或授权机构履行“社会公用事业”中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工作义务相挂钩。

工作福利制度在法国和英国拥有很多支持者——在德国，市政当局已经开始威胁长期失业者，如果他们不从事“公用事业”（例如：清洁，土方工程，清理工作，等等）——为此市政当局给这些失业人士每小时支付 2 马克，用于支付他们的交通和服装开支——就会取消他们的福利。

所有形式的工作福利制都会把失业者诬蔑为能力低下者和骗子，认为社会有权强迫他们去工作——这是为了他们好。这样，社会就可以确定失业现象的根本原因：失业者本身就是原因。据说，他们没有工作所需的社会技能和必要的意志力，所以他们才应该承担最最粗鄙的任务。事实上，非熟练工的高失业率并非由于他们缺乏专业技能，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在法国和德国）三分之一的熟练工或高技能人员都从事着非技术类职业（因为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而抢走了那些通常能填补这些岗位空缺的人的饭碗。因此不应该用基本收入来补贴非技术工作，而是应该通过大幅度降低这些岗位的工作时间，对再分配的技术性工作进行补贴。

但是，极度保守的工作福利制观念确实是与后福特主义观念并存，主要的支持者就是约兰 · 布列松（Yoland Bresson）等人。布列松主张，人人每月都应当无条件地领取 1800 法郎的“生存收入”（revenu d’existence）。这笔收入将起到全部或部分失业救济金的作用，同时还能激励人们接受工资和时间都非常灵活的临时兼职工作。“未来就是一个以非连续雇佣关系为标志的存在，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有办法融入新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收入仅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11]。”

根据这个理念，“生存收入”是为了使就业具有间歇性，甚至有

11 参见 Yoland Bresson, *Partage*, February–March 1995。

可能鼓励这种间歇性就业方式。但是，谁会从中获益呢？问题就在这里。实际上，一份微薄的“生存收入”是对雇主的补贴。这可以让他们以低于最基本生存水平的工资找到劳动力。但是，虽然雇主得到了利好，这可是对工人的欺压。由于不能保证有足够的基本收入，工人不得不一直充当某种散工或临时工，因此他们无法以多元活动为基础去自由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收入”极大地推动了工薪制关系的解除，让雇佣关系变得更不安全和更具“灵活性”，用商业合同替代了雇佣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非连续性工作上要求持续收入所固有的几个陷阱。当然，除非这些工作的断裂和非连续性反映的不是资本对劳动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反映从事工作的个体和集体掌控如何管理自己时间的权利。我们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个话题。

（2）赋予每个公民足够的社会收入遵循相反的逻辑：其目的不是强迫接受者无条件接受任何形式的工作，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劳动力市场的束缚。基本社会收入必须让他们有权利对工作说“不！”，去抵制那些“不人道”的工作条件。而且，它必须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个社会环境让所有公民都能一贯地在自己时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作出取舍：也就是，要么他们出售工作时间来获取“效用”，要么自己使用这些时间来为自己提供这些效用。

这种普遍的足够收入（我将在下文中做出更详尽的解答）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援助形式，更不是一种放任个体完全依赖福利国家的社会保护形式。它必须被理解成一个主要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称之为“生成性政策[12]”（politique générative）的关键案例。也就是说，它必须为个人和群体提供更多的资源，让他们掌控自己的

12 参见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人生和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条件。其目的不是让人们根本不工作，而是真正落实人民工作的权利：不是让人们享受“受雇用”工作的权利，而是人们享受与不和薪酬挂钩的具体工作的权利，这一切都和盈利或交换价值没有半点关系。

因此，为所有公民提供足够的基本收入，必须与开发和获取能促进和鼓励自我活动的资源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个体和群体也可以通过不受任何束缚的努力，来部分满足自己所定义的需求和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足够收入确切金额的讨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些讨论让人们看不清楚目前社会变革所真正引发的问题的本质，想当然地把这个变革设定在工薪制社会的框架之内，并试图通过财政再分配的方式来为全民拨款埋单。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思考背景的就是这么一个前景：就业率降低，劳动力和服务的销路变窄，但是在非货币交换和自助服务领域内的集体事业和服务会有所增长。根据弗里斯杰夫·伯格曼教授（Frithjof Bergmann）的说法，高科技自助服务可以用每周两天的工作满足 70%的需求和欲望。

目前正在辩论的方案可能使我们更接近这一最终目标，也可能让我们远离它；这些方案即有打开潜在未来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关闭它；它们可能会揭示出与现行制度决裂的需求，或是无视这个需求。正是出于这些考量，我们务必要对这些方案作出决断。

实际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普遍发放足够的社会收入也是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主张，他们的目的不是重新分配或“分享”就业，而是废除雇佣劳动和强迫性劳动，扫除资本

主义企业和国家。其支持者有：二十世纪初的贝拉米（Bellamy）[13] 和波普 · 林克库斯（Popper-Lynkeus）[14]；笃信雅克 · 杜博因（Jacques Duboin）[15] 理论的法国“分产主义者”（distributist）[1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蒲鲁东主义的“新秩序”知识分子运动中的罗伯特 · 阿隆（Robert Aron），阿诺 · 丹迪奥（Arnaud Dandieuc）和亚历山大 · 马克（Alexandre Marc）；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保罗 · 古德曼（Paul Goodman）；除此以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少有一些德国的“绿党”人士重新发现了这一传统，并将其中一些理念加以修改，应用到现状中来。

多年以来，我一直拒绝能使民众“不需工作就能生活”的社会收入观念。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与罗尔斯的门徒完全相悖的理由。罗尔斯的门徒认为，“工作”本身即是“善”，必须以正义的名义将其公平分配。但是，“工作”不是一种“善”。它只是一个根据社会定义的规范，按照社会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实施的必要活动而已。工作让人们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它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工作赋予民众以社会承认，社交活动和各种民权，因为它本身被当成是一种义务。这样，“工作”就诱导人们走出自己的私密圈子；它是公民身份的一个方面。它（在人们从事工作的时候）更为根本地代表了人们——超越自身特定的社会身份——掌控自我和周遭世界的能力，而这是发展人类能力所必须的。

13　应该是写作《回顾》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 • 贝拉米（1850-1898）。——校者注。

14　林克库斯（Josef Popper-Lynkeus, 1838-1921）：奥地利学者、作家、发明家。——校者注。

15　杜博因（1878-1976）：法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校者注。

16　其“分产主义”理论认为为了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把购买力即货币直接分配给人民，而不需要银行系统。——校者注。

随着所需要的工作越来越少，出于公平考虑，工作在每人生活的比重也应该降低，工作的负担应由人类公平分担。这就是为什么，在之前的作品中，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获得全额收入的保障，应该与所有完成财富生产所需工作量的公民相挂钩，他们的收入恰恰源自于这笔财富。比方说，我们可以采取 20,000 小时的计算形式，可以根据个人愿望，把这 20,000 小时分成无数个“分段期”，前提是两个分段期之间的间隔不超过一定时长就可以。

从 1983 年到现在，我就一直提倡采用这种方法，这与雇佣劳动和“价值规律”消失的前景若合符节：有保障社会收入不再是工资[17]。这与夺回、并重新掌控时间的目标相一致。但是这与后福特主义所体现的观点和所带来的变化并不一致。因此，我要放弃这种方法。

对无条件性的捍卫

（1）当智能和想象力（“普遍智能”）成为主要生产力时，工作时间不再是度量劳动的尺度；事实上，劳动成为不可度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可能与生产它所耗的时间无关。它可能因人而异差距巨大，也可能取决于工作到底是物质性还是非物质性的。最后，按每周工作时间付酬的稳定就业处于迅速下降的趋势。想给每个人在确定时间内要完成的不可减少的工作量来定个范围，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度量自由工作者、工匠或无形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时间更是不可能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提供基本的社会收入，才能激励这些人，去削

17　参见 André Gorz,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 Malcolm Imrie, Pluto Press, London, 1985, pp. 40-44。

减自己的职业活动，过上多元活动的生活。

职场现状决定了，雇主分配用来支付劳动力的薪资份额越来越少。因此，只有支付基本收入，才能帮助劳动者不会简单为一点微薄收入而去人头攒动的劳动市场挤个头破血流。因此（我在下文中将详细说明），普遍、无条件地提供基本收入，是尽可能广泛地重新分配带薪工作和无偿活动的最佳手段。

（2）无条件享有基本收入权利无疑会引发一些断然反对的声音。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越来越多的“寄生虫”依赖他人的工作而生活呢？其他人难道会甘心背负这种负担，无视这种社会懒散现象吗？他们会不会呼吁通过工作福利制或强制性社区服务的形式，来强制人们工作呢？

许多支持普遍收入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提出了这些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也遭遇到以下困难：为了换取基本生活费，要求人们强制劳动有哪些工作内容呢？当经济中工作的重要性下降时，又如何去定义、度量和分配这样的工作呢？他们如何避免强制性工作和通常的有偿公共活动和工作竞争，甚至是破坏越来越多的有偿公共活动和工作？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其他人都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这种强制性工作放入到第三类活动的范畴之内，这种活动满足在市场经济中无法支付或盈利的需求。这是“志愿关爱工作或教育活动，与授权组织合作的社区工作”。这样，普遍的津贴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后工业国内部门[18]”。它将为授权的非

18　参见 Claus Offe, ‘Freiwillig auf die Anteilnahme am Arbeitsmarkt verzich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 19 July 1995。

营利机构的志愿工作支付报酬。这将使“志愿”工作成为义务。

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伴随着收入权，拥有健全身体的成年人也有义务承担一些无偿的家务劳动，关爱和照顾那些缺乏自我照顾能力的人。已经在照顾年轻人、老年人、病人或残疾人士的人员除外[19]。”

因此，在奥费案例（Offe）之中，人们对通过与正常雇佣不构成竞争关系的工作换取回报的关注会产生强制性志愿工作的荒谬前景。这一规定的不利影响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真正的志愿者会联合他人一起“强迫”另一批志愿者，而且很有可能另一批志愿者会被当作二等工人，被分配待遇最差的工作，因为他们和真正的志愿者做同样的事情，真正的志愿者是出于信念、不计回报地工作，而他们做这一切似乎（或者被他人怀疑）纯粹出于赚取津贴的目的。强制性志愿工作成为一个陷阱：它贬低了那些被迫工作的志愿者的努力。

在埃尔森案例中，基本收入的受益人履行家务劳动的义务（故意地）模糊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后者等同于前者，并且二者可以互换。通过这种方式，家务活动的私人属性就被剥夺了。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成年人对年长父母的义务都将被设定为社会义务，并置于大众控制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自发行为——自发性对情感价值至关重要——将得到行政上的监督和标准化处理。

在每个案例之中，所发放的基本收入都被认为是用来支付家庭活动的。因此家庭活动也被不可抗拒地划归到 “谋生”活动的范畴之内。

19　参见 Diane Elson,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 November–December 1988, p. 29。

想要享受基本收入，人们要么膝下有子女，要么照顾他人的子女和家庭，要么在“志愿”部门工作。这些活动的一般意义在于无视自我利益，但如今却成为了获得收入的手段。那么，“能被认可为工作”的活动清单就更应顺理成章地延伸到艺术、文化、宗教或体育领域中去了[20]。如果这些活动本身成为获得基本收入资格的手段，那么它们也应该被划入工具理性和行政标准化的范畴之内。

我们必须精准地把握住这里问题的要害。如果我们要把基本收入的普遍赠与与相应的工作表现这个正当理由想挂钩，那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这项工作必须是公共领域的工作并且对人人有益。其次，工作必须以获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是基本收入）为其目标，而不会让薪酬损害工作的意义。如果不能满足后一条件，如果普遍赠与能促进志愿、艺术、文化、家庭和互助类活动的话，那么就必须无条件地保证给每个人发放。只有在无条件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保护那些活动的无条件本质，即完成这些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之前很长时间我都是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如今我也开始站在支持者的角度来考虑足够（而不是最小）的基本收入观的主张。就像阿兰·加耶（Alain Caillé）和艾哈迈德·因泽尔（Ahmet Insel）所说的，这种基本收入“严格来说是无条件的[21]。” 我认为它是维系志愿活动部门的唯一途径，可以保护那些“价值源自于完成过程本身”活动不受社会化和经济化的影响，同时又要让所有人都能够从事这些活动。

（3）基本收入的普遍发放最适合用来应对如下形势：当“一般的科学知识”成为首要的生产力[22]”，当与所谓“非物质经济”中劳动力的能力和技能的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相比，直接工作时间变得

20　参见 Hans-Peter Martin and Harald Schumann, *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Rowohlt, Hamburg, 1996, pp. 12-13。

21　参见 Alain Caillé and Ahmet Insel, ‘Vers un revenu minimum inconditionnel?’, *La Revue de Mauss, 7,* 1st semester 1996, p. 13。

22　参见 Karl Marx, *Grundrisse,*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73, p. 704。

微不足道了。核算经济中完成一小时、一周或一年的的直接工作所需要花在基础培训、持续培训、培训人员的培训等等之上的周数或年数，会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与提供发展后福特主义劳动力中不可或缺的想象力、解释力、分析力、综合力和沟通能力相比，培训本身是一件小事。在“非物质”经济中，“工人既是劳动力本身又是该劳动力的指导者”。工人不能脱离其人身（person）：

> 工人，工作和劳动力往往在自我生产的人身中合而为一。而且这种生产不仅发生在工作场所，而且还发生在学校、餐厅、体育场馆、社区和讨论组，在人们的旅途中，在剧院里和音乐会上，在新闻报章和书籍专著的字里行间等。简言之，只要有人聚集，能产生社会关系的空间，就会有生产活动发生[23]。”

在先进的公司里，继续培训已经是工作（和工作时间）的一部分，并因此得到报酬。但是，将就业合同范围扩大，把培训也包括在内并非没有缺点，因为它让培训权和培训的本质都从属于公司利益。它在个人身上培养出一种功能性的、有限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可控，可支配。相比之下，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个人的发展权成为超越生产功能的无条件的自主权; 这种自主性在各个层面上因为自身而受到重视: 道德(价值判断的自主性) 层面，政治（关于共同善进行决策的自主性）层面，文化（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艺术的创造）层面和生存（自我照料的能力，而不是让专家和当局决定什么对我们有好处）层面。

超越“劳动价值理论”

（4）支持无条件的社会收入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当前趋势正将经济引向死路，因此该观点最适合当前在废墟中破茧重生的经济。资本和劳动力

23　参见 André Gorz, *Strategy for Labour: A Radical Proposal,* Beacon Press, Boston,1967, p. 117。

的投入减少，产生的财富却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生产将缩水的工资分配给越来越少的工人们。越来越多人口的购买力趋于下降。失业，贫困，甚至是赤贫现象正在蔓延。劳动和资本生产力的迅速增长造成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现象。而资本现在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扩张，要么完全跳过生产性工作的中介（仅仅通过金融或货币市场上的交易），要么把资本集中投资在低工资国家之中。工资规模的缩水以及各国为防止资本撤资给予的税收减免导致了如下现象：那些不能带来短期回报的活动和投资（例如科研，教育，公共服务和设施，环境保护等等）无法获得资助[24]。随着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深入，社会支出和福利持续下降，通常摆在基本社会收入提倡者面前的问题就是，把整个体制的问题概括成：“钱到底从哪里来？” 虽然工作时间不再是所创造财富的尺度，但它仍然是收入分配的基础，而且在绝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支出和再分配的基础。因此，经济体系内部的趋势是，那些被征收和再分配的金额，要涵盖个人和社会集体需求，并最终超过因为生产和为了生产而分配的数额。不但基本收入的普遍授予不能在此基础上得到资助，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在英国和美国是非常明显的）。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用下面这则比喻归纳了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天堂之中，那会发生什么？如果不用工作就能随便享用所有商品和服务，那么人们去工作就什么也得不到。失业就意味着没有工资。结果就是，除非制定出适当的新收入政策来应对新的技术条件，否则所有人都会在天堂里饿肚子[25]。”

列昂惕夫并没有明确说明他脑海中的新收入政策，但是雅克·杜

24　参见 D. Eisel and G.Erb, ‘Vom Elend des kapitalistischen «Sozialstaates»,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 4, 1996, p. 351。

25　参见 Wassily W. Leontief,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 and Income’, *Scientific American,* 247:3, September 1982, p. 155。

博因早在1931年就已经指明了问题的“出路”——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杜博因并不知道此书）[26]也提到——“支付手段（货币收入）的分配必须与社会所生产出的财富量，而不是与所完成的工作量相对应。”

正如勒内·帕塞特（René Passet）简明扼要的总结，“我们今天眼中的二次分配将成为一次分配”。因为它是“人–机器–组织”一体化的产物，在此体系内，“每个人的具体贡献不再具有可度量性”，“全国的产品成为真正的集体财产……分配问题不再是交换正义，而分配正义的问题[27]”。

支付手段的分配不再采取工资的形式，而采取以杜邦（在他的年代）所称之为“社会收入”的形式。这不再反映所完成劳动的“价值”（也就是说，用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产品的价值），而是反映了社会选择满足的需求、欲望和愿望。它需要创造另一种货币，这种货币不能被囤积，帕赛特采纳杜邦的说法称该种货币为“消费货币”。

这就是目前发展的方向。它们正在让“价值规律”失去效力。实际上，它们要求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价格不再反映包含在产品和劳动资料中的直接劳动力的成本，这种成本正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且，价格体系也不再反映产品的交换价值。价格将必然成为政治价格，价格体系也将反映社会所选择的消费模式和文明模式，也就是社会对生活方式做出的选择。

经过通盘考虑后，基本收入的普遍发放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所生产财富的集中。这是一种汇集，而不是一次“分享”（分享是下一步的

26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首版是到了1939年才在莫斯科的马列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in Moscow）出版；而欧洲大众能看到的版本则是到1953年才由柏林的Dietz出版社出版。

27　参见René Passet, ‘La Sécu entre deux chaises’, *Transversales,* 37, January-February 1996。

工作：你只能在人与人之间分享属于所有人事物，在一开始那件事物却不属于任何人）。帕塞特把这一点表达得相当清楚。在其作品中，他把国民产品视为集体劳动所制造的“真正的集体财产”，同时在这种集体劳动中无法评估每个人的具体贡献。结果就是，“按劳分配”原则失效了。随着塑造物质产品的直接工作被作为首要生产力的“一般科学知识”所取代，或者被该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所取代，“集体劳动者”则倾向于被一个根本不同的虚拟主体所取代……也就是说，被“社会个体”通过自我组织合作与交流来利用技术科学的能力所取代。于是将来的目标就是：通过“将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来“自由地发展个性”，以及根据需要来生产使用价值（我在这里转述了《大纲》的相关内容）。

对于足够、普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的需求符合这样的愿景。它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我们必须在概念上进行论述，并从现在开始就为此做好准备。这个观念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它反映了蕴藏在当前发展背后的最基本和最先进的意义。相反，它昭示出了当下体制的无意义，一方面空前节省了工作时间，但另一方面却让节省下来的时间成为劳动者的灾难，因为这个体制既不能分享时间，也不能分享生产出来的或具有生产性的财富，也不能认识到从事“更高级活动的闲暇和时间”（马克思）的内在价值。它揭示出，这种可支配时间被个体和集体占有的方式是一个主要问题。它昭示了作为关键优点的自主能力——所谓自主能力就是个人和社会有意义地去利用自身可支配时间并乐在其中的能力。它预见到了现有社会中正在浮现的新的社会的趋势。

想要清晰地梳理出这些趋势的导向，这既不是简单的智力消遣也不是自我放纵。澄清这一点对赋予正在发生的变化以最先进的意义的

能力至关重要。同时还有展开行动和实践、拓展冲突舞台的能力，这些行动和实践通过掌控变化来回应最新的发展。无条件地给予基本收入，这个最终目标所指向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工作对人来说将不再是不得不为之事，因为从童年起，每个人都会参与并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体育、科技、手工、政治、哲学、生态、关系和合作活动的繁荣所带来的吸引力；在这种社会中，就像数据库和远程工作资源那样便捷，人们在任何时间都能随时获得生产资料和自我服务的设施；在该社会中，所谓的交换主要是知识的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因此不需要金钱来作为中介；在该社会中，作为主要生产工作形式的非物质性对应于作为固定资本主要形式的非物质性。一旦作为独立的、自动化的力量被淘汰，那么生产性工作将主要由利用社会积累的知识的能力、丰富和交换该知识的能力所构成，而不需要将这种知识换取金钱，同时作为外在的要求强加于个人，同时也不需要让人们强行接受工作的性质、强度和时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可将空闲时间，即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视为固定资本的生产，这个固定资本是指人自己”。[28] 换句话说，空闲时间为发展个人能力（发明，创造，概念和智识方面）创造了条件，从而赋予他们无限的生产力，而他们生产能力的发展——可以等同于固定资本的生产——并非工作，尽管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看，它产生的结果与工作所产生的结果相同。之所以不是工作，是因为它是通过‘普遍将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而实现的。[29] 正是这个“为自己的发展所释放出的时间”，使得他们有机会把“个性的自由发展”，“艺

28　参见 Marx, Grundrisse, pp. 711-712。

29　参见 Ibid., p. 706。

术的，科学的发展”作为目标。[30] 正是这个只需投入非常少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创造无限财富的能力，即“个性的自由发展”再度出现在了生产之中。

换句话说，个人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个性自由发展的结果，而非目标。生产的目标不是为了达到生产或权力的最大化——这是“人”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差别，而是为了节约实现完满生活所必需的工作时间和能量消耗。

1821 年，马克思多次引用一位匿名的李嘉图主义者的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每天工作时间是 6 个小时而非 12 个小时时，这个国家才算得上真正富有。”[31] 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使得让“生产力（尤其是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变得不再必要，并且有可能会把生产活动变为次要活动，这点已经非常清楚了。技术科学赋予人类劳动力“巨大”生产力，这意味着经济理性的内在目标和目的是实现空闲时间的最大化，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真正的经济——节约——包括劳动时间的节约。”[32]“真正的经济”把消灭工作作为其活动的主要的形式。消灭工作、并且用个人活动来取代这种工作，这必须成为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变革来实现这一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变革都有可能实现。

重新分配工作，解放空闲时间

公司一直在缩短工作时间，且一直如此，从未间断。雇主将压缩的工作时间转化为管理工具。事实上，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公司彻底控制全体员工的生活及其工作时间的一种手段。日本汽车公司在英国推出的‘零小时合同’模式，是这种权力最彻底的表现形式，在德国人们称之为“随叫随

30　参见 Ibid。

31　参见 Ibid。

32　参见 Ibid , p. 711。

到的工作”（Arbeit auf Abruf）。在这种体制中，“雇员”不被雇佣，但需要永远“随叫随到”。当公司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会被雇用，雇主按照商定的小时费率支付他们工作时间所应得薪酬。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人们正重返狄更斯时代的日工（虽然目前同样的方案已经在码头和某些城市的中央市场实施了），在清晨雇员来到约定的招聘地点，希望雇主会选中他们，并雇佣他们几个小时。

工作的重新分配是通过剥夺工人掌握自己时间的权力来实现的：根据经济形势或一年中的不同时间，企业灵活雇佣它们长期需要的员工；其他人——临时工，合同工，兼职工或远程工（tele-worker）——则是间歇性和断断续续地工作，或根本不工作。虽然每年的工作总量在减少，但是这些工作正由越来越多的工人分散地来承担（在统计数据上，工作岗位在增加），企业这样做会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全。就业者担心失业（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已经知道近年来失业的时期：六分之一的人已经放弃寻找工作，不再出现在统计数字中）。 对于大约一半的劳动力而言（这些人很快将占多数），区分正常的工作时间和缩减的工作时间已经没什么意义。

我们不得不问，32 小时或 35 小时工作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对诸多类别的工人来说，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即使是换算成年度基准，再加上用来补偿收入损失的支票。

目前我想到的是这样一个人：要么奴隶般地接连从事麦工作[33]（在法国，这类工作有一半都做不到一周； 能延续四周或更长时间的工作只占总数的 5.7%）； 要么上一半时间的班，只拿一半的薪水，或者从事自由职业，在每 4 或 5 周工作一周，工作时间为 75 小时。

无可否认，通过大幅减少那些从事稳定工作员工的周（或月或年）工

33　McJob, 指的是以麦当劳员工为代表的乏味、低薪且少有前途的临时工作。——译者注。

作时间，可以在更多人之间分配稳定的工作。大众汽车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将工作周从 36 小时缩短到 28.8 小时，“大众”最初避免了 30000 人的裁员。但是，由于这项政策没有进一步推进，很快便受到了制约。它并没有阻止工厂临时关闭、劳动力持续萎缩、引入带薪和无薪假期或者非常短时间和间断性工作的新形式。[34]

总之，它表明，只有演变为一种超越公司层面的措施，减少工作时间的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它必须考虑到现有的工作的总量以及稳定、长期工作的比例。如果是为了向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分配更少的工作量，增加稳定的长期工作的比例，同时为工人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那么只有一条路是可能的。那就是工作必须更加不连贯；劳动力必须在各种不连续的形式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是工作的不连续性可以转化为新的自由——间歇工作的权利以及过上多元活动生活的权利，其中职业工作和无偿活动相辅相成。

这是法国一家中型土木工程公司（Rabot Dutilleul）提出的建议。在 1996 年夏季，他们推出了“五中有一”的制度。该制度允许工作人员每工作五天就可以削减一天的工作时间，每工作五周就可以削减一周的工作时间，每工作五个月就可以削减一个月的工作时间。Rabot Dutilleul 公司的这项政策，即不连续工作权是荷兰和丹麦的社会政策，是社会蓝图。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减少工作任务的形式都可以在荷兰找到，那里的兼职工作者比例为全世界之首（37%）。荷兰主要工会（FNV）发布了一份名为“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的 10 点指南，从每周工作两天、三天或四天到每年工作四个月、六个月或九个月，所有可能的组合和选择应有尽有。

34　工作时间减少了 20%，净工资减少了 16%，这使得生产率得以提高，这一举措让大众集团受益匪浅。除其他外，由于工作时间的重新调整，人们在大约 150 种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即在 150 种不同的方式中选择在一天、一周或一个月中分配工作时间），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

丹麦人在 1993 年提出了一项法律，这让他们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分别采用“四中有一”，“七中有一”（休假年）或“十中有一”的制度，相应增加长期工作人员的人数。这项法律实际上是米歇尔 · 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在其 1982 年出版的书籍《法兰西赌注：新的充分工作制度》（Le Pari français: le nouveau plein emploi）中提出的一个高度灵活的变体。[35] 它允许任何员工休一年的假期，这些假期可以在他 / 她选择的期限内以任何方式支配。在此期间失业人员将取代自愿休假的雇员，后者将获得失业救济金的 70%，如果他们失业了，他们就可以获得失业救济金。这一福利通常达到最终工资的 90%，时间长达五年。

虽然这项权利最初只是单独提出的，但工会设法将其创造性地地利用起来，即减少整个公司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并增加长期工作岗位的数量。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公共交通工作者决定通过组织这样一种方式来增加 10%的人员配置，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总是在休假。奥胡斯（Aarhus）垃圾收集商组织起来，将其劳动力增加 25%。他们把每辆垃圾车上的车队增加到名义上的四位，但每名员工只能在四周内工作三周。这导致员工收入减少 9%，工作时间减少 25%。

这些不同的规划表明，工作不连续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就业的不安全感。事实上，工作越不连续，就业安全性就越高，因为不连续工作最终仅仅是减少每月，每年或多年工作时间，但工作可以为更多人所分享。人们每五年，七年或十年享有休假年的权利、每年或每几年培训的权利、父母双方可以分享一年的育儿假的权利（按照他们的意愿分配，并在孩子出生后三年内分配）（瑞典方案）、有权请假照顾患病儿童或亲属、休假参加一般公用事业活动的权利，目前这种权利还只存在于萌芽状态（例如工会官员和代表）——所有这些导致职业活动日益缺乏连续性，

35　参见 Michel Albert, *Le Pari francais, Le Seuil*, Paris, 1982。

并最终产生与分享工作一样的效果。同样的任务或功能是由几个人共同分享的，他们相互协作，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拥有其他的兴趣和活动。

灵活的员工队伍并不绝对意味着就业不安全，并且使用临时工和合同工，这些工人在订单多时被雇佣，订单少时被解雇。在丹麦的制度中，灵活性意味着增加或减少工作的不连续性；这可能意味着增加或减少可以同时休假的人的比例，同时维持他们的地位和工作安全。

因此，可以重新考虑不连续工作，重新考虑工作时间和人员配置的灵活性，不是将其作为不安全的来源，而是把它视为安全的来源，以及作为“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权利的一种形式。这可以降低就业在每个人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并让那些想要工作的人有机会让自己的工作更具多样性，换公司，继续前进，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活动。应该从被动地忍受不连续就业的所有形式，被动地接受工作时间和人员水平的灵活性，转向主动地选择和自我管理不连续性和灵活性。

丹麦的制度目前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大范围的尝试。它不是通过补贴就业来降低工资成本，而是补贴非工作活动并增强工人的权力——就对他们的协作模式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方面而言。这个制度的原则包含了另类社会和经济的萌芽：

1. 它承认工作权和不工作权同等重要，并且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没有后者，前者不可能存在。虽然它不鼓励工作的意识形态，但是提倡分享工作这种观念。

2. 它承认每个人都有不连续工作的权利，同时也承认持续收入的权利。后者不是失业救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其法律定义所规定的）失业人员没有被动地受制于工作缺失，而是主动选择中断了他 / 她选择的工作，而且有法律条款来鼓励这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与特定的政治抉择即社会

的新蓝图相一致，因此在政治上是合法的。支付给“自愿失业者”的津贴是其正常工资的 63%（不是最低工资的 63%），将半职人员的收入提高到全职工资的 81.5%，而四分之一职业工人的收入提高到全职工作的 72.25%。实际上，津贴是有保障的社会收入。

3. 无论是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可以灵活应用这种制度。在小型工艺品公司或个体经营者（工作周通常超过 48 小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一般会采取工作分享或几个手工艺人之间组成合作社的形式，集中工作和订单。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工作的不连续不再是不安全的同义词。工作的非连续性越强，就越容易确保就业的安全性。劳动力也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周期。相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越少，当工作在所有人中分配时，就必然会变得越不连续。

但是，这里我们也遭遇了丹麦体制的局限。它保证在一定条件下，每个人在离职期间都得到社会收入。但是，它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满足赋予工人这种社会收入的条件，除非要让工人有资格休假的就业时间不断减少。随着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减少，远离就业的时间往往会比就业时间长，为了自己而从事的活动往往会比有偿工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社会收入往往会大于工资”。[36]

社会收入在本质上将变得越来越不需要前提条件，并且将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条件的、全民的赠予。

无论如何，“不连续工作的连续收入”模式——其中不连续性可以由集体劳动组织管理——作为“过渡性政策”特别有趣。这是一种演化中的、高度不稳定的政策，预先排除了筹资危机，这种危机会导致重新界定福利

36　它可以用来划分为整个法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目前的工作数量每年将少于 800 小时。

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形式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基本方向的问题。通过它在工人中产生的高度自我组织、协商和团结一致，它为在福利制度陷入危机时将出现的基本冲突奠定了解决的基础。

改变工作

我很清楚，任何说保证有足够社会收入的人都会面对如下反对意见:“这会极大地削弱人们的工作动力，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劳动力短缺。”这个反对意见没有有力的论断可以将其驳倒。唯一恰当的回复是“我们必须注意，让这个问题不要出现。”我们必须注意，人们不需要“激励”（实际上是约束）才去工作。多米尼克 · 梅达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话语”的矛盾。[37] 这种话语将“工作”视为基本的人类需求，视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纽带”，一种美德，自尊自爱及获得他人尊重的主要来源，但只要提及与工作无关的社会权利，那么“削弱工作积极性”的危险就会突显。因此，“工作”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吸引人、令人满意、给人成就感或让人具有归属感，以至于你不需要通过给失业者设定一个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福利水平来给人们提供“激励”。

总之，为了改变社会，我们必须改变“工作”——反之亦然。 应该通过剥离其全部的约束（时间，等级，生产力）——目前这些约束反映了其从属于资本的属性，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目前所认识的“工作”的本质——来改变工作。我们可以通过调和其与日常生活的文化即生活的艺术的关系来改变工作，工作应该既能拓展又能滋养生活的艺术，

37　参见 Dominique Méda, Le Travail. Une valeur en voie de disparition, Aubier, Paris, 1995, pp. 182ff。

而不是与它们相隔绝。[38] 要用童年从事这种活动的方式来改变工作，童年存在着不是将这种活动作为苦修来忍受的可能，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融于生命之流的活动，一条通往感官全面发展的道路，通往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掌控，并且作为与他人确立纽带的途径。通过把知识的获得与能够做事情的自豪感联系起来（这是布隆斯基 Blonski 等人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概念），从童年起就改变它。通过将（自我）教育与群体生态、社会和文化项目相结合，不难想象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工作，学习，实验，交流，艺术实践和个人实现将会共同发展，在这里，人们很自然地在青春期结束时获得基本收入。”[39]

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收入最开始肯定是部分性的，随着青少年在社区活动中——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中——通过承担更加多样、复杂、和高技能的实际任务，学习并发展了多方面能力，他们将获得全部的收入。然后，“工作”可能会自然成为生活的一个维度，同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不考虑“生产力”，尽管它们会通过人们所发展的创造性、想象性和表达性的能力间接促进劳动生产率。

雷诺·佐尔（Rainer Zoll）最近提出了一个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过渡公式。随着青春期的结束，公民可以在志愿性的平民服务机构中各自签署一个灵活时期，从一系列生态、社会或文化性质的活动中做出选择。这项服务——这会让志愿行为获得更大的社会尊重——“的生产力无法在经济方面得到度量”，也“不能被视为以工资提供报酬的劳动力商品”，因此会让志愿者在决定自己的任务和工作时间方面拥有相当

38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那些通常很受欢迎的工作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生产率无法衡量：所有的艺术、教育和护理职业（从猎场看守到心理治疗师）。当它们成为经济合理化、生产力规范的对象时，它们就会被削弱。

39　1976 年，他设想了一种类似的教育体系，并结合了一项类似法国最低工资规定的普遍拨款。参见《一个可能的乌托邦》，《生态学如政治》，布鲁托出版社，伦敦 / 南端出版社，波士顿，1980 年，第 42-50 页，再版（作为“可能的双重社会的乌托邦”），在《告别工人阶级》，布鲁托出版社，伦敦，1982 年，第 145-52 页。

大的主动性。这将使志愿者有权获得“公民收入”，不仅在服务期间为他们提供“正常的生活水平”，而且得到报酬的时间是实际服务时间两倍或三倍：“例如，两到三年的服务将使志愿者有权享受四到五年的社会收入，而不必承担任何其他义务。”[40]

佐尔的处方可以视为是丹麦计划的一个变种。就像后者一样，它提出了与一段工作时间相挂钩的有条件的社会收入，并没有声称能够度量相应的工作量。人们可能会设想出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这样的自愿服务期在一个人的工作生涯中重复；其中一些公共服务将以志愿劳动的形式展开；并在基本社会收入中加入奖金以反映志愿者的经验和资格，以及他 / 她参与志愿活动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

改变城市

我们必须认识到，基本社会收入的保障和可支配时间的增加不是减少活动，而是增加活动的一种方式。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无所事事，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大量的个人或集体，私人或公共活动中——不需要盈利能蓬勃发展的活动。从童年开始，每个人都会参与并心仪于团体、团队、研讨会、俱乐部、合作社、协会和网络的普遍扩散，所有这些人都希望加入到活动和项目中。艺术、政治、科学、生态哲学、体育、工艺及相关活动；自给自足、修复和恢复自然和文化遗产、改善环境、节约能源；托儿所、“健康商店”，交换服务、互助性的网络。

40　参见 R. Zoll, ‘Staatsbürgereinkommen für Sozialdienste’, in 0. Negt (ed.), *Diezweite Gesellschaftsreform, Steidl*, Göttingen, 1994, pp. 91-94。

这些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愿且对所有人开放的自我活动，不应被视为仅仅是无关紧要地补充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被看作是让这些活动成为可能的基本收入的强制性抵偿品。因为不需要资本，不需要资本的增殖，同时也不需要用来满足欲望的金钱，这些活动可以利用社会时间与空间——这些时间与空间是通过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中削减工作量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工资工作，并在工资工作的形式之外创造出自由的、社团性的社会纽带；并最终成为主导性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该成为抵抗现有权力的空间，成为实验的空间，成为向我们摇摇欲坠的社会提出实际挑战的空间，成为发展另类社会性并最终发展出另类社会的空间。

城市政策可以对这种多样化的自我活动的产生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活动中，筹划新的社会的计划开始成形，并成为有意识的行动。通过空间和社会时间的组织，通过设施、便利设施和场所的利用，城市政策号召人们开展这些活动，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资源，并确认这些活动是正在涌现的新社会期待所有人都从事的活动。这项政策反让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时兴起或者是为了更好的东西而采取的缓和措施，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共同参与的努力目标，是一个可以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的筹划。

有关时间和城市的政策方面，荷兰和丹麦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想法。为什么 37% 的荷兰人——70% 的女性和 17% 以上的男性——选择兼职工作，尽管他们的工资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按比例减少了？为什么仍有 22% 的全职工作男性想要把工作换成兼职，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挣得更少，而在拥有兼职工作的人中，只有 4% 的人希望工作更长时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用于非工作的时间的使用价值大于做有偿工作（即

多于他们能挣到的额外的收入）所花费时间的价值？

我们可以猜测，城市结构的密度与它有很大关系，城镇布局，建筑，集体设施和公共交通的设计都是为了促进自我活动、互动、创新与合作。赫伯特 ·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喜欢说：“革命之后，我们要拆毁城市，进行重建。”通过改变城镇和城市，我们将为社会变革、人们交往方式以及人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革提供一个杠杆。重建一个适宜居住的生活世界的前提条件是明确规划且多中心的城市和城镇，其中每个区或社区都提供一系列让所有都可以使用的场所，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展开自我活动、自助活动、自主学习、交换服务、交流知识；同时还要有大量的日间托儿所，公园，会场，运动场，体育馆，音乐室，学校，剧院和图书馆等；带有会议场所和人行道的住宅，儿童游乐区，老人或残疾人的餐厅 / 厨房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帕塞内镇（Parthenay）[41] 一直在发展这种模式。哥本哈根和博洛尼亚也有很多尝试[42]。瓜塔里 (Felix Guattari) 写道:

“家庭生活新模式，新的邻居关系、教育、文化、体育、育儿、照顾老人和病人的实践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还有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新的活动方式。唯一缺少的是做出这种改变的愿望和政治决心……

我们是否要等待整体的政治变革，然后再进行这种分子革命，后者有助于改变人们的心态？我们现在进退两难：一方面，社会，政治和经济只有在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才能有所演变，另一方面，除非整个社会发生变化，否则心态不可能真正改变。我们所倡导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将成为解决这

41　法国城镇。——校者注。

42　参见 Michel Hervé, mayor of Parthenay, ‘Citoyenneté active et développement urbain durable. L’expérience de Parthenay’, *Transversales,*41, September–October 1996. 以及 Léon Krier, *Architecture, choix oufatalité,* Norma, Paris, 1996。

一矛盾的一种方法。在创造新的生活空间方面，一些成功的实验将会对激发改变的普遍决心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是要有所构建……为潜在的突变提供一切机会，这会让下一代以不同方式生活、感觉和思考。生产出的新主体性的品质应该成为人类活动的首要目标[43]。”

事实上，心态或者说情感已经发生变化，与之相伴的还有整个价值体系。但是只要这种变化还没有转化为由该变化所塑造的对社会空间的新的组织并让自己表达自己，出现在社会新的行动与生活方式中，那它就只是个体所实现的个人私事。这是一个改变城镇和城市的问题，从而使得“新的主体性”就不仅仅限于“我的头脑”或“我的心灵”的变化——这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话语所否定或压制的变化——如此一来，这种变化可以体现在物质世界中，体现在实践和话语中，并且可以发展出一个动态的机制，该机制可以让其超越最初的意图并将其变成一个共同的筹划，变成“公意”。

地方交易所交易系统（LETS）

作为“新的主体性”的危机措施和来源，地方交易所交易系统（LETS）是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的最好案例之一。它们代表了从当前社会安排的“出走”（exodus），产生了超越国家和金钱权力的新的社会性。LETS 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发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在美国以各种形式发展起来。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它们已经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以新的形式传播开来。在法国被称为地方交流

43　参见 Léon Krier, *Architecture, choix ou fatalité*, Norma, Paris, September-October 1996。

系统（SELs），在德国被称为合作圈子，但是最有活力的扩张是在英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彻斯特 LETS 创始人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的努力 [44]。

对于大批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而言，LETS 或合作圈子（圈子是比“系统”更为恰当的称谓）是对失业所导致的不可能性的一种潜在的激进反应。他们把经济交易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以此来应对这种情况。为了把劳动力卖出去，工人们需要一个“雇主”，能够支付报酬并把（雇佣的）劳动力卖给一个能够支付工资的顾客。但是，为什么劳动总是被一个不履行劳动职责的人“雇佣”呢？ 为什么它总是要通过商品形式——从而通过金钱——进行交换，承认和估值呢？为什么社区成员不能量身打造直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没有任何中介的直接表达的需求和欲望上，从而以没有任何中介的“最理性和最人性化的方式”（马克思）来交换工作？

这个问题和劳工运动和失业一样古老，而工人运动一直试图通过消除中间人来找到解决办法，例如工人和他们的产品之间的中间人，以及这些产品与需要这些产品的人之间的中间人。但是，如果这种消除仅仅意味着恢复到实物支付——回到物物交换，那么它就有许多缺陷。因为物物交换必须“当场”完成，一件东西交换另一件东西。它只允许在两个确定的人之间进行具体的、确定的交换；除非他们彼此很了解，否则不会互相赊账。

地方交易所交易系统或合作圈子通过创造一种工作 - 货币金钱或

44　关于 LETS 的历史，Helen Barnes, Peter North and Perry Walker, ‘LETS on Low Income’, in *New Economics,*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London, 1996, 38 pages；关于 LETS 的哲学，参见 Martine Brissac, ‘Les semences du changement’, in ‘Tout travail, non-travail, histoire de FOUS’, *Le Temps libéré,* Maison Partage, Cépaduès Editions,Toulouse, 1995, pp. 151-160。

时间－货币来消除这些不利之处，从而使得任何服务或产品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像货币一样，虽然它不是货币，也没有货币的职能。这是该方案的革命的一面。

圈子的根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解决方法”（solvent），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他人可能需要的能力，技能或才能。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可以发展这些技能并获得其他技能。正是因为有这种“非物质资本”，他们才能加入“合作圈子”。最开始可以赋予他们信贷，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得到其他人的服务。他们从一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每一小时的工作——或其等价物——代表了一笔债务，需要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通常在三个月到一年之间），用一个小时的工作量支付给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因此，合作圈子是一种相互帮助的网络，其基础是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和罗尔夫·海因策（Rolf Heinze）所精确命名的“系列互惠”[45]。

从一开始，合作圈子就从合作社运动中汲取了成员平等原则、成员工作拥有同等价值和尊严的原则。每工作一小时，就有权获得一个小时的服务或等价物作为回报，而每接受一个小时工作就代表一个小时的债务。“很容易记录每个成员当前余额，（在美国用的是“时间美元”），计时单位通常是小时[46]。

然而，与官方货币不同的是，时间－货币或工作－货币的寿命比较短，可兑换性有限：它只在发行圈内有流通（尽管英国正在讨论几个圈子联网的可能性），根据时间设置，如果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没

45　参见 Claus Offe and Rolf Heinze, *Organisierte Eigenarbeit. Das Modell Kooperationsring,*Campus Verlag, Frankfurt, 1990。

46　参见 Carmen Sirianni, ‘Classless Society’, *Socialist Review,* 59, San Francisco, September–October 1981, especially the se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xchange of labor’。

有“花费”，它们就失去了价值。因此这些货币不能囤积。必须杜绝有人只做工而不求回报，以获得几乎无限的信用的地位，就像银行家或专业贷款机构一样，获得支配的地位。

与十九世纪英国的劳工交换不同——它们以劳动的直接交换为基础，合作圈子不会废除货币，甚至不会废除市场。然而，合作圈子确实废除了货币的权力，即盲目的“市场法则”，并且使市场变得透明。由于其寿命短暂，人们不会一心追求圈子所发行的本地货币。这种货币不会使一些人致富，一些人贫穷，也不能在为了利润而进行的资本主义投资中发挥作用。它不能用于占有共同体的财富。它限制私人财产和每个人的购买力，使他 / 她足够支付“（他 / 她的）家庭之用以及自己的消费所需”（洛克语），而金钱，通过使一些人致富，会让富人占有……比自己真正需要多得多的产品[47]。

地方金钱的短暂“生命”同时鼓励消费和自我克制。它激励所有计划中的成员将自己在工作中获得时间信用尽快投入使用，即要求其他成员为他们提供服务。但同时它也鼓励每个人限制自己对他人的劳动消费，因为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提供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因为它把所有的获取和消费都与工作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地方金钱废除了金钱的拜物教（即如下表象：只要人能做到的，金钱可以做得更好）和商品拜物教，激发人们对现实需求的反思，制止浪费。它的口号可以是“各取所需，各选工作”。

然而，第三个方面解释了政治生态学对合作圈子的兴趣：地方货币鼓励更多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产品和服务。由于它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进行交换，因此可以促进和发展当地的经济，强化人们自给自足的程度和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向和优先事项的影响力。它激励人们优先

47　参见 André Gauron, *Les Remparts de l’argent,* Odile Jacob, Paris, 1991, pp.47ff。

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交换价值。合作圈子的成员越多，技能越多样化，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易用地方货币进行，而这将会取代官方的货币。例如，在埃尔帕索（新墨西哥），你可以用时间美元支付医药费；在伊萨卡（纽约），大多数店主都收“绿色货币”；在某些荷兰城镇，餐馆就像英国的某些银行一样，收地方货币。

瑞典研究人员诺德尔·阿克曼（Nordal Åkerman）是欧洲第一个对合作圈子所具有的生态和社会变革潜力感兴趣的人，他认为这是一种“缩小社会单位规模，并使人们积极参与并掌控发展”的手段。他建议把每个地区的全部人口与合作运动联系起来，制定一份当地生产可能需要的清单——从对水，暖气，食品，运输，基本纺织品，机器和废物处理的需求开始。他还建议起草一份清单，“列出那些有助于使当地社区生活更加积极、让人有成就感和愉悦感的小事情。这可以通过当地的公民投票来完成，在那里，会要求人们选择 20 到 30 个条目，同时可以提议增加 5 到 10 个条目。”[48]

因此，不应将合作圈子视为一种孤立的措施，仅仅适用于失业者和被边缘化人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只会掩盖系统的裂缝，而从一开始，其地方货币就会被看作是“贫民”的钱。此外，相互提供的服务将被视为“掩盖问题点”的噱头，会导致公共服务和福利的私有化。

我们也不能把合作圈子看作是回到村社经济的尝试。事实上，在人人无条件地获得基本收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在宏观社会交换系统中间歇性地“工作”，同时在该系统内获得、维持和发展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在微观社会层面上使用和交易，特别是在当地合作生产供本地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合作圈子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那么可以预见，合作经营者可以合并起来，购买或租用高性能设备或零部件来自行装配设备。同

48　参见 Nordal Åkerman, ‘Can Sweden be Shrunk?’, *Development Dialogue,* 2,1972, pp. 91-92。

样可以预见的是，地方自助活动的生产力以及它们的质量可能与现有的大公司旗鼓相当或更加优越。我们还也可以预见，由于思想和能力的不断交流，沟通合作力度不断加强，本地团队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水平可能会超过产业界的水平。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由伯格曼 (Frithjof Bergmann) 创立的新工作中心的倡议已经提供了实际的证据，我没想到会这么快[49]。合作圈子的可行性及其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当局多给予其创立者在后勤上的支持。英国的一些左派地方当局已经成立了 LETS 发展官员来协助这个过程。这还需要为 LETS 团队提供办公场所，还有车间、生产资料、计算机设备、技术咨询、培训和学习机会等。

计算机化的普及使合作网络的潜力不断得到提升。所有的成员都可以使用计算机让管理变得透明且易于由所有成员监控。所有提供和请求的服务，可用的时间和会员余额都有可能在互联网上永久显示。这样就减少甚至消除了规模经济，在过去大规模商业生产会藉此清除地方生产和家庭内的自给自足。它使自学和自主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并促进了网络之间可能的协调、专业化和交流，例如，可以将所有网络的资源集中起来，获得技术上更加先进的设备，而不是仅仅拥有几百个成员的单一网络。

因此，合作圈子可能逐渐引发对新技术的集体占有，包括克劳斯·海弗纳（Kess Haeffner）所建议的灵活的计算机化制造系统，地方当局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或者其成员可以“组合在一起”，就像非洲或南美的棚户区中拼接计算机和机械设备然后满足当地需要的方式[50]。现在，大品牌的工业生产工具的性能和当地社区用来自产的工具之间已经不再有

49　参见 Erika Martens in *Die Zeit, 7* March 1997, p. 27。

50　参见 Claus Haeffner, *Mensch and Computer* im *Jahr 2000,* Birkhäuser, Zurich, 1988。

任何巨大的差距，在生产这些工具之后，其价格与那些品牌产品相比看起来会非常可笑。在差距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圈子的成员从他们的合作实践中得到的满足是多于这种差异所产生的负面效果的。

奥菲和海因策所命名的“社会－技术专家的专业化”已经抹杀和压制了地方性的技巧，使人们丧失了照顾自己、自我判断和互相帮助和沟通的能力[51]。合作圈子让某些服务可能重新回到邻里关系的领域，至少是一些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所垄断的服务。奥菲和海因策引用了短期残疾家庭护理的例子。但是，地方资金的短期有效性让这些服务——这些都是以几个月甚至几年为周期，需要日复一日可靠地提供的服务，而且对象是那些无法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同等回报的人——超出了合作圈子的范围。例如，母亲的帮忙服务和永久残疾或老年人的家务帮助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有了这样的观念——从“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口号中可见一斑，即以贡献的服务而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制度。合适的退休人员可以承诺给予有需要的人以定期的帮助和照顾，从而建立一个信用余额，当他们自己需要照顾和帮助时，他们可以提取这个余额。或者有照看需要的人的亲属可以把他们为此目的获得的时间信用转给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些需要照看的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再需要要求善意，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其家庭成员随叫随到。

如果这一制度依赖“义务性志愿服务”，并旨在废除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那么它显然没有什么价值或优势。它的目标必须是让人们终其一生都参与社交活动的网络。合作圈子的社会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创造原本不可能产生和交易的“公共用途”。同时也在于揭示了，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其他更具体和更快乐的流通手段，权利来源和会计

51　参见 Offe et Heinze, *Organisierte Eigenarbeit,* p. 75。

单位。同时也在于确立了公平、稳定和持续的互惠关系，为人们提供了远离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港湾。正如杰森（Jessen）所指出的那样，其价值在于所提供和接受的服务是自主的，社会合作与交流关系是非等级性的。这些“维系了个体的批判意识和尊严”，而且与有偿劳动不同，“是自由的，没有异化感的”，因为“交往关系中不存在支配”。所有这些都使个人在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组织和工作性质方面具有了批判性和积极主动的态度[52]。

回归政治

这将我们带回到了主题的核心。在合作圈子和这些圈子可能构建的网络中，我们看到了对工作制度所展开的初步的实际批判。每个圈子都是一个集体，其成员自己掌握并分配工作，同时也掌控知识、技能和技术的专业化、学习和传播。 他们至少有这样做的潜力。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可以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提供新的社会和经济的模式，而在新的社会和经济中，雇佣劳动、金钱的力量和“市场规律”（尽管不是市场本身）的至高无上地位都会被废除。他们可能模糊看到一个从“真实的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与经济，在那样的社会中，如下说法就不再成立：“关键是有工作，工作内容并不重要。”

随着他们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圈子里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是否还会接受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加诸于自我组织和联合性合作之上的约束和限制，即使这种工作组织以“丰田模式”（Toyotiste）的形式出现？他们

52　参见 Ibid., p. 75, pp. 342-344; 及 J. Jessen, *Arbeit nach der Arbeit,* Westdeutscher Verlage, Opladen, 1988, p. 277。

是否还愿意让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服从于资本？他们会不会为了“谋生”继续为异己的目标服务？因为跨国企业去辖域化的决策战略，他们被剥夺了批判性地审查这些决策的权力，甚至是知情权。他们是否仍然允许在没有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经济和技术决策，或者允许国家和 / 或资本行使其决定需求和消费模式的独裁权？由合作的实践——这也是一种实际批判——所强化的“批判意识”会不会溢出合作圈子，侵入公司，行政机关和政治机构呢？生产科学而非仅仅是应用科学的能力，是否会导致对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垄断科学与研究的官员、机构和产业公司的激进挑战——我们已经在由癌症、糖尿病和艾滋病患者以及吸毒者或消费者和生态运动所建立的自助网络中看到了这种挑战？应该指出，这些网络通常也是跨国性的。

我不能在这里推测这种革命可能会如何发展，也不能预见地方性的、微社会层面的合作共同体和它们所处的宏观社会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关联和调和。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我们都不能将它们与它们所共同面对的空间分离开来，这个空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为其提供了依靠自身无法获得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与这个空间——就是向世界敞开的社会本身——的关系问题确实出现了; 在每个地方社区和整个社会之间，以及社区本身与社会本身之间，都需要调解，并且也存在调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和那些调解都是政治性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political），也是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地方社区之间的交往性和共识性的关系而神奇地消失。我们必须承认，村社共同性不能扩展到全球范围，自我管理的合作社也不能。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社会和文明的财富还取决于是否存在较大的地域集体性，足够大的城市，其规模足以容纳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和少数群体的活动，比如大提琴家和埃及古物学者的存在、微型外科医生

和天体物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和柔道教师等的存在。它也取决于大型机构和公共服务的存在，如大学和研究机构，博物馆和造船厂等。所有这些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社会将会产生一个可积累的“经济剩余”，而且会有货币成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存在所有人都知道和接受的规则，因而最后还要有一个法典和制度，一个协调和平衡的机构，简言之，我们所称之为国家的东西[53]。

哈贝马斯说，“系统”不可能完全融入“生活世界”。这意味着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不能完全融入社区之间的交往性和共识性的合作之中。然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和自我组织的社会交流日益具有政治性，这是有其可能的，通过这种政治维度，可以管理地方活动进入更广泛的环境，这样微观社会的总体在与社会总体的协调过程中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成为宏观社会决策的参与者，这样后者在压力下会与微观社会活动联系起来。雷纳 · 兰德（Rainer Land）一直在不断尝试的正是在这种反馈循环——这个循环将系统的演变与生活世界的演变联系了起来，彼此相互激励，并且发展了生态重建的政治模型[54]。

这种双向的反馈导致——实际上是强制——微观社会总体把自己的目标作为地方的普遍目标的表达，并把“地方的共同善”视为“普遍共同善”的特殊的地方形式。最后，政治中介总是要促进普遍性、用政治权利来表现需求，同时使每个人的需求与所有人的需求相辅相成——反之亦然，这是从未完成的工作[55]。

后 记

53　参见 Jacques Bidet, *Théorie de la modernité,* PUF, Paris, 1990. pp. 295-305。

54　参见 R. Land, ‘Okosteuer oder Okokapital’, *Andere Zeiten,* 4, Berlin, 1994。

55　参见 *Der Spiegel,* 13, Hamburg, 1995。

为了使必要的“工作”数量急剧减少，我们每个人所提供的工作时数减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在法国人们需要二十五年的时间才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自从阿德雷特（Adret）集体为某些蓝领和白领工人发声——他们选择了多元活动，自我活动，缩短工作时间，并体验到了解放感——二十年过去了[56]。自从米歇尔·罗兰特（Michel Rolant）提出“每人的工作越少，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工作，同时可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的口号，二十多年过去了。自从 IG Metall 自动化部门负责人弗里德里希（G ü nther Friedrich）证明，投资已不会再创造就业岗位，而且实际上还会消除就业机会——除非工作时间不断地减少，而且认为我们应该从工会主义的实践、目标和内容开始，重新审视、思考、定义一切，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二十五年来，西方社会一直逆行着走向未来，既不能按照过去的准则重复自己，也不能利用因节省的工作时间而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由福特主义所塑造的社会已经分崩离析，还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形式得以确立。社会已经分崩离析，并且为非－社会所取代，在这种非－社会中，一个微小的统治阶层抓住了几乎所有可用的额外财富，而政治意义和政治筹划的缺乏导致所有社会关系的解体，导致了仇恨一切的心态，包括仇恨生命和自我。

我试图解放欲望或释放想象的方式是否是正确，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所拟定的政策是否会被采纳。对于那些将这些政策视为“乌托邦”（Utopie）然而加以拒绝的人，我只能说这是乌托邦的功能，这里的乌托邦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或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意义，它们让我们可以与现有事态保持距离，从而可以根据我们的能力或责任来判断我们的当下行为。另一方面，我知道我们还没有

56　参见 Adret, *Travailler deux h’eures par jour,* Paris, Le Seuil, 1977。

二十年的时间来弥补过去的失误。事实上，我们周围正在确立的是一个名词词源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叠加在一个废弃世界的废墟之上的真实的非现实，在我们周围编织了一个衍生性、所谓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地点、深度和阻力都没有意义；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是无处不在——因此不在任何地方；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地方都是可以与其他地方互换的“任何地方”； 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不管这地方是什么，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乌托邦：一个非物质化的，去中心的世界，与身体的节奏和感官的需要相疏离，这些感官需求通过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劳动来建构一个反对和反抗这些感官的现实，并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

万物的数字化并不是简单地废除工作（在制作 poiesis 的意义上）以及手和身体的智能。它废除了感性的世界，使感官能力变得多余，否定了它们判断真假好坏的能力。它使感官不再具有可信度，知觉失去确定性，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它们。越来越有效的人工辅助正在取代感官；技术植入物正在入侵和殖民身体本身，并监控身体。电子刺激已经替代了有形世界的刺激。这种刺激为身体提供了比身体感知更加强烈的感受，后者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并且会在便在幻觉模式中过度补偿感性现实的缺失。

生物的敏感性已经被机器人的自我编程的精神错乱所覆盖，让身体的自然形态成为过时的东西，因为这种形态会阻碍人们感受到“宇宙感觉”（cosmic sensations）。通过让手工的智能和感官的工作成为多余，技术科学废除并剥夺了古斯特 · 安德尔斯（G ü nther Anders）所称之为的“人类的人性”[57]。保罗 · 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在这里，我只做简单概述[58]。

技术与生物之间，机器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我们看到感官

57　参见 C. H. Beck,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2 vols, Munich, 1980。

58　参见 Paul Virilio, *The Art of the Moto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5. 尤其是 *From Overman to Overexcited Man* 章节。

享乐已经为控制论技术所垄断；使用能够自我修复和自我繁殖的分子微型机器和蛋白质引擎，通过改造有机结构来重新塑造身体，能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无限量的食物或无穷无尽的住房，并在动脉中移动来修复细胞[59]。我们会有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为千上万的的人提供住处，住在气泡中，就像遥远行星的开拓者一样，永远都不再踏上土地：“技术科学的发展趋势成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自主运动”，带来的结果是自身世界和自己身体的消失。“就好像物质和非物质商品的积累变成了控制和调节消费和生产主体的巨大机器。外在的（和不正当的）影响最终使那些生产这些商品的人首先被外化[60]。”

在这些条件下，“夺回技术科学”是什么意思？谁可以夺回来？什么样的主体可以把握它？当技术科学不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并且取代人类实践，将男人和女人变成“他们的产品的产品”（当马克思提出这个说法，不可能想象到当下的这种境况）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根本冲突中的核心问题。

通过从发明者那里获得自主权，这种产品即技术科学成为生产、思想和发展的准主体。它不仅获得了生产产品、商品或服务的能力，不仅获得了生产消费者的能力，而且还获得了生产自己的生产者的能力，从而一方面消除技术与生命之间的边界，消除机器思维与机器语言之间的边界，另一方面，消灭所谓的生命体真正的语言。“技术迷”（technosophia）就是这样说的，对这种哲学来说，“生命就是技术”，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主体就是技术，而生物工程和心理工程将开创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的超人类、超人主体的统治，这种主体通过掌握人类的身体和灵魂，重新思考，

59　参见 *Time Magazine,* 2 December 1996. 微电子工艺学家 Eric Drexler 预测这些技术或将在 2010 年变成现实。

60　参见 Jean-Marie Vincent, ‘De la gauche domestiquée a la gauche critique’, *La Revue de Mauss,* 13, p. 43。

重新设计和重新塑造了他们[61]。

技术迷和机器人狂热认为他们可以进入一个摆脱了人类弱点和有限性的超人的宇宙力量，但其实更加准确的解释是，这是资本的全面胜利，资本变成非物质的，成功地剥夺了人类和他们的世界，从而最终完全掌控他们的生活。正如技术与生命的界限正在消失，人类与资本的界限也是如此。马克思的论断，“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全面发展是固定资本的生产，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这种观点被衍生为绝对的生产主义，这种生产主义认为“人本身”不再是生产力，不再把“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是作为增加其生产能力的一种手段。在追求废除劳动的过程中，资本正在追求废除“人本身”，将其吸纳或吸收进自身之中，以使其成为自己的主体。那些记得弗朗索瓦·乔治（Francois George）——以丹尼尔·韦尔斯（Daniel Verr è s）笔名写作，并且证明资本在本体的意义上是作为自因（ens causa sui），或者换句话说，是作为上帝而运行的——的人将认识到这种解释有哲学和直觉上的证据[62]。

这清楚地表明了冲突的场所以及冲突中的根本问题：断层线贯穿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人们的自主权、生命权以及生产自我的能力都成为问题。问题就存在于他们如下权利受到威胁的地方：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权利，抵制一切试图剥夺他们的意义、身体和共同文化的人和行为的权利，抵制剥夺一个可以让他们感觉“在家”的地方，抵制剥夺可以让他们共同行动和思考，想象力和行动能够蓬勃发展的地方的权利。

61　参见 M. Hardt and A. Negri, *The Labor of Dionys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 London, 1994, p. 14。

62　参见 Daniel Verrès, *Le Discours du capital,* L’Herne, Paris, 1971。

工作之后[1]

詹姆斯·利文斯顿 *

董牧孜 译　王行坤 校**

一

我在本书开篇提到，劳动力市场与其他所有市场一同崩溃了。我的意思是说，劳动力市场不再像我们所期待和所需要的那样来运作，它不再以我们能够理解和证明的方式去分配工作机会和收入，除非我们恰好是银行家或者诈骗犯——近来，职业形象变得难以辨识了。

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令这种崩溃的发生看似突然，但就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而言，崩溃早已在 1950 年代缓慢上演。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希瑟·罗斯（Heather Ross）和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所预测的那样，也正如尼克松家庭援助计划的赞助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迪克·尼切（Dick Cheney）所理解的那样。

假如我对这场崩溃的理解无误——当然我是对的，如今已是证据确凿，难以辩驳——我们所面对的危机远不只是经济危机。因为那时生产力已不再是衡量人类（或男人，或者说任何什么人）的尺度了。因为那时我们的问题将不在于是否要、而在于应如何成为我们兄弟的看守者

*　詹姆斯·利文斯顿，罗格斯大学新布伦瑞克分校的历史学教授。

**　董牧孜，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哲学硕士，曾任香港 01 哲学频道记者，现任《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本文选自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的著作《不再工作：为什么充分就业是个坏主意？》（*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的第四章《工作之后》（After Work），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出版。——译者注。

（my brother’s keeper）[2]。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彼此相爱？我们是否能抛弃生产力原则，采用需求准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而实现彼此相爱？

弗洛伊德认为爱与工作是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这种观点正确，那么面对社会必要劳动的消退及其现今的真实消亡，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这样说吧：当我们没有可供谋生的工作时，我们还能做到爱人如己吗？

问题来了。我们应如何为以下这些人提供收入呢：（1）工作认真，但劳动投入所创造的市场价值微乎其微，这些人包括 [a] 快餐店工人、记者、学者、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以及 [b] 因种族、性别等因素，其劳动时间历来没有得到相应报酬的人。（2）那些因为无法工作而不去工作的人，例如老人；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老年人所占的人口比重都在不断增加。（3）不工作的人——他们无法创造劳动力市场所认可的价值，或许他们有更棒的事情要做？

如此想来，劳动力市场的崩溃就不仅仅是经济危机，也是一个道德契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自身与工作的关系，重新思考我们能够爱什么人、什么物。但就目前而言，我将这个契机理解为另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还是成功？

二

称之为失败吧。《纽约时报》的爱德华多 · 波特（Eduardo Porter）并不完全是一位激进的经济学家，但他在 2015 年 4 月 21 日的专栏文章中承认了这种失败，同时提出了公司的道德问题。他质疑——麦当劳员工每小时收入只有 8.00 美元，而公司高管们却能“挣”到他们的三百倍，这

2　此一说法出自《圣经创世纪》第四章第 8-10 节，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耶和华来询问该隐其兄弟的下落，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后以“我们兄弟的看守者”来形容守护者或保护人。——译者注。

样公平吗?

就业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关键的机构，是向人民分配国家财富的主要工具——然而在当今，就业市场的正常运作出了问题。在此要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就业市场无法使勤奋工作的人摆脱贫困，也无法更广泛地推进繁荣，那它还能做什么呢？公共援助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3]

简言之，是。就业市场既无法为绝大多数需要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工作，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收入。然而，市场上可购买的商品却仍在过度增长。因此，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么我们要发展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比如“公共援助”、“津贴”（entitlements），随你怎么定义——只要能允许家庭和个人维持生计，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商品；要么，我们就眼睁睁看着美国社会变成一个丑陋的寡头集团吧，这个国家将陷入1876年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预言的“穷人与富人的混战”（“rich and poor man fray”）。

要么我们让收入与工作相分离，否则我们就等于是在自杀——在比喻和字面意义上都是如此。要么保障每个人都有收入（不论他们的生产力如何），否则就等于宣布我们自己是死脑筋。

但我们是如何陷入道德破产的境地呢？——除非你打两份工或着在华尔街上班，否则你连活下去的权利都买不起——你要么领救济金度日，要么死了也无人问津。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跟我一起改变立场，不再将劳动力市场的崩溃称为失败，而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功。

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是创造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换言之，它发明了工人阶级，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阶级，他们没有使用公地的权利，无法享有公民的权利。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这些男人和女人所拥

3　Eduardo Porter, “Big Mac Test Shows Job Market Is Not Working to Distribute Wealth,”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15.

有的只是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们通过工作创造价值的能力。这就他们所能出售的一切，他们充分利用了所有的一切：他们改变了世界。

在十六世纪末期至十八世纪末期的英格兰，工人阶级这一新阶级的确立至少耗费了两百年。18 世纪 40 年代到 19 世纪 70 年代之间，同样的社会过程在北美再次加速上演。卡尔 · 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意味着农民们被剥夺了使用公地的权利，他们从一向可以使用的土地中被驱逐出来——在从前，没有谁能拥有土地，没有人会用栅栏隔开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地中捕猎或觅食——而如今，任何自然物品——尤其是土地和劳动力，都换算成了具有市场价格的可替代商品。（在北美洲，这种剥夺和驱逐是以 “印第安人迁移”之名而展开的——消灭原住民，或者将他们隔绝在“保留地”中。）

这里的关键词是公地（the commons）。合法拥有土地，主张和执行个人财产权——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圈地”。直到十六世纪，圈地仍然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假如无法使用公地就会难以谋生——除非你去偷窃，要么就开始做一份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工作：成为一名雇佣劳动者。

如此想来，当“商品形式”（马克思喜欢这么称呼）完全达致普遍化时，资本主义就到来了，此时就连人性本质、乃至工作本身都可以被出售——看看你所享有的食物、衣服和房子的价格，这些就能衡量你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你作为工人的价值就等于你所投入的成本——食物、衣服和住房等供你活下去的事物。虽然马克思本人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抨击者，但他总是强调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之中包含了一种“历史和道德因素”，这种因素超越了市场冰冷的统一校准。

因此，马克思拒绝“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的概念，这种概念预测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与人口的增长具有一致性——更多的供给 + 更少的需求 = 更低的价格——工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极低的生活水平，也就

是如今我们所说的贫困。马克思认为许多对抗力量都站在了这种市场供需法则的反面，比如说工会、社会运动以及有关人类尊严的常识。

此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同意大卫 · 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引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定然会取代技术工人，但总体上工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因为必须有人制造机器。

尽管如此，马克思所完善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工资率是劳动力市场成本的数学函数，或多或少也受到“历史和道德因素”的微弱影响。在阐述他所谓的资本积累规律时，马克思预测劳动者将逐渐脱离商品生产的过程，直至劳动时间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机器将能够自行建造。至少就此看来，他预言成真了。

三

但假如马克思既错又对了呢？某种意义上他错了，工资铁律似乎仍在起作用——毕竟只要看看多少有工作的人仍然在领取食品券就知道了；但某种意义上他又对了，就在劳动时间变得毫无价值的时刻，就在如今，决定工资的“历史和道德因素”似乎正卷土重来？重申这种道德冲动，反对市场将生产要素与人类等同起来，那个“争取 15 美元最低工资”的社会运动不正是这样呼吁的吗？

这种呼吁听起来仅仅是种修辞，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地步，我在别的文章中称之为“原始去积累”（primitive disaccumulation），杰里米 · 里夫金（Jeremy Rifkin）则谓之“零边际成本社会”（zero-marginal cost society）。他和我描述的

东西近乎一致，但我们的词汇说明了不同的过去，也决定着不同的未来。[4]

我所谓的“原始去积累”指的是，商品形式所调节的社会必要交易的比例下降了，这与马克思所谓的原始积累正好相反，后工业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信息——正迅速变得近乎免费。想想由于那些已上传的文件共享软件而无需再花钱购买的情形，比如以前的 Napster，今天的 BitTorrent，谁知道明天又会出现什么新东西呢？我的学生在俄罗斯网站下载仍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其中就包括我的书。

在今天，你几乎可以免费下载任何东西，新的公地入侵了每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音乐和报纸，电影也不例外。甚至高等教育很快也将免费，债务人所设监狱的最后一块堡垒也将被攻破，而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将恢复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并向州立大学提供资助，而是因为 MOOC（译者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即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和 YouTube 让每个人都能在网上接触到我们星球上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们——从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里夫金和我都同意，鉴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和分配都不再经由金钱中介，市场登记交易量将会减少——这必定导致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方面的评估开始显得悲观。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泰勒·考恩（Tyler Cowen）等资深经济学家据此预测，我们将迎来创新的衰落与增长的终结。毕竟，商务部门无法衡量那些不入账的交易。然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情况就是如此——它无法通过旧的量化标准来衡量，尽管毫无疑问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比我们所需求和欲望的更多。

信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一般而言包括记者、教育工作者、音乐家、电影制作人和极客——他们的工作时间不会比以前更少。事实上，我们都

4　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在更努力地工作，而且我们实际的生产力比从前更高。我们获得了比以前更丰富的信息、音乐、电影和图像，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但是，我们并不期待得到报酬。

我们知道，若是按照劳动力市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谓毫无价值，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这样做了。

“谋生”这件事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变得不可能了？你可别说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健全的、有工会的制造业工作（商品生产）都外包到国外了。这不是答案。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后工业社会中，几乎所有工作都属于“第三产业”，即致力于分配或维护而不是生产商品，而这一切自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正如彼时的知识分子们所预料的那样。把那些美好的老工作遣返回国内，与想象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并无不同——都是愚蠢之举。

也别提那些进口或输出的“廉价劳动力”——比如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相当泛滥的可怜移民，或是在其他血汗工厂里白忙一场的工人——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你已经接受了我的论点。现在你认同我的论述了吧，劳动力市场的尽善尽美，以及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都令工作变得毫无用处和毫无意义了，它只是让我们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中国的劳动力也会很快发觉，节约劳动的机器是轻便好用的。

四

劳动时间如何变得毫无价值？我的答案衍生自马克思本人所阐发的主题。首先，工人阶级已被消灭了，不仅是以其自身的名义，也不是伴随着“革命”的一声炮响——而是在自动化控制的低语和呢喃之中发生。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市场上没有价值，因此也就无法通过市场而创造出可以购买产品的货币的工作——工人阶级是不可能存在的。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工作但没有收入，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因为这具有

奴隶制的性质；不工作但有收入，无论如何还是没那么更令人反感。

这对工人来说太过分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乐于憎恨的资产阶级也通过其他方式被消灭了。原始积累通过将农民从土地驱赶到城市的方式，在创造了工人阶级，他们在城市将学会根据时钟安排工作——有些在此过程中就死掉了。同样地，原始积累也创造了资本家，这些资产阶级个体雇用劳动力并投资工厂及设备，积攒收益，并宣传他们节制的美德。

三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然后，直到十九世纪末，他们通过宣判自己的社会性死亡而解决了一场根本性的危机。

这场危机包括了工人阶级在镀金时代的胜利。我知道这不是你们会在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但这就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1873 年至 1896 年间，社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增长，但社会收入福利的增长似乎主要（或说仅仅）流向了工人。这不是个秘密。1896 年，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大卫·威尔斯，爱德华·阿特金森，查尔斯·科南特，耶利米·詹克斯）都这么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为此召集了听证会，由罗德岛的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担任主席，以核实并解释这种异常现象。

那时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所见的情形是完全颠倒的——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新镀金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却在不断下降，因此不平等在加剧。十九世纪末期，当生产率停滞不前时，实际工资也在上涨（再说一次，纵使如此经济增长仍是惊人的）。在当时，这一显著成果表现为收入份额从资本向劳工的转移——利润的挤压使资本家变成了公仆，而这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计算及其他手段。让我们算一笔账。从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后期，实际的非农薪资粗略增长了 35%，主要原因是物价下跌；与此同时，生产率仅上涨了约 6%。这与 1975 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

资本家要做些什么呢？贿赂参议员，租用信托，雇用私人军队，借助

体育和文化事业——你懂的，参与体育相关的一切，在你的空闲时间建造博物馆。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资本家几乎尝试了能做的一切：游泳池、信托、私人侦探、闭厂停工、武装暴力、荒野度假村，以及用巨大的仓库存放从巴黎、罗马、佛罗伦萨、马德里或伦敦购买的视觉艺术品……最终起作用的是公司，一个解决社会经济危机的官僚主义方案。通过这种坚不可摧的法律手段，资本最终令劳动力屈服了，这不是形式上的控制，而是真正的屈服，生产率由此激增，以至于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在生产投入方面没有任何重大增长（不论劳动还是资本都是如此）的情况下，商品的产出反而增加了。

注意：公司通过将社会必要劳动——科学的管理者称之为“人为因素”——缩减为零而取得成功。或者说接近于零。1919 年至 1929 年，汽车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400%；然而这十年来，制造业的净失业人数达却到了 200 万。

但公司建基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之上。资本家这样做实际上是宣判了自身的社会性死亡，他们将有关公司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决定权转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而这些人并非公司资产的所有者——正如资本家的贵族前辈们在遭遇晚期封建主义的社会危机时，将土地出租给平民（农民）那样，这也就相当于宣判了自身走向缓慢的社会性死亡。

这些受薪经理人以资本主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自己并不是资本家。他们是工作人员、仆人、侍臣，他们会照办那位看不见的主人的所有命令，因为除了更大更多的奖金之外，他们没有自己定立的目标。

考虑一下，并尽情咀嚼这个神奇的事实吧。

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近在眼前了。那些能够从我们今天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中受益的人们，如今已经少得微不足道了，这些待遇优渥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1%。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这一点他们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如今他们的侍臣和雇员正寻求一切可能的立法手段，

以保护他们的特权——从选民身份立法，到贸易协定快速通道的立法。

换言之，资本家——更宽泛而言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作用是重组和强制社会劳动，是为了强迫劳动者相比于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等早期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之下，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原始积累、圈地和工业化的屠宰凳就是这种强制性的明证。

不过迄今为止，这种强制性根本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的“义肢”成倍增加了——那些机器可以自我复制，这使得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实。

这种视野的可能性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那时资本价值（过去的劳动时间凝结在工厂和设备等物质形式之中）伴随劳动价值而下降，那时节约资本的创新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没有储蓄和净投资的经济增长。在 1920 年之后的二十年里，资本存量的净增值为零。然而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增长仍然引人注目，至少在 1933 年至 1937 年之间是这样，这期间的增长甚至更为惊人（你理解得没错，罗斯福新政的确有效）。这可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生产力、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实质性增长。

在那一刻，利润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资本家也是如此。

因为如果利润的历史作用是强迫社会劳动，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转化为决定未来的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建造基础设施等），那么 1920 年之后利润的这一功能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节约资本的创新让企业可以通过折旧资金而非利润来筹措资金，以提高生产率和产出：仅仅依靠置换和维护现有的资本存量，而无需透过净增量来拉动经济增长。

在那个时候，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作用就是搞市场投机，以吸收节约资本的创新（那个时代的股票市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毫无意义的利润。他们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这些人可以被真

实地描绘出来，尤其是在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等人的作品中，他们表现为一种失去活力的、堕落的贵族——也就是多余的人。

五

如果没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如果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已经消散，或是腐朽到了我们无法辨识的程度，那么资本主义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强制工作的状况，这是因资本主义崛起而被强化的社会和心理范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工作？好吧，这当然是为了买得起活下去的权利——赚足够的钱维持生计，此外还要养家、买房、买枪、买汽车或摩托车，以挣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获取一定的选择，并且向其他人展示你能够做到这些。资本主义在过去的繁荣时期里所依赖的生产力原则仍在发挥重要影响。每个人会生产出实际价值和耐用品，他们会根据劳动时间而得到相应报酬；付出就会有回报，有所得就要有所支出。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是一位非常天真的哈佛经济学家，他曾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人提供建议，并在一篇名为《捍卫百分之一》的文章中准确地表达了上述原则——谁会编造这种东西？他的观点最近出现在同行评议期刊《经济学动态》之中：“根据这种观点[他的观点]，人们应该得到与其贡献相一致的报酬。”[5]

好吧，好吧。但华尔街的流氓们做出了什么贡献吗？既然我提到这一点，就要问问他们究竟贡献了什么？另外，他们的薪酬如何与他们的贡献一致？他们不就是给我们带来 2008 年金融灾难的人吗？数万亿的家庭储蓄在这

5　N. Gregory Mankiw,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3, Summer 2013: 21–34.

一过程中被摧毁了。我们应该嘉奖他们的愚蠢吗?

一个基本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工作？我在对话和正式访谈中向近两百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几乎是一致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受访者并不都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尽管如此，有这种信仰的每个人都强烈地声称他们的生存离不开有意义的工作。

我采访了调酒师，看门人，女服务员，护士，快餐店员工，程序员，工程师，演员，律师，医生，殡葬师——是的，不止一个——编辑，秘书，体力劳动者，出租车司机，音乐家，运动员，门卫，教师，销售员，砌砖工，经理人，货币分析师，股票交易员，牙医，保健员，木匠，水管工，承包商，俱乐部老板，门房，邮递员和妓女。（这份名单不完整。）

他们一致的答案是什么？工作是活着的理由，通常被解释为起床的动力以及在清醒时做正确事情。他们想做点事情，去一些地方——不止如此，实际上更是要寻找一个情感上的目的地，这个地方可以帮助他们将自己未成形的、难以说清的欲望转化为一套连贯、常规且可辨识的意义，而这能够给他们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带来持久的框架和意义。人为什么要工作？答案从来不是“就是为了钱”，即便殡葬师和妓女给我的答案也不是这个。

工作似乎总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市场社会中它的确必须如此，但是这些目的不外乎是逃避原来的生活，或者说投入到不同生活之中。人们的调控性欲望是成为其他人，去发现一种未来——那种未来不会被其社会出身所决定，也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的决定而陷于停滞。

也因此，法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洛顿（Frédéric Lordon）——他是《甘愿做资本的奴隶：斯宾诺莎和马克思论欲望》（Willing Slaves of Capital: Spinoza and Marx on Desire，2014）一书的作者——的论断听起来简直荒谬，他宣称：“在维持就业依赖关系的所有因素之中，市场异化无疑是最强大的……如果斯宾诺莎主义的论

述——‘他们很难想象任何一种不是因为金钱而产生的快乐’——要成为显而易见的道理，那必须要达到大众消费的阶段。”[6]

当然，“他们”可以想象别样的快乐。不，我们工作，我们参与社会劳动，都是为着同样的原因：我们努力做到爱人如己——我们认为这么做意义重大。可是就在这个历史情势，爱的劳动最终成为了唯一剩下的工作。

听听科尼尔斯先生是怎么说的吧。这位先生是纽约圣·奥尔本斯的罗伊·L·吉尔摩殡仪馆（在皇后区算是郊区的地方）的一名殡葬师。我问他怎么受得了每天处理尸体，他这么说：

我所做的事情很重要。我想让亲人们记得那个人的生命，记得她活着时的容貌。我不想让他们盯着尸体想:“作为一个死人，她看起来不错。”我希望他们看着她，就好像她会醒过来那样，而不是永远地离开。我第一次尝试时做殡仪师时就学到了这一点。那时候吉尔摩先生让我放松。死者是一个小女孩，一个漂亮的孩子，她被一辆汽车碾压而过。我该怎么办呢？我给那女孩穿紫色衣服，因为她妈妈说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每个人见到女孩时都说:“噢，我的上帝，这是她！”我能让人们重新活过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不是在谈论死去的人。

或者听听埃尔的故事。埃尔是“最后的鼓手”的精神领袖，这支三人乐队在曼哈顿西区125街和59街之间的A列火车长廊上自立门户。“没错”，他说，“在火车上肯定行得通，我们希望能赚点钱，但你知道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这就是音乐，音乐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一听到新的节奏，就必须要演奏它；或者我们参加了派对，我们知道鼓声会在某一时刻出现，每个人都等待着它的发生。你们是怎么说来着，对，这是一种‘召唤’。”

6　Freédeéric Lordon, *Willing Slaves of Capital: Spinoza and Marx on Desire* . London: Verso, 2014: 28–29.

或者莎莉，她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现在为联合国工作。她的收入比殡葬师科尼尔斯先生和鼓手埃尔要高得多，但她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工作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不工作，会发生什么呢？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喜欢将我所做的看成是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一个……什么……一个目的。你必须要有个目标，有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否则你根本没法起床。接下来呢？”

或者妓女沙琳，她在第 125 街和列克星敦一侧、第 124 街和第三大道另一边的街区徘徊：“我不是因为喜欢才干这行；我有一个女儿在读书。但你瞧瞧，我宁愿舔你的鸡巴，也不愿意在苹果蜂餐厅伺候你，为了拿到点狗屁工资而对你客客气气。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或者以法莲，一名窗户安装工人，他以前是个运动员，曾被芝加哥小熊队选中的投手，但从未进入过职棒大联盟：“我告诉我女儿，你要做你爱做的事情；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会觉得钱并不重要。我以前当过球员，现在做玻璃安装工。我对此并不骄傲。但我感到了活力。”

或者超级梅尔，他负责我们街区的六座建筑物，其中一座是隔壁的过渡教习所，里面的白痴和谋杀犯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他是一个永远在工作的人：“我很幸运，因为我再也不用搭乘破烂不堪的地铁去布朗克斯区了。”——他曾经是大都会运输署（MTA）的机械师。“我每天早上走出门就到了工作的地方，就在我自己的街区里开始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有事情要做，整日忙碌，这是一件好事。你知道我要在这个门廊上呆到 8 点钟，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得确保这些人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但你为什么工作呢？我问他，也问其他每个人。“妈的，我得付房租”，他说。“你知道吧，我有一些事情要做，有事情要搞定。这种感觉很好，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我就做不成，你们看不到也

无所谓——拜托，我的大部分工作在你们早上起床之前就做完了——重要的是我他妈的做了。对我来说……我的意思是……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或者特里，他曾经是个记者，就职于《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他曾经在这些地方做过记者、经理和编辑，直到 2013 年被裁员（就在他自己为数字化裁员干了点小活儿之后）。“工作不是一件小事”，他说：“对我写作班上的快餐店员工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免费教授写作课程］。”在你看来像是苦差事，但他们却不这么觉得。或者对那些无证的非法保姆而言也是这样——她们喜爱自己所照看的孩子，但仍然想要脱离那个家庭对他们本质上的奴役。

“我也不这么觉得”，他继续说，“我之所以成为记者，是因为不想当呆伯特（Dilbert）[7]，因为我觉得可以通过写作和报道为社会正义的事业服务。”

我问他是否认为新闻业已经终结了，因为如今信息是免费的。

“不”，他强调说：“有些信息独一无二，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但这种价值是对谁而言呢？我问道。你教那些快餐店工人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没有人会因此而给你报酬。如果我们的劳动时间变得毫无价值——按照我们时代的说法，它就是不能被“货币化”——那我们要如何解释或证明为谋生而工作这件事呢？

六

汉娜·罗辛（Hanna Rosin）最近预测，“男人的终结”将成为经济大衰

7　呆伯特（Dilbert）是美国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自 1989 年起出版的漫画和书籍系列。作者本人在企业中层管理工作多年，他以自身办公室经验和读者来信为基础创作讽刺职场现实的故事，打动了很多在大公司上班的读者。—— 译者注。

退的后果之一。当然，这说法夸张了些，但她的论点是有实证基础的，这体现在 2008 年以来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显著下降。当男人因为不工作而变得无用时，会发生什么？女人会因为传统男性工种（你懂的，在工厂和制造业)的消失而接管世界吗？当工作的缺乏使男人变得多余时，世界是否会颠倒过来？

换个方式发问。男人因为输给了机器，从而失去了旧式制造业的工作；由于传统意义上女性的工作（社会工作、医疗保健、教育）成了劳动市场的典范，那么劳动时间的市场价格是否会退回到男女之间一直以来的工资差距所决定的平均值呢？

用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多年前提出的富有开创性的术语来说：为什么“情感劳动”不能得到生活工资呢？或者换种方式：是否可以说，大部分劳动时间正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市场可以记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成本，并相应地弥补其绩效；但市场却无法让我们奖励那些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时间——这种劳动长期以来被描述、排斥并诋毁为“女人的工作”？

简言之，是的。有益社会的劳动一直被低估了，更准确地说，它的市场价格从未与其再生产的价值相称，这里我有意识地使用“再生产”这个词。如果没有新家庭内无偿（女性）家务劳动作为原始积累——烹饪、清洁、育儿——那么雇佣劳动原本是、且仍将是不可能的。劳动市场如同其它所有市场一样，自 17 世纪以来就依靠将环境及其他成本外部化的方式来维持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市场需要监督、法规、管理和遏制，而不是礼敬。

在 19 世纪末期，当家庭向外输出它全部的经济功能时，当家庭让位于工厂、学校、面包店、医院、商场、餐馆等生产消费品的场所时，那些原本属于私人的、家庭的成本（主要是教育）被公共支出承担了，或者说被社会化了。估算家庭内劳动的价值成为可能。

但是这些经济功能依然被劳动市场低估了，因为仍然是女性在生产这些商品（这些是物质或市场意义上的商品，但更宽泛而言是伦理意义上的善 [goods]）。此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本身开始下降，因为投入其中的价值减少了，节约资本的技术降低了生产一切的成本。机械化、自动化和仪器化致力于消除商品生产中的“人的要素”，实际上这奏效了。

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大约在 1919 年到 1929 年间，制造业的净失业人口粗略估计有 200 万，收入影响包括消费支出的相对下降——在缺少净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单一来源。这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经济萧条，我在其他地方解释过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社会经济向量发生了同样的加速，我们都是见证者，其结果就是经济大衰退。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做女性的工作——如果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工作的话。爱的劳动取代并胜过了它的竞争对手。

七

过去的一百年里，人们一再想象着工作终结的奇迹。它几乎总被描述为一种哀悼或警告，就像著名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学作品中所追踪到的那样，人们对现代工业及其随从的现代城市报以田园诗式的挽歌。

例如，1999 年女权主义作家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僵局：遭背叛的美国男人》（Stiffe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Man）。这本书的插图贯穿了 20 世纪 40、50 年代工人、水手和士兵的黑白照片。影像的时间仿佛静止了，或者说，时间应该静止在战后的黄金时代——冷战时期的美国。这本书重述了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推销员之死》之中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一个

多余的工作人——但如今它有了诸多解读。

这就是问题所在。就在米勒创作了这一崭新剧作的时候，多余人的故事已经司空见惯，对于新闻及艺术企业而言可谓是熟悉的妙喻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业的“自动化”、以及此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自动控制”（cybernation）浪潮中，大多数有洞察力的人业已瞥见了工作的终结，甚至是男性的终结。就此而言，法露迪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写作这本书时，所描绘的被裁员的父亲——富有男子气概的养家男人——是一个持续发酵的现象，任何看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或《终结者 2》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

工作的终结将导致人类的终结——事实上，这一类的哀歌或者警告我们已经听了将近一个世纪了。1930 年，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下了《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这篇文章，到如今，我们都很熟悉他的观点——包括罗辛在内的数十位作家最近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论述关于劳动力市场崩溃即将带来的终结。

所有人都纳闷为什么凯恩斯错得这么离谱，竟然预测人们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少的劳动时间，以及更多的快乐。他们都在问：他想啥呢？

但最讽刺之处并不在于凯恩斯预测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关于这一点他是对的，且不论我们在剩余时间里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是在经济大萧条的阵痛中写作的，那时经济需求的野蛮性再度从社会和心理上扼住劳动人民的咽喉。因此凯恩斯有理由担忧，我们对于未来的思考会受到这种野蛮性的控制。他恳求道：“但首要的是，我们不要高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或者为所谓的必要性而牺牲了其它更重要、更具持久意义的东西。”

然而，凯恩斯更根本的忧虑在于，我们将不知道如何处理由劳动及

资本节约型创新所带来的闲暇时间。“因此，人类自出现以来，第一次遭遇了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人们要如何利用他们的自由？当科技和复利将为他们赢得闲暇时间之后，人类要如何消磨这段光阴，并过上明智、惬意且健康的生活？”

凯恩斯知道，离经叛道者、异端和反抗者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人。“那些孜孜不倦、一心一意的图利者也许会把我们所有人一起带入经济富足的跑道。但当社会丰裕实现之后，只有下面这类人才能在丰裕之中获得享受：他们保持生命的活力，陶冶生活的艺术，并将其发扬光大，臻于至善，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

所以，凯恩斯其实要悲观得多，或者说并不像他最近的对话者们所暗示的那么不切实际。“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能够在期待闲暇而丰裕的时代到来时，却不怀有丝毫的忧惧。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着去奋斗，而不是去享受。”

不过，凯恩斯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还是比这一领域内大部分重要的前辈更为乐观，也更有先见之明——比如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你没看错，胡塞尔、海德格尔、伯格森、涂尔干、华尔 [Wahl][8] 和科耶夫都是詹姆斯的忠实读者和狂热者）。1909 年，詹姆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的演讲，他谈到了工作的终结，及其对“男性美德”不容乐观的影响。

詹姆斯提到，从太古时代起，男孩们就学会了如何成为战士或劳工。但如今，不论战争还是工作都无法教导他们习得男性气质了。战争的代价太大了，繁重而必要的工作很快就消失了。现如今已经是女人统治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文员和老师组成的世界，是一个男女同校的、热爱动物的世界，是‘消费者联盟’和‘联合慈善机构’的世界，是一个工

8　应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华尔（Jean Whal）。——校者注。

业主义不受限制和女性主义无所畏惧的世界。”

一种由消费者需求所驱动的、新的“快感经济”，取代了旧式的“痛苦经济”——后者由存款、奋斗和饥饿、以及除了享乐之外的一切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如何恢复那些“男性美德”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全面就业。

就像那些仍将工作奉上神坛的当代左派那样，詹姆斯提出把所有青少年送去工作，以教授他们迄今为止由战争所培育的“军队理想的刚毅和纪律”——他们会被应招入伍，但不是军事征兵，而是加入“一支对抗自然的军队”。在那里，魔鬼会向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们会被送去“煤矿和铁矿、货运列车、12 月的渔船队，去洗碗、洗衣服、清洁玻璃窗，去建造公路和隧道，去铸造厂和锅炉舱。”在那里，他们将学到必要劳动的启示和教训。

八

我之所以说凯恩斯比詹姆斯更乐观，是因为经济学家不像哲学家那样惧怕闲暇时间的增加。在写作“战争的道德等价物”时，詹姆斯真正担忧的问题在于，人们因工作的经济需要而团结在一起的个性一旦暴露于“快乐经济”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如今称之为消费文化）之中，就会退化为懒惰或愚蠢。“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力量抵御‘快乐经济’的崩坏性影响的人来说，向‘快乐经济’过渡可能是致命的”，他写道。“若以从恐惧政权中解放出来的恐惧类比，我们可以将整个局势归结为一句话：如今我们对于自己的恐惧取代了对于敌人的古老的恐惧。”

就此而言，哲学家说对了。我们仍然害怕从几千年来由匮乏所强加的恐惧之中解放出来。我们仍然想要工作。经济学家同意这一点。他满怀希望，但他也相当确定，我们在未来不知如何应对 20 世纪赐予我们的闲暇时间，因为我们在情感上已经饥渴了太久。他很确信，我们不知

道如何享受彼此，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到爱人如己。

那么我们是否会受制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工作强迫”（compulsion to work）呢？我们无法成为我们兄弟的看守者，仅仅是因为不劳而获实在难以忍受吗？即便我们知道为生计而工作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假设我们可以克服这种被称为职业道德的疾病，那又要如何支付必定随之而来的“津贴”（有保障年收入）呢？

最后一个实际问题是最没意思的，因为它是最容易解决的。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只要废除社会保险税的上线，增加企业所得税，如此一来所有财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别再说假如我们向企业征更高的税，他们就会迁往海外——他们已经这么做了，而且自罗纳德 · 里根减税以来，外迁的速度更加快了。还有，也别再说人们的工作动机会因此减弱，这话让你显得活像个傻瓜。当然了，CEO 们想要更高的利润率。大约在 1987 年到 2015 年期间，他们得到了想要的利润，但他们摧毁了世界经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增加他们的工作动力？

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令我们无能为力。为什么不能停止工作？出于同样的原因和在同样的程度上，为什么不能选择去做我们兄弟的看守者呢？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爱和工作是健康人生的基本要素。为什么？因为爱和工作让我们走出自我，带我们进入世界，让我们致力于公共事业。爱和工作是一种升华，它们转移了我们从过往的动物性中所继承的本能驱力——它们让我们超越了本能的纯粹压抑；它们使我们走向成为人的社会劳动。这仅仅是社会劳动。

但工作再也无法为这种社会性目的而服务了。所以，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但我们还没能成功。

九

为什么？

我有两个答案。对于女性而言，加入劳动大军，更广义上讲在家庭之外发现有意义的工作，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正如琳达 · 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等人坚称的那样，社交与智识有着无可争议的关联。现代女性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女性通过工作，作为非家庭身份的承担者进入世界，她们此时是抽象的个体，而不是作为母亲、女儿、姐妹或者妻子。

因此，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工作同时具备个人和政治意义，但对男性而言却并非如此（反正大多数人是这样）。维维安 · 戈尼克（Vivian Gornick）辛酸的回忆录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证据。这些回忆表明，不，它们坚持认为，身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总是要在爱与工作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然而，如果你去读 1720 年至 1890 年的小说，或者看 1930 年至 1990 年的电影，你都会发现爱情就是女人的工作。正如戈尼克所论证地那样，现代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拒绝这个等式。

我们为什么无法从工作这种疾病中康复过来？我的另一个答案是因为受到种族范畴的影响。

此处，被压抑者的回归变得不可避免。研究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人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他们兄弟的看守者，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劳而获是有色人种的特权——转移支付和福利是为了“那些人”；而不是为了节俭、勤奋、守规矩的人——也就是那些荣获中产阶级称号的白人，无论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流露出的志向抱负为标准。

因此，用最近因文化战争而为人熟知的术语来说，性别和种族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我们缺少思考过往工作的能力。但这一思想僵局中也存在阶级因素。这一点在罗伯特（Robert）和爱德华 · 斯基德尔斯基（Edward Skidelsky）引人注目的新作《多少才算足够》（How Much

Is Enough? ）中显得越发清晰。这本书以最严肃且最有趣的方式探讨了1930 年凯恩斯提出的问题。

这对父子作者制定了一项有保障年收入的计划，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但他们也反对懒散——无论看电视还是闲逛。如果我们搞定了工作，他们会希望我们做些重要的事。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该浪费机器改良所赋予的闲暇时间。[9]

对此我要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我们投入工作的时间正变得毫无价值，为什么不干脆把剩下的时间也浪费掉呢？

去他妈的工作，与工作同在的愚蠢也见鬼去吧。不过爱依然存在。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这就我们所面对的一切。

.....

9　Robert Skidelsky and Edward Skidelsky, *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 . New York: Other Press, 2012，中文版翻译为《金钱与好的生活》，阮东，黄延峰译，中信出版社，2016 年。——校者注。

返回目录

意志上的悲观主义，智识上的乐观主义[1]

劳伦斯·格劳斯伯格 *

郝玉满 译　罗小茗 校**

五十年前，我偶然得到了文化研究这份礼物，从此，它便深刻地塑造着我的生命。如加桑·赫治（Ghassan Hage）所言，凡启人智思者，都应被接纳为一种馈赠，我便也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份礼物。不过，这却是一份特别的礼物，因为它需要不断地被重塑，被分享，被更新。今天，我将试着谈谈这份礼物，但愿我说的不是大家闻所未闻之事。

首先，这是一份关于承担与献身的礼物，正如霍尔动人的描述：

> 文化研究是学者们的文化研究，然而，幸运的是，它也是为更多一般人的文化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整个学术生涯都在二者之间尽量求得平衡：一方面，是全心投入的分析与孜孜不倦的论证，是严密的学理与客观的理解，是发现与生产我们前所未知的知识；而另一方面，我又坚信，既没有一位称职的学者，也没有一所试图直面 21 世纪的大学，能够对那些困扰着当代世界的重重问题视而不见。

按他的说法，正是这些问题让世界变得日益冷酷无情。

第二，这是一份指引道路的礼物，常常被概括为葛兰西主义的忠告“智识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但它也帮助人忠

* Lawrence Grossberg，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校区传播与文化研究系的莫里斯•戴维斯杰出教授。
** 郝玉满，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1 2018 年 8 月，国际文化研究学会（ACS）第 12 届双年会在上海大学举行。大会将本届的斯图亚特霍尔奖（Stuart Hall Award）授予劳伦斯·格劳斯伯格教授（Prof. Lawrence Grossberg），本文为他的获奖演讲。——译者注。

于承诺地前行。文化研究总是催促我们，远离“概而言之”的诱惑，去理解世界抽丝拨茧的情境性；它也敦促我们去寻找必然之中的偶然，简单背后的复杂，以谦逊的姿态拒绝决定论的引诱。

最后，这是一份提出问题的礼物，或者说它是一些法门，最终会带着我们发现问题的所在。第一个法门就是文化，它一般被理解为意义、表征和主体化之间的关系图谱。但文化研究则将这个概念推广到日常生活与一般常识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是建构社会总体的各力量彼此斗争的场域，因此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第二个法门是“大众”，它不可仅仅被化约为流行文化，因为这里的“大众”指的是人们日常应对实际生活及想象未来可能的语言、逻辑和“算计模式”，以及这一切赖以发生的社会景观基础。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面对当下的困局，我应如何重新理解与述说文化研究，又应如何践行，去讲述和分享更好的故事。霍尔曾告诫我，悲观的资格是需要努力才能获取的。他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指出我那天然的悲观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我认为，他是要指出有太多学者因为自身对世界现状的悲观态度，而放弃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但我必须承认，当今社会（至少在美国），保守主义、反革命和业已发疯的资本主义（借用歌手马特 · 斯派洛[2]贴切的形容），它们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势力和形态，强有力地决定了当前的局势。这样的局势，自然把人进一步推向悲观。

在这里，我不必赘述为何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对于进步知识分子来说，现在是一段“艰难时世”。不过，细致地描述区分这些“艰难”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不同的脉络，每个问题可溯源之久远与可寻迹之广阔，都不是我们能轻易把握的。就算是当代这种末

2　Mighty Sparrow，或叫 Birdie，为格林纳达（Grenada，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国宝级歌手、吉他手兼创作人，享有“Calypso 音乐世界之王”的美誉。——校者注。

日来临的感受，也绝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目前人类消亡的可能性的确更多重了，不安正从四面八方袭来。

或许这是我个人略带“西方中心”和世代色彩的笼统感想，但我确实感到过去五十年的批判理论，对历史的动向与理想的推进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更糟糕的是，比起我们企图支持的力量，这些批判理论似乎更有效地作用于那些我们反对的力量。

事实上，尽管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正爆炸式地涌现，但悲观主义的情绪已然深入人心。那么，我们要如何重建乐观的心智呢？最近我在阅读汉娜·阿伦特时，这位对极权主义有着深刻见地的理论家的话击中了我：“暴政之下，行动比思考容易得多。”——这正是我现在想说的——我们需要思考，更多更好的思考。我们需要在不放弃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智识上的乐观主义”，并借此“复新”文化研究。

放弃文化研究有很多种方式，它们在当今的政治变动与学院环境之下变得极具诱惑力。当你陷入某种确定论，认为自己已经真理在握，认为正确的政治见解就会带来恰当的观念，而正确的观念就会导向有效的政治时，你放弃了文化研究。当你试图以理论取代立足于艰苦的经验性实践的政治（好像理论本身就是政治）时，你放弃了文化研究。这些理论让人迅速沉迷于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决定论、实在论或思辨的本质主义、抽象的形式主义，以至于分不清它们到底在讲述乌托邦理想还是反乌托邦的噩梦。

如果你以某种政治愿景，代替必要的理论化的工作，放弃对世界的复杂与矛盾更为精准的呈现，你也放弃了文化研究。这种政治愿景可以是激进乌托邦式的，也可以是经济或技术的大变革，好似它们随时候场，一经召唤便能登上历史舞台。或者它表现为一次政

策的改良，我们当然支持改良，不是因为“改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因为它可能改善现状。再小的进步，也是有意义的。然而，问题在于，提出更好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弄清它们为何无法落实。

我们需要的智识上的乐观主义必须来自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好的知识是好的故事与改变的必要条件。这种信念要求我们，即使冒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假设、政治判断均被动摇的风险，也要坚持不懈地运用理论，组装现实。发现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别的世界，如果你愿意的话），还需要我们去理解现实的困境：它的局限在哪里，突破口又在哪里；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冲突矛盾又是什么；它生成后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蕴藏的“可能性的领域”（借用萨特的概念）又有哪些。这种思考是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的智识基础。这意味着我们要经由和借助危机，而非“超越”或在此之外来思考问题。

我明白学院环境的持续变动，使得将文化研究理解为严谨的知识生产和展开公众教育的工作，这样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大学愈加强劲地以“专业”之名将职业生涯个人化，按照量化和通行的标准来规范和评估研究工作，以学科、研究对象与理论范式来强化对“正统”工作的定义。它对外部基金的诉求，更是妨碍了人们对创造性的制度和基础架构的尝试。

我无法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对青年学者来说，只能提醒大家，大学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领域，政治知识分子们为了争取空间开展自己的工作，持续展开斗争。很多我们面临的风险其实早已有之，我们无法保证可以打赢，正如无法保证一定就输。底线在于我们绝不能放弃学院这块阵地，因为学术工作虽然还

有其他的容身之地，但允许我们犯错，也要求我们时常警醒自己可能会犯错的，仅此一处。

限于本人的切身感受，我想要指出，文化研究正在太过轻易地弃守三个阵地，而它们本是文化研究真正能够有所贡献的领域。第一个是关于“后真相时代”或者“另类真相时代”的事实与知识的问题。文化研究有着围绕“知识”“真理”而斗争的漫长历史，而且看起来进步的力量似乎总是站在辩论的反方立场，质疑主流媒体或政治宣传，质疑“科学”的霸权，甚至有时会将矛头指向一个社会得以建构的基础话语。然而今天，进步学者要么回头维护起“科学”与“真理”的无上荣耀，要么把个人经验（通常是被压迫的经验）推举成至高的权威。后者的结果是，将女权主义重要的现实成果“个人即政治”翻转为“政治即个人” 的荒唐主张。

文化研究将真理理解为一种务实的持续思考的斗争，以至于它往往是由在特定脉络中讲述更好故事的可能性来界定的。我在这里使用“务实”这个词是想强调双重的要求，一方面是要与由复杂的矛盾的材料和话语构成的现实做斗争，另一方面则是指我们要策略性地考虑如此“务实”的可能后果。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个议题。老实说，我并没有读过那些科学资料，就算我读了，我也没有能力评估这些资料。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人相不相信科学的问题吗？我想不是。我认为这更像是一个帕斯卡的赌注。17 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帕斯卡认为，既然无法证明或反驳上帝的存在，那么，不如相信他存在。因为如果赌错了，就结果而言并无差别；万一赌对了，则有严肃的后果。同样地，我会说，不如承认气候变化并有所作为。这样的话，即使气候科学错了，我们所付的代价也比它是对的、我们却既不承认也不作为，由此遭受灭顶之灾，来得可以承受。这是一个以将来的后果来衡量我们的信念与抉择的务实的方式。

第二，关于当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现象。两个阵营的

经验、信条、价值观、世界观等，如此截然相反，以致完全不可沟通。双方都乐于将对方描述为怪异的、毫无逻辑的、不可理喻的，等等。这种分裂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最亲密隐私的关系也已卷入其中。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当代政治实体的明证，说明别样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看起来我们就生活在由竞争性的社会现实共存或争斗所致的社会空间之中。但是，这一两级分化的结构与之相反。我们并非单纯地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而是一方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另一方之上，将对方判定为不健全的、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的、愚蠢的、饱受愚弄的、邪恶的（例如种族主义者或法西斯分子），诸如此类。

其结果是，政治通常被残忍的、不顾尊严的与羞辱的言行一笔勾销。举一个小例子：2018 年早些时候，只因一位餐厅工作人员使用了西班牙语，一个纽约的律师便出言攻击，扬言要打电话给移民局举报他是非法移民。显然，这位律师假设“美国人”就该说英语，如果不说或不会说，那肯定就是非法移民。我们当然要谴责这种行为。但多数进步左派的做法是羞辱律师，骂他种族歧视甚至没教养。文化研究应当质疑羞辱政治的有效性，认真思考这种做法究竟是会改变律师这样的人、教育他们，还是让他对必须保持沉默这一点越发深信不疑，并迫使其他人相信进步分子就是“敌人”。这样的战法意欲何为？难道我们只想要争取或教育那些已经跟我们站在一边、认同我们的公共行为准则的人吗？这样的战术能如实反映美国种族问题和种族歧视的复杂性吗？

文化研究进一步认为，对两极分化的不断重申，恰好帮忙制造了取消政治的极端条件。美国社会（可能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不是由两个阵营构成的，它是一个由文化和政治的立场与形态构成的复杂领域，每个立场都由多重的问题、分歧和承诺所界定。也就是说，每个立场都是不纯正的，混杂的，通过从属和摒弃的方式，与

其他的立场发生联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构成方式，给出了民粹政治（populist politics）与大众政治（popular politics）之间的区别。前者力求同质，排除异己，后者试图组织差异和多样性。我认为，美国的情况是保守势力正在发动一场民粹主义的战争，而反对的力量则应追求更加大众化的政治。

这些和我想提出的第三个方面紧密相关：关于“同意”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同意”身处从属地位，并受到支配？它曾促使马克思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意识形态的概念理论化。这个问题有其经验性的一面，我们是否知道谁同意了什么？就拿特朗普的当选来说吧，主流的说法是他的胜利主要（且继续）依靠愤怒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支持。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根本是假的，然而却不妨碍它继续流传。举这个例子，不是因为我关心选民构成，而是因为我关心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果之间的联系。我们了解人们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吗？知道他们是在何种状态下表示的同意？是气愤、兴高采烈、绝望，还是冷嘲热讽？这样的同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同意既不简单也不必然，它总是在斗争中被生产出来的。政治信仰不会说变就变，新社会关系不会说有就有，旧社会关系也不会说没就没了。我们需要为重塑新旧关系的工作打好基础，确保某些具体的矛盾和差异的活力而淡化其他的。这些斗争都发生在当代世界的文化领域，发生在大众的地盘上。我认为，在大众之中，同意是斗争的结果，各种形态的同意在这里被引发、被挑战、被调取乃至被获取。

我从事文化研究四十余年，提出过两个还算有预见性的见解。第一个是大众多在情感层面运作。这里的“情感”指的是人们在各个维度上的心理感受，它可以表现为意愿、注意、情绪、感觉、压力、欲望、关切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讲，情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可

返回目录

以想到弗洛伊德、尼采、本雅明和威廉斯），然而早在所谓的“情感转向”之前，女权主义者与文化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发展情感理论。情感常常要么被视为纯粹自发、毫无结构的，要么被当作是意识形态的、生物学的或生命政治的产物。文化研究则再一次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将情感视为展开文化工作和政治斗争的场所。当进步力量不断追问“义愤何在”时，保守力量则在动员和形塑人们的情感，其结果或许就是特朗普的胜利。这不仅仅是偶然发生的，也不仅仅源于其他地方（例如，在经济中）产生的感觉。

第二个是我曾提出，1950 年代以来，政治（至少在美国）越来越为情感所盘踞。它在政治光谱的所有方面发挥作用，以至于我们必须开始谈论情感政治。酷儿理论的奠基人伊娃·塞奇威克曾提议，左派要停止教导人们应该有什么感觉，而开始试着了解人们实际上有什么感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改变他们的“感觉结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在政治文化框架内使用“量标地图（mattering maps）”的概念。问题不在于人们能否辨认出真实与谎言的区别，而在于这种区别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不在于人们是否愚昧，以至于意识不到自身立场中的自相矛盾，而在于这种矛盾是否开始影响他们的生活；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社会差异（比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而在于哪些差异与他们有关，以及如何发生关联。

只有当人们（物质地、意识形态地和情感地）身处大众之间，愿意把自己的所感所信置于风险之中时，政治的可能性才会出现。这种与大众接上榫头的工作，就是文化研究。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思考它所有的复杂性、偶然性、情境性和矛盾性，谁又会这么做呢？知识生产和大众政治的教与学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谁又愿意在其中承担协商调停之责？此项工作当前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希望我们文化研究的同仁们，能够热忱而严谨，共同承担之。

这正好引出我演讲的最后一点：文化研究具有谦逊的品格，它要求知识工作成为一种对话，一种充满激情、愉悦的辩论。这样的对话必须找到新的方式去展开争论和辩驳。我们不再需要一味坚持自身立场和差异的对话，而是需要推动对话，促使它把我们带向更好的知识，以便我们能够和他人一同继续思考。这样的对话，要求新的分工与协作的实践，要求新的沟通形式与媒介，要求新的基础架构，从而创造出不同的布局和新的差异联合体。

获得文化研究协会颁发的斯图亚特·霍尔奖（Stuart Hall Award），我深感荣幸。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个人感情上来说，这个奖都对我意义重大。沉浸在文化研究中的生命，绝不孤寂。在此过程中，教学相长，有时昂扬欢喜，有时又灰心不安。允许我引用孔子的话（多谢陈清侨的指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我而言，这个奖正代表着我和我的师友们一同走过的路。我的朋友和老师，包括詹姆斯·凯瑞和斯图尔特·霍尔，梅根·莫瑞斯和约翰·克拉克，还有我多年的学生们，他们已经成为我的挚友，常常让我在恍惚中觉得，我教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们正在教我。

愿我们觅得灵感，欣然接受这份礼物，继续同走文化研究之路。保持智识上的乐观主义！谢谢大家！

“社会–国家”复合体的建成和瓦解(1940s–1980s)[1]

王晓明 *

人类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当中，世界各地通行的那些主导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似乎都明显不再能有效地帮助人类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挑战，反而拖着各地的人民往保守和消极的方向往下坠。因此，如何创造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来克服危机，重振追求进步的社会共识，就成为一个关键的新任务。

在这个情况下，身为亚洲人和中国人，重温 20 世纪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在反抗帝国主义、追求社会解放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1

中国革命是在 1900 年代初全面兴起、迅速成为其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主潮的。新的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的一大关注点。1900–1940 年代，在这方面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设想，也催生了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大约从 1920 年代中期开始，在

*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1 全文发表于《思想》，台北，第 37 期，2019 年 4 月。——编者注。

多种国际和本地因素[2]的合力作用下，如下这一种四步走的设想 / 实践，逐渐压倒其他设想 / 实践，成为多数革命力量赞同并参与的首选方案：创建一个重视暴力作用的革命党——而非意在选票的所谓“议会党”，以这个革命党去组建一支革命的军队，以这支军队去夺取国家政权，以革命的国家机器去全面改造社会。

1920 年代末，国民党[3]基本实现了这一方案的前三步：建立了一个以“党军”（party-army）为主要支柱的“党国”（party-state），但远远没有完成第四步：以“党国”的力量全面改造社会。是到了 1950 年代，在共产党手中，这个方案才完整地被付诸实践：不但有了“党军”和“党国”，而且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快速完成了对整个社会的堪称彻底的改造。[4]

这个改造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党国的近乎无限的膨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经济、文化和社会，更不要说政治和军事了，统统都在党国的直接掌控之下，几乎所有的机构和组织，都直接是党国系统的一部分。党国不但将——西式政治学所区分的——“国家”和“政府”合为一体，而且将——西式政治学和社会学所区分的——“国家”和“社会”，差不多也完全合为一体。

按照上述西式理论，当然可以说，1950 至 1970 年代的中国大陆，

2　这些国际和本地因素中，特别重要的是如下四项：1，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暴露的西方式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体系的野蛮性质；2，苏联的建立；3，中国第一代（以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和杨度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人的普遍的思想左倾（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普遍向往）；4，自 1890 年代开始，因为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的不断受挫，在各种革命力量中间普遍累积起来的日趋激烈和注重实效的政治意识。

3　在 1900-1920 年代的中国，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是规模最大、一直占据中国革命的中心位置的革命党。

4　可以用如下三方面的情况来说明这个改造的彻底程度：1，所有文教机构的国有化，这些机构全部成为政府的一部分；2，绝大部分工商业的国有化；3，全部县级以下的乡村的“人民公社”化，即将全部农民的绝大部分经济和政治生活，都纳入“人民公社”——它同时兼有基层政府和国营农场的双重身份——的直接管理。到 1950 年代末，这三方面的改造都已完成。

在制度上，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别的相对独立的系统的。但是，如果不拘泥于这些理论的概念标准，如下描述可能更为准确：在这 30 年里实际存在于中国大陆的，是一个以党国为中枢的“国家 – 社会复合体”（state-society complex）。

2

中国革命走到 1950 年代，竟是以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 – 社会复合体，作为它的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结果：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革命走上了歧途？

如果只是看 1950 年代的状况——其时这个复合体刚刚成形，恐怕不能作这样的判断。

中国革命是在如下这些实际状况的制约下展开的：现存的物质性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军事力量——基本上是阻碍革命的，[5] 革命只能依靠某种新的能发挥强大精神动员力的团体力量来推动；面对来自西式帝国主义的持续的压力，[6] 中国社会必须保持内部的高度一致，不能四分五裂；中国革命是一个主要基于长程理想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它不应该停止于某一个阶段，而是要不断地往前走，因

5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对于“为何会有中国革命”的讨论，这里只说两点：1，虽然经历了如太平天国那样的内部战争（这造成了南方很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但整个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整体上并没有形成足以激发大规模革命的危机；2，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还是会形成中国革命这样激烈和全面的历史运动，主要的原因，是文化的和政治的，即当中国被动地、日趋剧烈地卷入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主导的新的全球秩序的时候，中国的主流文化、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型构的深刻的不适应。

6　即便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压力也有增无减，以 1931 年“沈阳事变”为开端的日本的军事侵略，就是一个极端的表现；二战以后全球“冷战”造就的紧张局势（如 1950-60 年代在韩半岛战争和印度支那半岛相继爆发的战争），也同样体现了这个压力，或者说，对这个压力的强烈反应。

此，需要有一个始终引导——必要时甚至强制——社会往前走的政治力量……

正是这些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持续推进，势必和某种集权性的、有强大的统摄和强制力的组织力量的持续壮大相辅相成。也正是这样的基本形势，解释了为什么那个“革命党－党军－党国－革命社会”的路线图会压倒其他路线图，成为革命的首选方案。从这个角度看，一旦革命党夺取了国家机器，放手大干，类似“国家－社会”这样的复合体的形成，就是一件迟早会发生、可以说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事。[7]

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因之一就是反——满清和其后的各式——专制，中国的革命者当然知道：任何专制——或缺乏约束的集权——系统都会走向腐败和灭亡。如果客观形势决定了，类似党国这样的集权制度和某种类型的国家－社会复合体，是中国革命在特定阶段不得不借用乃至创造的政治和社会工具，那么，这些副作用明显的工具会不会因此反客为主、毒害使用者、将革命引入歧途？中国的革命力量能否通过清醒的政治思考和持续的政治实践，克服后一种可能，就成了决定革命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应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这一点都是有所思考、也在制度上有所规划的。[8] 但是，这些思考和规划是否足够？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还得仔细去看 1950–1980 年代的实际状况：当以党国为中枢的国家－社会复合体建立以后，它实际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是“国家”

7　1934 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以及 1920 年代晚期至“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广西、福建、山西、重庆和西北地区分别由当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企业家）施行的类似的社会改造的方案和实践，都可以被看成是这种复合体的早期表现。

8　虽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倾向，是偏重于强调团体价值的崇高和集权的正当，但在解释其“五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时，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其保障政治民主及其制度弹性的意义；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在 1940 年代晚期，认真思考过共产党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式农民革命的覆辙的问题。

利用自己在这个复合体内的独大之势，快速地吞噬“社会”，导致这个复合体很快丧失其复合性质？还是“社会”虽然被整合进复合体、丧失了绝大部分自主的制度性保护，却同时获得了以若干特殊的方式向党国体制借力的可能，因此在国家体制之内持续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整个复合体的单极化？尤其重要的是，党国体制确立以后，是革命党继续保持其非国家甚至反国家的性格、从而有效地驾驭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国家机器为革命所用？还是革命党迅速被这国家机器所反噬、逐步官僚化，导致党和党国的整体变质？……

只有了解了上述这些状况，我们才能判断，党国和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建立，是否意味着中国革命走进了歧途。

3

从道理上讲，党国是一种矛盾的体制：一方面，它在制度上完全由革命党掌控，而中国的革命党（不仅是中共），本来都是有某种非——甚至反——国家的性质的；[9]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强大的国家（the state），革命党是为了要充分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才来组建党国的，它只会最大限度地强化它，而不会削弱它。[10] 在这种情况下，党国内部——至少在其初建的时候——势必形成一种“党”与“国”之间的不协调。

9　造就这一共同性质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前述构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因之一的反专制的共同诉求之外，现代早期的革命者大多经由不同的思想脉络（大同思想、佛学、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形成一面推崇“国家”的救世功能，一面却视其为仅具有阶段性价值、以后应该逐步消亡的认识。因此，革命者大多不会觉得科层制式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有多大的正当性，相比起来，他们更认同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另外，严酷的战争环境固然有助于强化中共的军事化的组织架构，同时也会强化党内要求共同决策、避免因个人独断造成决策失误和集体损失的政治氛围。

10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共领导的新国家的论述，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个矛盾：一方面，他承认国家应该逐步消亡，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表示不忌讳高度集权的“独裁”。

1950 年代初的情形就是如此。虽然是中共一手组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但在国家 / 政府的制度构造上，中共却基本是仿照已有的国家制度，并没有多创新制。[11] 因此，党国内部的两个系统——“党”和“政府”——的并存，其运行方式的并不完全一致，都相当明显。由此形成的某种制度性的张力，[12] 也可以说相当清晰。

但是，大致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不同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各级组织本身，明显加速度地政府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当政府和军队完成所谓“正规化”、官员和军人分别以行政和军衔分级的时候，[13] 专职党务人员也同步嵌入上述级别、领取相应的差额明显的薪水和其他“福利”[14]：这意味着党务人员的官员化获得了正式的制度体现和保障，它自然势不可挡了。

当然，党组织的层级结构本身，是这个政府化的更深的动因。自从中共选择“列宁道路”，[15] 遵循以“全党服从中央”为归宿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6] 实际上主要是按照军队的模式重构党的层级系统，中

11　这仿照的对象主要是两个：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体（包括其民国变体）和苏联式的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政体。因此，在创造新的国家 / 政府体制这一方面，毛泽东还不如孙中山的动作大。

12　举三个体现这一张力的例子：1，各级各类的政府机构，都设有一个实际掌握该机构之行政权力的党的委员会（该机构的高级官员大多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该机构的所有重要事务，都须由这个委员会在其书记（这个职位通常并不由该机构的行政长官担任）主持下讨论决定，而非由行政长官个人决定并负责；2，凡是中级（即所谓“厅局”）及以上各级的政府机构中，除了上述党的委员会以外，通常还设有一个叫做“机关党委”的党组织，该机构内的所有党员都属于这个机关党委，而该机关党委的负责人，通常由非该机构长官或高级官员的党员来担任，因此，该机构的部分人员之间，会形成一种双重但反向的上下级关系：作为政府官员，A 是 B 的长官，但作为机关党委的成员，B 是 A 的领导。3，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内的党组织，都有一种叫做“民主生活会”的定期活动，其主要内容是组织党员以平等的身份，展开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给具有党员身份的低级官员，提供了批评高级官员的制度性的机会。

13　完成于 1955 年的政府官员行政分级和军衔的级数，都是相当高的，前者为 29 级，后者为 20 级。对应于这些级别的薪水之间的差异，也堪称巨大，以行政级别的薪水而言，最高者与最低者相差达 30 倍。

14　这些“福利”包括住房、汽车、医疗、“特别供应”的酒和食品、舞会和电影放映，乃至（提供给高级干部的专职的）厨师、司机、卫士、生活秘书和医护人员等。

15　粗略来说，此处的“列宁道路”可以被如此概括：不是如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在完成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现代化以后，才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类似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国家，由共产党组织和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之内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

16　毛泽东主导的中共第七届代表大会（1945）所制定的中共党章的总纲中，就明确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共的组织架构本身，就已经具有类似“科层制”的基因。随着党国的建立，根据掌控庞大的行政、经济和军事系统的需要，中共日益全面地将自己对口嵌入这些系统，由此形成的细密分级的组织架构，其实是越来越跟现代政府的科层架构没什么两样了。

可以说，正是组织政府化和人身官员化这两方面的持续的合力，相当快速地消灭了至少 1950 年代早期还明显可见的党国内部的制度性张力。1959–61 年的大饥荒，清楚地证实，在整个现代早期[17]大体维持着的革命党的非国家（non-state）性质，以及由此获得的对于政治性制度变化的敏锐反应能力，在中共这里是基本丧失了。

当然，党组织的政府化并非毫无阻力。前面说过，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倚重精神动员的能力，经过严复、梁启超和陈独秀、鲁迅这两代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到 1920–1930 年代，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的理想，至少在知识青年当中，可说是深入人心。像中共这样的革命党，当其尚未执政、不能向人普遍提供物质利益的时候，更势必以革命的意识形态[18]为其招募成员、凝聚人心的主要手段。因此，1950–1960 年代的中共党员当中，有大批人不同程度地信奉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于各级党组织的加速度的政府化，以及由此强化的党干部在言行举止方面的普遍的官僚化，他们是相当反感的。[19]

17　这里说的“现代早期”，大致开始于 19 世纪晚期，结束于 1940 年代末 1950 年代初，如此分期的依据，见王晓明：《< 中国现代思想文选 > 序》，王晓明、周展安编，《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18　中共成员实际信奉的革命意识形态，并不能仅仅归于列宁 / 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其中还混杂了许多其他成分，包括现代早期广为流传的各类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佛学和其他传统思想。

19　就是因为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 1950-60 年代，在通行的政治词汇中，“当官”是一个具有贬义的说法，中共的官方文件也一直避免称其干部为“官员”。大致是从 1990 年代晚期开始，在官方文件中，“官员”一词才消除了其贬义，与“干部”混用、甚至开始取代后者的。

更重要的是，上述“党”逐步被“国家”吞噬的过程，正与党国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组建“国家－社会”复合体的过程同步。党国对社会的强力改造，虽可说是出于革命的理想，却因为各种内外条件[20]的限制，造成了大量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社会伤害。[21] 随着党国内部的制度性张力日渐消亡，国家独大的负面因素：行政运作的自利倾向、社会控制的密不透风、干部 / 官员的专权和腐败…… 更从多个方面，不必要地加剧了上述社会伤害的范围和程度。这自然会引起人民的广泛不满和反抗。

于是，在 1950 年代中期，来自被“国家”吞噬的“党”的内部的不满，和来自被“党国”伤害的人民的不满，开始聚合和爆发。

4

这些爆发当中，有许多采用了一般常见的鲁莽、违法甚至暴力的方式。[22] 但我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另一些往往以温和、合法的方式、在党国体制内部展开的爆发。

其中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爆发，是 1956–57 年的“大鸣大放”运动。这其实是中共自己组织的活动，在许多地方，甚至是由党干部反复号召

20　这些条件中比较重要的是：国际“冷战”格局、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社会现实、“超英赶美”式的经济发展方案、只重目标不计手段的伦理意识，以及凡事首先从敌我关系来理解的政治思路。

21　其中最明显的是如下三方面：一，对于被党国认定为“反革命”或“不革命”者的全面——从言论表达、经济收入到人身安全——的压迫；二，对农民的持续而深刻的盘剥：土地、户口、农产品价格…… 三，对于改善城市一般民生的贫困状况的实际的漠视：1950 年代末的大饥荒、其后日益细密的食物 / 日用品凭票供应制度……。

22　1959-60 年间遍及西北、东北、西南和中原地区的各种哄抢粮库和运货火车的饥民的骚乱，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文革”期间民众的那些冲击党政机关、批斗党干部 / 官员的行为，虽然大多以“革命造反”的名义展开，却有很大一部分，实际是表现了因各种原因处于国家 - 社会复合体的低等阶位、因此蒙受较多压抑者的强烈不满。

动员才得以推进的。这场运动以各级党组织召集的会议和党国的报刊和电台为基本媒介，那些因此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被撤职、遣送去农村、甚至被关进监狱的人，[23] 绝大多数在各级党国机关任职、或者在大学 [24] 读书，其中大约一半是中共党员：可以说，这完全是一场党国体制内部的运动。

但显然，这同时也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社会运动。那些所谓的“右派言论”，大部分是从广义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理想——平等、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出发，从个人、人民或民众的角度，对党国及其干部 / 官员提出批评和建议，而非只是站在党国的立场上说话。[25]

这不奇怪。中国虽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堪称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但直到民国时期，朝廷 / 国家大体上还只是高踞于民众的日常世界之上，并无意愿——也没有制度条件——下沉到这个世界里，将它一块块都纳入囊中：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说，中国一直有一个非官方的庞大的社会，在大地上自我运行。是 1950 年代中共创建的党国，才第一次试图用国家机器的强力，彻底地改造社会。

应该佩服党国，它居然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个改造；但也要看到，这完成的至少很大一部分，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党国可以很快地把一个人的职业身份从编辑、作曲家和工程师转变为“国家干部”，他的思想和情感却不可能同步改变；你可以迅速消灭各种民间

23　据 1979 年官方公布的数据，“右派分子”的总数是 55 万。实际数字极可能比这个多，但至今并无各方接受的权威数据。

24　其时大学都已经被收归国有，大学的行政和教学部门，也都成为党国机关的一部分。

25　受制于档案资料的欠缺，目前并无可能对于其时各地“右派言论”的内容作出较为准确的归纳和分类。我这里的判断，主要是依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录而得出的。

团体和非官方的言论空间，原先在这样的团体和空间里展开的能量却不可能立即消散，它们势必要在新的团体和空间——也就是党国的体制空间——中四处冒头。

一个只有十年历史的党国，胃口再大，也消化不了一个体量巨大、延续了两千年的社会的，硬要这么吞，结果一定是卡在半途：表面上是“国家”重构了“社会”，变后者为自己的一部分，实际上“国家”却因此变异，它的几乎大部分细胞，都不同程度地掺进了非国家的成分，一旦条件许可，它们就会按原有的惯性自行其是。1957 年的“大鸣大放”就是一个显例，它清楚地说明了，前述的“国家－社会复合体”——至少在 1950 年代中期初步成形时——的“复合”是什么意思：那是一个外形严整、内部却明显存在张力的系统，不但党国利用它一口一口地吞咽社会，社会也同时借其空间，在这里或那里反弹和抗拒。

“大鸣大放”运动很快就被严厉地镇压下去了，以致我们今天都习惯于称其为“反右运动”。但这一种在党国体制空间内展开的社会抗争，却并没有随之结束。它有时候表现为中共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为民请命式的政治异议，例如大饥荒时期（1959–61）从基层到中央许多党干部 / 官员对“大跃进”的不约而同的批评；[26] 有时候则表现为文化界人士在党国媒体上此起彼伏的讽刺和批评性言论，例如 1961–62 年间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由杂感、漫话、学术演讲和文艺论辩等所汇合而成的所谓“文艺界的春天”的气氛。[27]

1966–76 年间的“文革”，不但在最初那几年，给社会抗争的粗暴、

26　这些异议同样遭受严厉的镇压，而且也被扣上了与 1957 年“大鸣大放”运动相类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

27　这个气氛之所以能形成，周恩来（其时任国务院总理）和陈毅（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国领导人在 1961 年的多次意在显示政治宽容的讲话，是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的。这种上下呼应的情况，正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党国体制的容纳 / 表现“社会异议”的内部弹性。

“违法”的爆发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也在差不多整整十年内，给这抗争的温和的“体制内”表达提供了多样的空间。[28]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众——不限于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国、国家–社会复合体和毛泽东式的政治领袖的怀疑和反思，在社会上持续发酵；一些在根本的政治判断上迥异于党国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也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初步成形。在某些地区，受激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情势，上述怀疑和反思甚至会逾出温和守“法”的边界，酿成激烈的爆发，[29] 社会抗争的两种形式的交汇，也因此凸显。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十年间，党国的软硬两面的制度性暴力，在许多方面是强化到了极为乖戾的程度的：将数百万文化人和干部/官员撤职、拘禁甚至处死；强迁大约两千万中学毕业生去乡村务农；多年冻结城市职工的工资；工厂中的党干部可以随意拘押被其认定是犯了所谓“生活错误”[30] 的工人；一旦被人举报，误踩了报纸上的领袖头像的公民就可能锒铛入狱……

如上段所述，正是在这十年内，不同形式的——粗暴违法的，和体制内的温和的——社会抗争都获得了四面伸展——甚至爆发——的机会，那么，“文革”式的党国暴力的强化，在这当中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许多昔日颐指气使的党员高官被撤职、在批斗会上垂首听任训

28　整个“文革”期间，尤其是1966-1969年间，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自主组建各种非官方的“群众组织”（这在“文革”前是党国绝对不允许的），拥有比1956-57年间更多样的思想和言论表达的途径（贴大字报、组织游行、印制和散发传单/报刊……），可以在“革命造反”之类的名义下公开质疑制度性的压抑（例如要求提高工资、增加劳动福利、拒绝按照课表上课和考试等），甚至可以（利用“大串联”和“上山下乡”运动）去各地寻找思想和意趣相投之人以交流看法……。

29　例如1968年夏天武汉地区“百万雄师”（其时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一派的工人和武汉军分区的部分军人对于（党中央派往武汉的）高级代表的公然抗争……。

30　这是1940-1980年代间中共的一个流行的政治词汇，主要指各种不符合主流标准的恋爱和性爱行为（如婚外恋、未婚怀孕、性骚扰、在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自愿的性行为……。

斥、甚至被毒打，而不少“文革”前因为种种原因——例如出生于富农、小资本家等等所谓非“成分不好”的家庭，或本人政治表现不佳——低人一等的普通群众，却大呼“造反”、深觉扬眉吐气：如果把这两种情况联系起来，是不是可以看出前述“社会”借“国家”以行事的“复合”状况的一种堪称极端的表现？连党国的制度性暴力，都可能因它的非常态的膨胀，而被混入了民间宣泄被压抑之情的冲动，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内部张力，真是无处不在了。

这就是 1960–70 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的特别之处了：说得粗糙一点，尽管遭遇了党国的强力改造，“社会”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许多部分，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制度规范之下，蜷伏和散布于“国家”之内。

5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81 年，又正式宣布“文革”是一场“内乱”，其发动者毛泽东犯了大错；1980 年，宪法中取消了“四大自由”的条款：[31] 这一系列官方动作，并不只是顺应民意，要结束空谈革命、民生困顿的状况，以便为党国另奠新基，[32] 也包含着收紧非官方的表达途径、避免“文革”式失控再次发生的用心。

对党国而言，1980 年代 [33] 堪称大转变的时期。一方面，党国逐步

31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自此以后，在公共场合贴大字报就成了违法之举。

32　自 1949 年建立起，党国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带领人民干革命”这样的政治共识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党国一直将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头等大事之一），但当“文革”结束、人民普遍开始视“革命”为虚幻之事的时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国的统治阶层，势必要为党国另建新的合法性，而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所谓建设“小康社会”），则成为这方面的首选方案。

33　这里的“1980 年代”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分期概念，它大致开始于 1978 年，结束于 1992 年。

放弃了改善或维持“国家－社会复合体”的雄心，不但全面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将政府的直接行政网络大幅度撤出乡村，[34] 而且全面重建和扩建市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将大部分原来由政府直接操作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及其相应责任，都转交给市场处理，推卸给个人承担。[35] 当然，那些直接关系到党国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经济部门，例如银行、能源、电信、航空和铁路交通部门，国家依然牢牢地抓在手里，但它们的基本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不再是“全民所有”、从经济上支撑成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关键部门，而是戴着“国有”的帽子、实际上为中央政府所有、充当国家机器的经济部分的主要构件了。[36]

至迟到 1990 年代中期，延续了 30 年的国家－社会复合体，是基本解体了。原先那个被收编和肢解于上述复合体内的“社会”，随之逐步恢复：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其后也在一部分文化和政治领域里。大约到 2000 年代初，可以说，那种明确区别于国家的实体性的社会，又部分地在中国大陆重现了。

另一方面，党国体制经历了内在矛盾的剧烈冲突，自身也大变了。以 1970 年代晚期的一系列思想和政治变化为开端，[37] 类似 1956–57 年

34　1950 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但将政府机构细密地下沉到村落的层面，而且彻底重组农民的几乎全部经济活动，大幅缩小农民的私有财产，形成了国家对乡村和农民生活的全面支配，为国家 - 社会复合体的建立，奠定了关键的基础。因此，1970 年代晚期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不但意味着政府的直接管控网络撤回到乡镇一级，而且意味着政府明确放弃对于农民的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至少 20 年间，政府除了收税和维持治安，对乡村基本上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直到 2000 年代中期，这个情况才开始改变，但因为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就不赘述了。

35　这里粗略地列出这方面的三类主要事项：1，引入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政策，重建从房地产到金融的各类市场，放弃大部分价格管制，将 1980 年代之前的有限的市场经济，扩建为近乎无所不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全面引入外资，同时大幅度减少国营企业，造成数千万职工失业；3，近乎全面地放弃 1950 年代建立的对城市居民的“二次分配”制度（这是国家 - 社会复合体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撤回国家此前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和公共能源（如水、电和煤气）方面承担的大部分经济责任。

36　这些部门的组织形式也因此大变，大部分变身为集团公司（其中很多直接在股票市场上市），内部管理上基本采取主流资本主义企业的模式，其管理层却继续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并因此在重大业务决策上，继续按照中央政府的指令行事。

37　其中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1979 年由部分中共高官发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口号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差不多同时主要由北京的年轻市民展开、以“西单民主墙”为第一载体的非官方的政治和思想讨论。

那样的社会不满及其表达、1959–60 年那样的中共内部的政治异议，和类似 1960 年代初期那样的文化界的讽刺批评，都以更大的范围和日趋激烈的程度，在党国体制内外持续地展开。尽管遭遇严厉的压制，[38] 甚至引发中共高层的剧烈的人事变动，[39] 主要在“体制内”空间展开的对于党国的社会压力和抗争，还是持续扩大，在中共的干部中，甚至形成了一个规模甚大、得到党外广泛支持的所谓“改革派”的群体。[40] 党国体制内部的张力，由此凸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个张力的最剧烈的爆发，是 1989 年春天的抗议运动。它虽由大学生发动，却以被撤职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病故为直接起因：社会各界对党国的抗争，和党国高层的内部冲突，从一开始就深度混合。在北京和大部分省会城市，都有大批党国机关的干部和官员，以包括结队上街游行在内的各种方式，支持和参加运动，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标明“中共中央组织部”“新华社”“机械工业部”之类机关名称的游行队伍的横幅，把党国体制内含的社会性细胞的规模及其活跃的能量，标示得非常触目。

……

1950 年代早期以来党国内部的制度性张力的明明暗暗的延续，和作为其主要形式的社会抗争的“体制内”表达的断断续续的发展，都由此划下了句号。自那以后中国大陆的持续变化，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38　例如 1982 年和 1984 年由党国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出面发动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

39　1981-89 年间，中共撤换了三任主席 / 总书记，尽管其具体的政治情势各不一样，这三次人事变动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党国不能有效应对社会压力的深刻困境。

40　这个群体不但有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为其公认的代表，还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大批干部 / 官员的赞同和呼应，连邓小平也一度被广泛认为是其核心人物。

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历程来看，可以说，1980 年代是历史提供给中国革命、革命党及其政治建构的最后一次机会。“文革”已经以极端的方式，将党国和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内外困境暴露无遗，官民两面也很快在痛定思痛、深切反省的方向上形成了共识，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中，彻底检讨过往的教训，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涵义，进而探索它的新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维度，为中国革命打开新的天地：这应该是可能的吧。事实上，1980 年代的若干思想和政治变化，[41] 都提示了这并非空想。

也正因为这样，国家－社会复合体的瓦解和社会的复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摇动了整个局势，激化了党国体制的内部矛盾，甚至强化了病急乱投医式的机会主义冲动，它们和其他因素一起促发的那些经济、文化和政治动荡，依然是既令人惶惑、也激励希望的，因为它们同时包含着多个方向的可能。1980 年代的中国，虽然迭遭苦难，却并没有完全放弃昔日的大志，它的头脑有点混乱，但视野正在重新打开，它急切地想要退出“文革”式的歧途，却并没有如后来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就一头扎进资本主义了，至少，在 1980 年代，在继续前行还是转身后退这个大的政治选择上，中国并没有拿定主意，它还有选择的余地。

是 1989 年…… 为中国作了决定。这……促成了党国对于新局势的回应之道的成形：它将以彻底清除自己体制内残余的“革命党”因素、鼓励党干部完全蜕变为政府官员的方式，将自己改造为一部以“保持执政”为第一意志的国家机器。……

到这一步，我已经不知道是否还应该继续称其为“党国”了：它实际上就只是一个“国”（state），昔日那个位居其前、企图驾驭它去推

41　例如对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东欧（包括南斯拉夫）的多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重新讨论，一系列推进“党内民主”和公共政治的政策规划和试点，对“党报和人民的关系”“思想无禁区”“党大还是法大”之类政治议题的公开的热烈论辩。

进“社会主义”的“党”，已经名存实亡。惟其只是一个“国”，惟其摆脱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的羁绊，这个大体沿用旧形式的新政权，反而更灵活，更有政治嗅觉和应变能力了：它可以毫不掩饰地模仿西方，大干资本主义，也可以沿用昔日党国的经验，加强社会控制、统一舆论……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里就不展开了。

6

粗略地归纳一下三个初步的结论。

一，1950–1980 年代中国大陆的状况，清楚地提供了对于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回答：中共所建立的这一个“党国”，和由这党国所建立的“国家－社会”复合体，并没有达成当初建立它们时的那个政治目标：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相反，它们在巨量耗费了此前半个多世纪由中国革命的各路力量共同累积起来的广义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社会能量以后，以自身的变异和解体，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和壮大，准备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因此，从较为长程的历史的角度看，中共式的“党国”和“国家－社会”复合体，的确可以说是意味着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了歧途。

二，从政治的角度看，上述情况所凸显的多种历史教训中，革命力量如何对待（作为西式现代的最重要的政治建构）的“国家”/国家机器，可能是关键的一项。无论孙中山们还是毛泽东们，都显然缺乏对这种现代国家/国家机器的透彻理解，因此很容易轻视它，以为只是一种现成可用的中性的政治工具。[42] 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家/国家机器绝非

42　与此类似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在 1980 年代，都有极多自认是服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人和知识分子，近乎不假思索地相信：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运用资本主义来达致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哪怕是在技术和所谓“生产力”的层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作用和结果都是尖锐冲突的。

只有其为人所役的一面，它更有不知不觉地改变人、最终役人的那一面。

而且，这役人的一面并非只在你掌握了它、开始运用它的时候才展开，它在你试图夺取它的时候，就已经展开了：一旦你为了尽快夺取它、主动将自己改造为某种准机器的力量，国家 / 国家机器改造你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运用党国强力改造社会的过程，会这么顺畅地同时成为“国”一步一步改造“党”、最终将其收编为自己一部分的过程。就在毛泽东们不断要求党的干部加强“革命精神”、拒绝“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同时，学自苏俄的“民主集中制”，和建国以后那些不断强化国家集权的制度性措施，早已釜底抽薪、决定了前者的无效。

三，但是，这是否就证明了，由国民党开创的那一种聚焦于国家政权、以之为推进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的革命思路是根本错了，应该完全放弃？今后的革命和进步只能从社会的局部和渐进的变革开始？说实话，我现在没法这么肯定。至少类似中国这样被动卷入西式现代化历史的亚洲社会，恐怕很难只是学着走譬如荷兰英国那样的渐进式的变革道路。迫于自身历史和弱肉强食式的国际条件的压力，中国的革命很可能必须在政治权力的建构上有所创造，要借用类似政治突变的冲击力，来创造新的社会情境，孕育后续的革命势能。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某种新的类似——强调一句，仅仅只是在功能上类似——国家的政治机构，而非只是继承既有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机器，可能仍然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依循类似早年无政府主义那样的变革思路，我觉得是不够的。

在各地的生物——不仅是人类——世界愈益密切地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小国寡民”式的自足状态是很难维持的，大型的公共权力因此就不可避免；即便“愚民”状态如巨厚的冰层难以打破，“劳心者治人”的精英政治模式终究不是未来该有的选项，只有实现了民主，世界才能安稳：如果这两个判断大致不错，如何创造真正指向民主的公共权力，

在运用和改造这种权力的过程中，锻炼和发展公众——而非只是其精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形成指向民主的公共权力与公众的民主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应该就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吧。

在这个事情上，人类积累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堪称丰厚；自19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更提供了非常多样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深入结合和检讨这两方面的成败得失，为后续的奋斗提供思想的助力，这应该是今日知识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就觉得，深入分析亚洲各地在创造新的政治建构方面的成败得失，为此充分了解各地的历史情境，整理和交流相关的思想文献，是目前迫切需要、也相当可行的工作。就中国而言，尽管实际的政治进程多是贡献失败的教训，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当中，却有不少对于中国革命与“国家”之关系的深入的讨论，值得重新整理。

2018年10月 上海

形式美学：自动化思想中的想象、文本与图像

李沐杰 *

在数码科技为主导的媒介生态中，科技过程如何生成实际存在与感知经验？是否存在一种可以桥接机器推理机制与生活经验的美学？这样的假设并不是在暗示存在一种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模仿（simulation），比如普遍观点与话语倾向于将机器人性化或将人类思想程序化，相反，这篇文章的假设基于这样一种思考缝隙，即存在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它建立在机器思考与人类思考的共通性之上，它具有过程性与形式性的特点。

作为研究机器与人类活动的交界领域的一种方法，媒介与文化研究适用于探索上述假设。本文将主要从文化视角检视诸如文本与图像这些文化形式。这样的检视并不是在探索文化如何在数码和自动化条件下演变，而是意在探讨人类是否可以像机器一样思考，从而与机器推理机制一同生成一种美学。美学在本文的语境中指涉更多的是通过调节想象力而实现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美的本质与感知的探讨。

本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期中关于对想象的理解和定义开始着手探讨。在数码与计算机条件下，一种新型想象应运而生，它呈现了一种推理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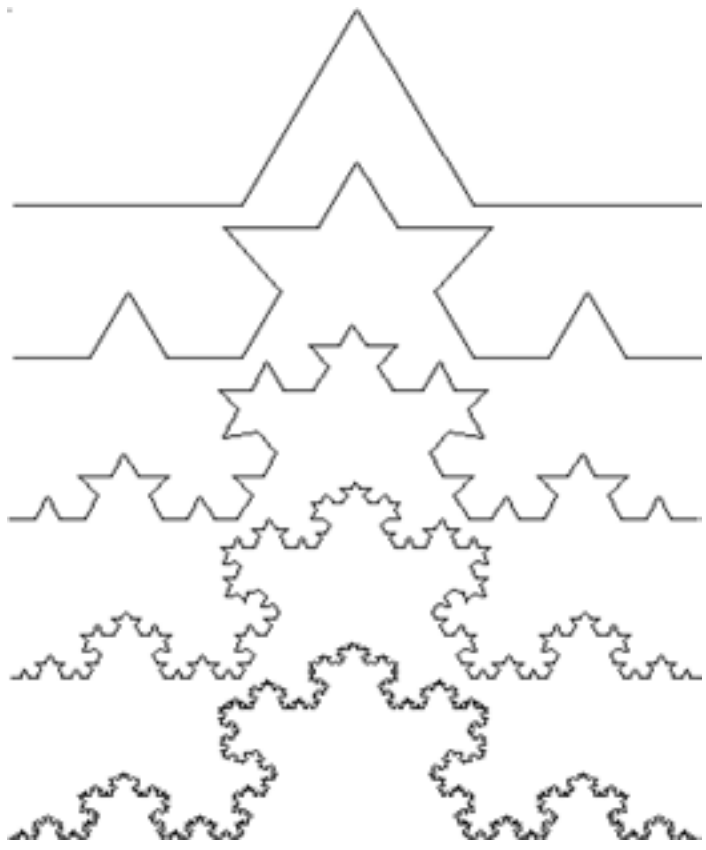
* 李沐杰，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候选人。其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数字哲学中媒介的物质性、过程性与结构性。曾出版学术文章《计算式存在: 网络文化中的否定之力》(2018)、《Machine Languages as Media Infrastructures》（2017）、《唯物时间：当代科技文化中的时间》（2016）等，创意性写作短篇《布控欲望手册》（2018）、实验性小说《Mirage Time》（2017）等。联系方式：0muer0@gmail.com。

此篇文章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联合奖学金的资助。文章初稿成型于由英格兰东南部人文与艺术基金（CHASE DTP）与苏塞克斯人文实验室（Sussex Humanities Lab）资助并主办的“智能未来：自动化、人工智能与认知生态”学术会议（Intelligent Futures: Automation, AI and Cognitive Ecologies，2018 年 10 月 1-2 日）中“美学”主题讨论组的演讲稿。感谢我的导师 M. Beatrice Fazi 和 Ben Roberts 对于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从而激发了对此篇文章的构想与创作。感谢《热风学术》编辑老师在审稿中提到的宝贵修改意见，使得此篇文章在论证上得以完善。感谢我的学术好友张舸给予这篇文章的评论与反馈，使文章的理论架构得以植根于并朝向更系统、更开放的研究脉络。

想象之间的新型关系，这对于我们构建一种桥接机器思考与人类思考的自动化思想（automatic thought）起到了帮助。自动化思想指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它强调科技过程中人与机器的耦合性与工作过程中人与机器的内在和谐趋势，避免了人为的额外控制与强加的目的。在构建自动化思想中，本文探讨了历史上能够反映图像与文本关系的一些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具有自动化思想的一些内在特质。此外，本文将探讨自动书写软件如何通过抽象与关联这两种形式性推理机制生成想象。软件调节想象过程的机制既丰富了自动化思想这一概念，又展示了一种计算式的自动生成过程。其中的美学则兼容着机器性推理与感知经验，它的形式性体现于自动化思想当中，即机器性推理与感知经验共同朝向一种技术过程的运作。

图一　法国佩奇梅尔(Pech-Merle)史前洞穴岩画

一幅史前时期的洞穴岩画（见图一）描绘了现实事物的实际样貌，这说明人类通过创造关于自己的图像而立身于世界。在这一时期，想象作为创造图像的方式，成为了理解世界以及与世界沟通十分重要的手段。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线性书写的发明使想象得到启蒙。书写的方式相对清晰、并具有很强的定义性，它可以有逻辑、具推理性地解释图像，因而使得图像变得透明，并且与世界的沟通更具方法性。书写服务于图像，这使得书写对图像的批判



图二　计算机算法生成的几何图像

性减弱。捷克媒介学者维兰·傅拉瑟（Vil é m Flusser）解释道，书写的线性姿态将图像从其表面到像素逐一撕裂，然后将这些图像的碎片重新捡拾并串成一条线，使得图像毫无批判性地接受这一线性结构。[1] 这是伴随文本而来的关于想象的旧有形式，文本在其中作为一种对于图像的毫无批判力的背景。

在数码与计算机条件下，存在另一种形式的、有别于历史其它时期的想象，它的运作基于对技术图像（technical images）的创造，一种新型想象也由此伴随着技术图像的生产而崭露。假如说旧式想象的图像意在表征世界，新型想象的图像则是在表征计算。举例来说，计算机生成的几何图像（见图二）实际是在表征几何公式与算法，它不同于史前洞穴岩画所表征的现实中的实际事物。傅拉瑟分析到，这种图像代表了一种纯粹美学，一种从与纯粹形式进行游戏中获得的愉悦。[2] 这一纯粹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

1　*Vilém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M]. 明尼阿波利斯 & 伦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1.

2　*Vilém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M]. 明尼阿波利斯 & 伦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1: 128-129.

它揭示了新型想象能够在可能性的既定范围内带来不可预期的情境。然而，新型想象中所蕴含的意图可以与旧式想象的意图相类似，比如生产复制品。举例来说，旧式想象中的洞穴岩画生产了关于事实的复制品，而为了实际用途所生产的一幅关于几何图案的图像（比如在几何图像基础上为实际用途而生产雪花图案）则是在生产关于计算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的生产实际上将新型想象服务于旧式想象，并没有着重于计算本身的过程。本文试图呈现的则是人与机器之间的技术过程通过自动化思想如何生成纯粹的计算式想象，从而彰显一种形式美学。基于此，本文将首先梳理推理与想象之间的关系演进。

想象VS. 推理？

将新型想象置于服务于旧式想象的功能中暗示了推理（reason）在不同类型想象中的作用差异。这种作用差异可以清晰地反映在文本如何对不同类型图像进行抽象的机制当中。这些抽象机制因此可以说明推理如何在想象中运作，以及如何构成生成新型想象的条件。

推理作为生产文本的重要方式，其运作是在文本的线性结构中得以呈现的。而旧式想象的运作则是显形于图像的表面性结构中，因而推理与想象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与结构。傅拉瑟则将这种差异运用于解释抽象的层级演进中，这一演进有助于我们推导出新型想象与推理的关系。具体来说，当书写与文本尚未出现在历史与文明进程当中时，图像表征着一种二维平面，它是人类主体与事物之间的媒介，人们通过掌握平面图像来获取对于事物的理解与意义（如史前岩画的媒介作用，即作为人认知现实世界的一种表征性媒介）。当书写与文本被引入历史进程，线性文本通过将表征性图像翻译为概念、对图像的解释等方法，将二维平面图像抽象为一种单维度线性结构。其结果则是形成了一种普

遍意义上的文本，它充斥着概念、计算、叙事、阐释、投射等多种推理形式。而这一结果则构成了抽象向更高层级——技术图像——进行演进的条件。这即是说，人们在通过多种推理而构成的文本中发现了一种科学性文本（scientific text），这一文本在各种推理形式构成的文本当中具有更深层次的结构与规则，比如结构主义所认为的语言作为一种科学性结构隐藏于各种文本的深层，而这种科学性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抽象并解构着表面层级文本中的既定规则与结构，使得表面层级文本中的推理形式（诸如概念、阐释等）变得松散与瓦解。由此，书写主体实际上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境：他 / 她被卷入了犹如比特和字节般碎片化的漩涡，这一漩涡裹挟了写作过程中的决策时刻和行动的分子化，而这些碎片化的漩涡不可触及、不可表征、亦不可被领会，使得主体感官与姿态（比如眼睛与手指）无法企及。[3] 傅拉瑟将这一层级的抽象称为“计算”，文本成为了深嵌于技术图像内部的一种计算 / 推理，而技术图像则是零维度的，它由马赛克一般的粒子集成，这种构成也决定了一种新的认知与理解。

回到关于不同类型的想象讨论，我们可以将存在于二维图像中的旧式想象理解为它是基于一种对于客体的观察，而存在于零维度式、粒子般集成的技术图像中的新式想象则是对于概念的计算。这里对于旧式想象与新式想象的二元对比并非在彰显这种差异性或将这两者置于两极，而是将二元对比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阐明基于文本的推理对生产不同类型想象的促成作用。通过对推理内在于生成不同类型想象的抽象机制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旧式想象与新式想象的差异是通过与文本中的推理构成不同的运作关系而产生的。在旧式想象中，线性书写通过推理来抽象，它将多维度的生活世界抽象为一种平面形式。而在新型想象中，技

3 *Vilém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M]. 明尼阿波利斯 & 伦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1: 8-10.

术图像从零维度的计算当中将自身具象化并予以投射。这并非说明了技术图像没有给予抽象的空间，而是意在表明，抽象进入了一种新的级别，它成为了纯粹美学的表达，并使得具象化得以实现。傅拉瑟指出了这一级别的抽象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是本文意在从推理与想象关系中得出的结论：它使得图像能够被批判与分析，而不是停留于将文本视为服务于解释图像的工具。[4] 傅拉瑟关于推理与想象的分析向我们提供了思考桥接机器推理与生活经验的自动化思想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在以下构建自动化思想的概念中将会得到进一步展示。

像机器一般思考

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自动绘画（automatic drawing）为我们思考自动化思想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超现实主义语境中，“自动”指的是一种自发的绘画过程，并不伴随有意识的思考或注意力。本文认为自动绘画表达了自动化思想，它不仅是一种探索任意性之可能性（possibility of randomness）的过程，更是通过计算来实现这一过程。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 é Breton）将超现实主义定义为不经推理控制的对思想的表达。[5] 而在自动绘画的例子中，本文认为自动绘画的技术性体现了一种形式性推理（formal reasoning），它体现于自动绘画的技术—物质过程当中，这即是说，本文意在强调工具的物质性构成了机器性推理的条件，从而使得任意性之可能性得以实现。具体来说，绘画的技术—物质过程，如纸张和墨水的质感、用笔的技法、以及随绘画过程而展开的对于留白的处理，都构成着一种形式性的推理，它使得感知与经验得以在新形式产生的过程中生成（见图三）。

4 *Vilém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M]. 明尼阿波利斯 & 伦敦 :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 2011.

5 André Breton, Philippe Soupault, & Paul Eluard. *The Automatic Message: The Magnetic Field;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M]. 伦敦 : Atlas 出版社 , 1998.

图三

安德烈·马森（André Masson）《自动绘画》（1924）纸墨，23.5 × 20.6cm，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藏

另一个例子来自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电影《德州·巴黎》（Texas, Paris）的剧本手稿（见图四）。[6] 电影拍摄剪辑技法在剧本创作中构成了一种形式性推理，即剧本的文本段落结构和写作逻辑是基于不同的电影场景镜头和电影运动技法而构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的手写笔迹勾勒出了对于镜头运动和剪辑逻辑的指示。这一例子并非意在强调书写和文本服务于解释图像的论点，而是展示了一种自动化思想存在于运动影像、文本和技术图像之间的层层抽象机制当中。具体来说，在第一层级的抽象中，线性文本（即剧本内页的印刷文字部分）对于运动影像进行抽象；在第二层级的抽象中，图像化的文本（导演的手写笔迹部分）在表达运动影像逻辑的形式性推理当中，实现了一种“算法”，使得剧本文本整体（两个不同层次的文本）转化为一种技术图像。在电影剧本的这一例子中，形式性推理的机制存在于运动影像—文本—技术图像之间层层递进的抽象过程当中，这种自动化思想使得机

6 Wim Wenders, Sam Shepard & Chris Sievernich. 德州，巴黎 [EB]. 柏林：公路电影出版社，1984。

器与人到底谁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不再必要，它将机器性和人性糅合进了一种内在的技术过程。

(1) DEVIL'S GRAVEYARD EXT./DAY (1)

1-1
A bird's eye view. The camera glides over a vast, empty landscape.

(OPENING CREDITS SUPER-IMPOSED)

1-12 TRAVIS' POV
Bizarre rock formations in red and yellow colors. No vegetation at all. Finally, a lone man walking across this hellish desert. Still seen from high above. The camera sinks deeper, almost to the ground.

CUT TO:

1-2
A redtail hawk, just sitting down on a pointed rock. Very still. Looking.

CUT TO:

A thin man approaching, still at quite a distance. He moves steadily toward the camera.

CLOSER:

1-4
We see now that he is a man in his forties. He wears a sun-bleached baseball cap and a cheap Mexican suit and tie that show the signs of severe exposure to the desert -- sweat stains, dirt, torn at the knees. He wears sandals wrapped in tape and rags to hold them together. This is TRAVIS.

CLOSER:

1-5 1-6
His face is badly sunburned and blistered. His eyes peer out with a child-like innocence and dismay. His lips are cracked and swollen and his tongue involuntarily moves from side to side as though searching for moisture in the air. 1-7 1-8 1-9 1-11
Travis lifts lifts a water bottle to his lips and drinks the last drops, then continues walking across the desert.

CUT TO:

1-3 1-10
TRAVIS' POV -- The hawk flies up from the rock.

1.

Q791

图四

电影《德州·巴黎》（1984）剧本内页扫描版，维姆·文德斯[导演]

需要澄清的是，在技术哲学领域内，这里所使用的“技术”一词并非是将机器视为人之主体的客体化工具或义肢（prosthesis），[7] 也不是在强调机器的自主性，比如将机器看作器官、试图去构建一种人与机器之间的自创生系统（autopoiesis）[8] 或是共生关系（symbiosis）。“技术”所指的是一种传统道家哲学中的科技思想，即一种使得各种

7 马歇尔·麦克卢汉 .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0。

8 Humberto Maturana & Francisco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M]. Stafford Beer Dordrecht: Reidel,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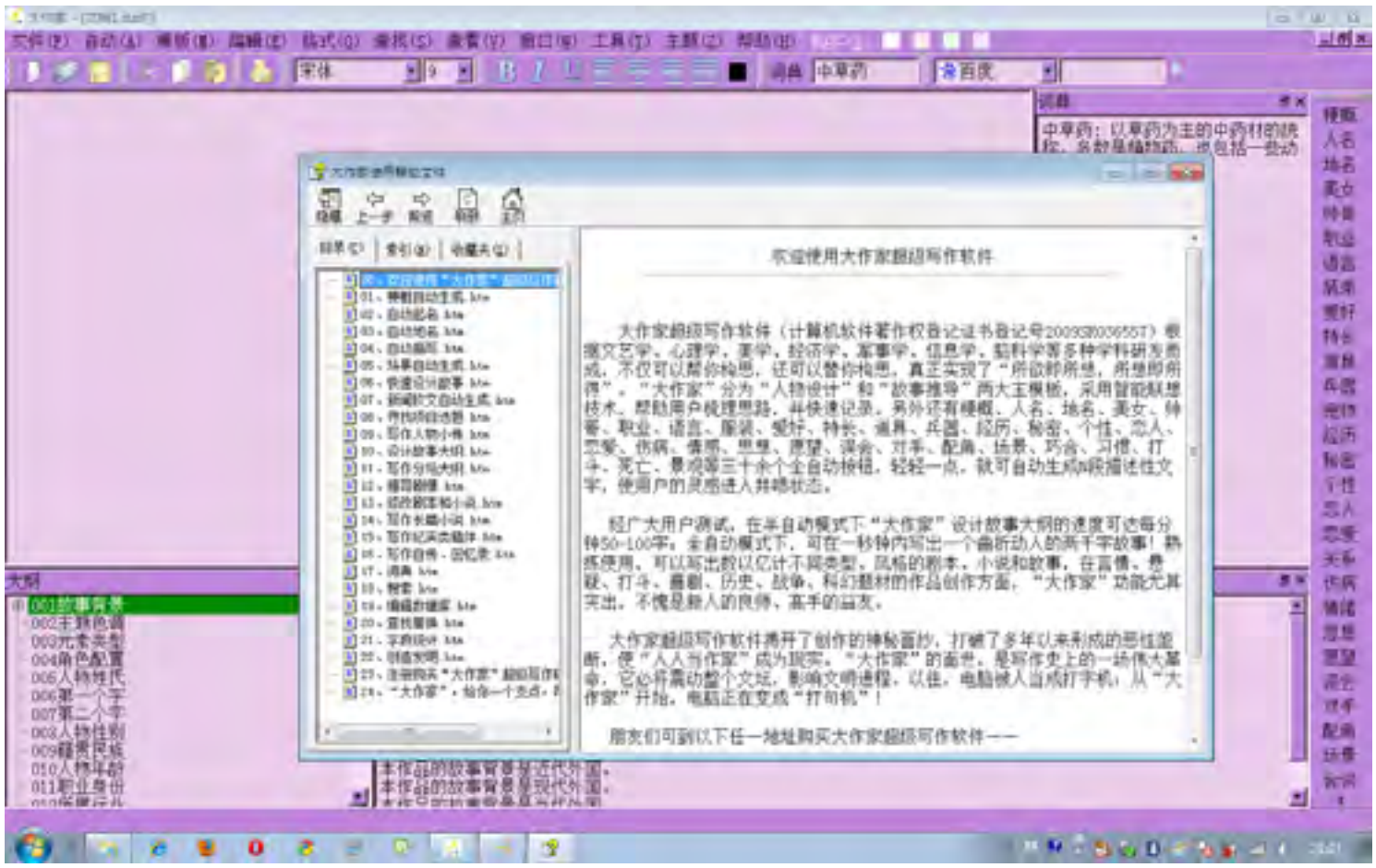
事物基于其本性而共同作用的内在过程。这一定义的背后有两层对道家思想的解读：首先，道家思想可以被看作为一种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其次，这一过程性体现在它能够游移于物理（physics）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之间。由于篇幅所限和相关性原由，本篇文章不再一一展开这些解读与其中的逐步论证过程，本文在此意欲强调的则是，基于这种技术过程的自动化思想具有形式性和过程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体现则植根于自动化思想的形式推理机制当中。

自动绘画的过程实际上蕴含了一种将二维图像解构为单维度线性结构的抽象机制，而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则将抽象机制演进为了一种对概念的计算，使其自身成为了零维度的技术图像。这些形式性推理都指涉了新型想象的生成。而在数码与计算机科技条件下，形式性推理又具有哪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又如何生成想象，从而促使自动化思想的运作？

抽象与关联：形式性推理如何生成想象

本文将展示和思考的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于自动书写软件。它直观地通过抽象和关联这两种形式性推理机制来运作，生成着一种基于软件运作机制并且囊括用户经验互动的自动化思想。“大作家”自动书写软件（见图五）可以自动生成多种体裁的网络文学。本文并非将自动化思想视为机械性生产，即将自动书写软件视为一种生产特定文学或书写体裁（如网络连载文学、影视化剧本或新闻软文等）的工具，并定义这些体裁在文学评论与读者反馈之中缺乏文学质素——这样的机械性生产同时也是在印证一种文本服务于生产技术图像、技术图像服务于复制目的的论点；本文也并非试图分析该软件作为一款商业性软件在网络文学工业化进程中的宏观或微观权力关系。本文意在争辩的是一种能够生成形式美学的自动化思维过程，而这种形式美学调节着想象力的实现。

■ 来稿



图五 “大作家”自动书写软件界面截图

通过具体而微地设置虚构类作品的文本类别，诸如人物个性、地点、名称、人物职业、习惯、生活经历、人际关系、思维想法、愿望、误解、场景等，“大作家”自动书写软件可以帮助用户自动生成小说内容与叙事。这些超过三十余种的类别和九个基本叙事模板（如科幻小说、爱情、复仇、武侠故事等），可以生成完整的故事线以及各个章节的具体内容。

这些类别的设置实际上强调的并非内容本身，而是内容数据的不同元素之间的关联性（correlation）。换句话说，类别设置通过创造形式来构成内容：软件中的内容由数据事实组成，数据事实指的是软件数据和基于数据生成的概念类别。第一层形式性推理的功能在于解决如何根据现有用户想法和 / 或用户对数据的感知来进行数据规划的问题，如挑选基础数据并对概念类别进行关联设计，从而表达最初想法和 / 或初步感知。根据现有数据和概念类别，第二层形式性推理通过关联使得数据具象化，如构成叙事段落与情节。通过抽象与关联这两个机制的双重运作，这一过程具有迭代出更多想象的可能性，比如在已有人物关系和情

节基础上通过引入其他变量（如误解、愿望等冲突场景设置等）对叙事进行转向等操作。这里值得区分的是，这一过程实际上展示了对于一种傅拉瑟意义上的纯粹美学的互动游戏，即想象从最初的用户主体中脱离，进入了一种计算式的自动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不同于带有目的性地创作，比如网络文学的连载根据实时阅读流量来有意识地调整故事冲突和走向。当想象进入计算过程，这一美学兼容着机器性推理与感知经验，它的形式性体现于自动化思想当中，即机器性推理与感知经验共同朝向一种技术过程的运作。

结语：一种数字性书写

媒介学者傅拉瑟指出，通过文本与传统图像之间的抽象机制而演进的一种技术图像生成了一种基于纯粹计算的新式想象。在这一演进中，抽象机制通过层层递进构成了一种形式推理的机制。这种推理促成想象在其机制中生成，而此过程则包含了一种自动化思想。自动化思想并非产生于数码、计算机和自动化科技条件下，从超现实主义到遵循模拟法则的现代电影制作，都呈现出不同推理机制运作下的自动化思想，而这种思想的自动性体现在实现计算的过程中。数码和计算机科技的机理则将推理机制带向更高层级的抽象，如自动书写软件如何生成想象。这些不同模态的自动化思想都践行着一种形式美学，即机器性推理与感知经验共同朝向着一种技术过程。

在本文的论证行将结束之时，值得提及和澄清的是，一种数字性（digitality）贯穿了本文的思考与论证。这里的数字性所指的并非仅仅是一种离散的、非连续性的、有限的数字形式，更是一种将计算引入的数字化过程。后数字美学（post-digital aesthetics）[9] 触及了本文所要强调的数字性，

9 *Florian Cramer. What Is "Post-Digital"?* [C]. David M. Berry, Michael Diete. Postdigital Aesthetics: Art, Computation and Design. 纽约 :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第 12-26 页。

但仅止于形式层面，而非渗透入本体实质层面。本文所强调的这种形式和本体层面的数字性融合于自动化思想的形式性推理中，即不同推理机制展示了数字化过程和形式。在这其中，书写作为一种形式性推理，具有贯穿不同文本与图像、展示层层抽象机制和转化想象的能力，而它的数字性则展现于一种物质性语言和自动化思想在书写过程中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文本结构与过程当中。这一过程当然是在践行一种形式美学，同时也值得今后的研究朝向分析一种如何生成创造性的数字技术机制。

校园仪式的模式与功能：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季[1]

——文化研究课堂讨论记录

一、“历史化”一下：这个事儿过去在国内校园没有，现在有了

王敦：先做开场白。我选这样一个题目来讨论，是觉得校园仪式这个事情是在中国这十多年才出现的一个好玩儿的东西。它的功能挺有意思，让大家在大学四年当中，能够一直觉得过得还挺好，最后觉得上完这四年还是值得的。比起没有这些仪式来，有这些仪式会让你的心情舒服得多，甚至还会让你魂牵梦系，对于母校的不好的记忆都会忘掉，剩下的都是一些美好。我觉得这既是自发或自为的与国际接轨，也是挺高明的中国特色式的发明，里面有很多名堂值得探讨。

让我先来从个人角度说一下如何发现了这个事儿的重要。我 90 年代上大学，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校园仪式。那个时候的大学相当于是一所社会主义大学，商品性、包装性、以及现在的这种文化附加的表演性和仪式性都不是很强。上大学也就是上四年，然后走人。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仪式性呢？我 91 年至 95 年在北京大学上本科，那个时段当中有邓小平南巡，毕业包分配这个事情虽逐步取消，但我感觉毕业之后个人还是有“销路”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宝洁、联合利华等外企来招人，虽然很热，但是如果你不参加这些轰轰烈烈的风光事儿，也总是有单位会要你，你也总是有工作可以去做的。留京与不留京的差别与今天

1　编者注：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 2015 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讨论课记录。该讨论课上课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00-11:30，地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四 4206。授课教师为文学院副教授王敦，课程参与者除了 2015 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外，还有部分旁听同学。该讨论由参与课程的同学轮流记录并由王敦老师进行了最终的编辑和整理。

的意义不同。因为那时候留京，对不少人来说，当然觉得更好一些，但不留也不是说就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了。

总之我感觉那个时候不需要校园仪式这样一个东西。就好像说现在商品需要广告，说“不是所有的牛奶都是特仑苏”，言外之意是说如果你不喝这个牛奶你就可能被毒死，因为有毒的奶太多了。也就是说，虽然广告里面的东西不可信，但如果连广告钱都出不起的东西就更不可信。而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不必为自己做广告，不需要广告，没有包装，你上完了大学，安安稳稳工作就行。因此，也就没有对仪式的功能的迫切需求。没有什么毕业照，没有穿学士服、扔帽子，没有在大礼堂里面搞煽情的音乐，也没有开学以后各个社团机构搞“百团大战”。我上大学还是挺散漫的，自生自灭，毕业之后基本上都有工作。当时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在央企混了五年半以后，我就出国留学了。这个也值得说说。出国以后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校园仪式还是蛮多的。自 2001 年出国至 2008 年，我在国外待了 7 年多，感觉二零零几年的美国大学与我所上的 90 年代中国大学不同。毕业在美国大学变成了个很煽情的事情。另外一个仪式感特别强的就是体育。特别是美式足球。我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每年有个“Big Game”球赛，这个事情都是自发的传统事件，一年一度，像原始部落一样的一种激情，是一种宣泄。有我们自己的乐队在校园和伯克利的地盘招摇过市，还包括山顶上还要放老式大炮，只要伯克利一进球就会放炮。比赛之前会有动员，会有人穿着我校吉祥物“Oski Bear”的我校熊衣，要砍掉、烧掉象征斯坦福的那棵树……还有很大岁数的校友带着孙子或孙女，穿着学校的衣服过来。这个 UC Berkeley 品牌就变成了一种百年老店的感觉，全方位的，从情感、品味，到商业。还有毕业演讲，他们会请一些达官显贵或者说是成功人士做这种东西，给人留下的印象还颇为深刻。因此，会吸引一些人过来就读。比如当时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就就读于法学院。

毕业后回国，当时我对国内并不了解。当时就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09

年就赶上了毕业季，然后便看到中国的毕业和国外已经很像了，家长都要来。几年后，中山大学在网络上，被看哈利波特长大的一代大学生，授予了“魔法学校”的美名，因为在中山大学毕业典礼仪式上，校长要拿着一个能发光的权杖，在一个叫“梁球琚堂”的大礼堂里面走一个仪式。还有我在美国看到的那种，叫做“教师团”——穿上博士袍服冠冕，坐在台上……每个毕业生还要和校长握手，甚至还要拥抱……这些东西在中国也都有了。

我回国之后，在中国待的时间足够长了之后，发现中国的仪式还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做戏的成分与国外似乎又还有些不同。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戏？好像除了商业和大学要维系自己的品牌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就业形势以及进入大学之后整个社会空气的压力，使得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有一些想法……各种因素使得校园仪式具有意识形态化和“维稳”的意味在其中。

我们的讨论也不排除非官方的各种仪式，如各种社团以及同学们自发形成的男生节、女生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的活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们以冷静、客观的分析为主，来把校园仪式问题认真说一下。

杨安红：您上本科时候，社会的流动性还没有那么强，个人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因此，你并不需要特别抓住什么。但是像今天，有很强的漂浮不定的感觉。流动性的增强使得你总是想抓住什么东西。比如说，大家都说你从开学到毕业的变化会很大。很多人在开学的时候就有那种需求，想定格或者铭记什么时刻。在这个时候他就想产生一个仪式来把这些事情突出出来，就是一些你自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关键时刻的你自己。

王敦：确实和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大学同学里面普遍的家庭背景和收入情况比现在要低些。那个时候大学更平民化。农民、工人以及从边远地区来的学生比例比现在多。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不安全感，好像来了以后就特别安全。像我这样从大城市来的学生以及那些从偏远

地区过来的学生都有同样的安全感，觉得特别幸运。就好像今天，你进入了一个长期的高端“会所”，但没有花钱，感觉是不是跟白捡的一样？在本质上，每天不学习也行，整天玩，反正四年过后不会太次，即使回到省里也会出人头地。要不怎么会说，北大学生卖猪肉，在那个年头儿，就会成为巨大的新闻呢。可能有些偏远地区来的学生会觉得在生活方式上反差很大，但也仅仅如此了。他也只是想在大学四年尽量爽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有“追求”的话。

杨安红：就我个人体验来说，以前上中学时，他们给你塑造了神话，说上了大学就会和高中不一样，你内心也会有很多期待。因此，你想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王敦：这个挺有意思。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要特别记录什么。另一方面是媒介成本也不一样。现在留个念，是零成本，因为有不要钱的互联网和手机自拍这样一些廉价技术在起作用。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柯达胶卷、乐凯胶卷都挺贵的，有照相机的同学不多，所以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是否值得拍照留念。就是说可能会去香山拍集体照或私人照，仅此而已。不会把这些感情、胶卷浪费在现在这种随时随地的拍照之中。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和 SNS，就算你把自己的感情写在日记本里，你也不可能去发状态，别人也不会看到，同理，你也看不到别人的状态。所以大家没有在意每一个个体心灵是怎么想的。这种心理暗示也特别少。就像我在前面说到的，觉得你上了北大不就挺好的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就可以玩了，不会去想那么多。看来我和你上大学的时代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杨安红：前几年总流行一句话：生活不能没有仪式感。我感觉可能不仅是校园的学生，很多人都在有意识地去寻找某种仪式感。这样一种仪式感究竟是什么呢？提到仪式大家还会想到神圣，或者说背后还有一种认同感，等等。

王敦：现在不光大学，连中小学都会有。

杨安红：对，就像走红毯这些都来了。

二、品牌的塑造 vs. 身份的通关？

王敦：对，我想大家都已经有了一种品牌意识。就比如说你要上川大，立刻就会被川大百年历史所震撼。因为现在好像是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他们为了抢生源，搞“品牌”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抢生源是不是有一些利益在里面。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回事。但现在为了抢生源，就要营造品牌。

杨安红：因为品牌背后意味着资源。它可能是为了塑造一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品牌的强弱，意味着拿到的各种资源也会不一样。

王敦：所以，作为教育品牌的学校，它已经给你排定了一个作为学生你需要缅怀，需要崇敬，最后需要感激它的这样一种角色。因此，你只需要去充当这个角色就可以了。

杨安红：并且它越来越强化，你从哪个学校出来，你身上就会带有某种属性、标签、特色。

王敦：所以这个跟国外确实有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国外的大学也强调这种品牌。但是另一方面，有人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教育部大学”。其本身都没有任何区别，但表面上还要搞出这些花里胡哨的区别，所以比较奇怪。在美国每一个大学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伯克利的时候，我作为研究生兼助教，我穿个短裤、人字拖，把 U 盘挂在脖子上，坐在桌子上讲课就可以了。学生可以很惬意地半躺在楼道里面看书。但是到了南加州大学，就是侯佩岑留学的那个学校，他们的老师上课就要求打着领带……，总之，不太一样。就在一个学校中，商学院和其他的学院又不一样。在国内，不管

我们国家多么辽阔，从来没有见过不同的大学的差别可以大到一个可以穿人字拖，另一个得打领带。其实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有的大学都是由科研处、教务处……加上教辅和院系组成的官僚系统。在做事的方法上没有任何区别，对不对？宿舍也都是一样。

程禹嘉：我觉得，讲品牌打造，是从学校与学校之间横向来讲的功能角度来说的。就学生个体来说，校园仪式，是一种对身份的定义。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类似于完成一个通关仪式。因为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找来了一本维克多 · 特纳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里面《阈限与结构》一章讲了一个“通过仪式”，我觉得“通关”一词更好。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份的转变，需要一个仪式给定义下来：开学典礼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份，进入新的状态，仪式的神圣感会帮助对象确认身份，更便于进入状态。毕业典礼，也是意味着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进入新的阶段，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或者是到研究生），这都是人的成长过程中身份的变化。

王敦：还要加上毕业旅行等等，才是全套。如果这些事情不搞就好像不完整。挺有意思。有些同学很苦恼，因为毕业前被国外学校录取，要签证等，同时还要毕业旅行、各种毕业拍照，每件事都不能耽误。

程禹嘉：总有说法“缺了 xxx 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仪式的缺失就会让人觉得身份没被定义到位。之前听一个心理老师的课，说人的心理需要“完形”。比如，告别时需要告别仪式，如果没有告别仪式，心里会有缺失，在后期的生活中会留下一些阴影。如果有告别会更有利于人身心的成长，对过去进行正式的告别，可以开始新的旅程。那位老师的比较专业且完整的表达，我不能完全复述到位，但“完形”的仪式在心理学上确实存在而且重要。

三、不安全感？焦虑？同病相怜？不舍？

王敦：现在的校园仪式里面还有一点，让我觉得震撼。在中山大学时，我曾经参加一些在多功能厅举办的毕业晚会，但后来就不去了，因为太悲凉。同学们会抱头痛哭，好像都很害怕进入社会，或面对后面的事情。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会让人停留在某些仪式，不肯往前走。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干，顾不上这些，自然就觉得都可以免掉了，因为下面还有更大的胜利嘛。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从西柏坡到北京，又往南京打，所以中央工委、前委都没工夫搞仪式啥的——淮海战役如此重要，马上要歼灭黄维黄伯韬兵团，傅作义马上投降，如何阻止天津陈长捷逃跑，很多事情对不对？如何多弄枪支弹药，多弄人来当兵，才是实质性的事情，所以他们一直到开国大典才举办仪式。相比之下，南京政府则在穷途末路前夜召开所谓“伪国大”。如果同学们对毕业没有信心，可能你就会愿意搞仪式。也如同 97 香港回归的中英交接吧。一方是主动开启新阶段，彭定康的港英政府则是无可奈何结束旧阶段。

杨安红：开国大典意味着主动进入新的阶段。毕业则意味对旧阶段的不舍。

王敦：毕业晚会绝对不是学校让搞的。老师们一般不会参加这个晚会，去了也是碍眼。学生们自己自发地抱成一团，满满的痛苦状。大家确实不想往前走，想停在这一刻。这跟我当年大学毕业，急切想开启新阶段的想法，确实是不一样的。

你们对未来的恐惧，不想往前走，是因为后面会有考公务员、买房、异地恋、结婚等等这些事情不想面对。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些问题。当然，我那个时候，毕业时也要感慨一番，有的要喝酒，还有的感慨“老子就是没留下北京啊”，“老子要滚回甘肃去了”，听起来很惨对不对，但其实

他回甘肃是去《读者》编辑部，当时《读者》正如日中天，他的人生其实是很美好的，但是说得很惨烈。还有的男生会说“哪个女生还没有追到手”，很不爽。他的不爽所包含的成分很简单，就是对这四年没有做成的事情的一种留恋。而没有牵涉到你们现在的，因为社会环境的问题，踟蹰不前、如履薄冰的感觉。

程禹嘉：您说的毕业的负面情绪，我感受很深。现在大学生毕业时，很明显会因为对未来的恐惧，压力过大，而不敢面对。我毕业时就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毕业前我即将去泰国，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内心很惶恐不安，那些天一跟同学说起要分别的话题，就会哭。事实上去了以后也远没有那么可怕，非常开心，但出发前总之是很担忧的。

王敦：你是怕泰国不好是吗？

程禹嘉：也不仅是这样。当时因为考研没成功，不很如意，也不知道以后这一年，甚至之后的几年，我会往哪儿走。不知道会一直在泰国，一直做汉语老师，还是会回来再走向别的地方，非常迷茫，完全没有方向，心里没谱。我想毕业时考研成功或者进入自己满意的单位的同学，他们的心态应该是不同的。

王敦：对，我看到保研成功的，或者出国拿到全奖的同学，他好像在毕业仪式中好像只是陪着玩，不给大家扫兴。

程禹嘉：而且就是越觉得前路未卜，恐慌，就越会觉得现状比较安稳，因此就越会对现在的情况表现出不舍。

王敦：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感觉就是，老子要开始赚钱了！而且就是说肯定会比父母赚得多，当时是那样一种状态。除非有一些是去国家单位的，去政府的，那时候还不叫公务员，他们那些人灰头土脸的，就真的觉得很惨。去新的央企集团特别是外企的那些人就会想着“老子去赚钱去了”，就是那种感觉。去年这个课上，我和你们的上一波的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说

道我在北大本科毕业时候，突然又下来 200 个留京指标，也就是在原有的留京指标之外追加的 200 个，是北京各个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这些区提供给北大毕业生的，那时候提出的条件就是去那些区做职员，那时候还没有考公务员这一概念。所以就有 200 人唉声叹气选择去了那几个区了，然后特别苦闷，整天就是喝酒消沉，一年之后绝大部分又都辞职了，就是那样一种状态。而且去央企的人也很后悔那时候没有去外企挣更多的钱，包括我自己。就是那样一种感觉。总之，毕业时候最消沉的就是说去各个区做公务员的这帮人。你想想，如果里面有些家伙当时在东城区从 1995 年熬到现在，20 年了，做官会做到怎样的气候了？所以说那时候的想法，和现在的社会之下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

四、表演性与自发性：中国特色、中国策略、中国方式

程禹嘉：如果说开学典礼，或者是入学典礼是有权力的规训，那我觉得毕业典礼也一样。学校毕业典礼中会说，从我们这个学校走出去，学校的这个标签会一辈子跟着你，这些都会在致辞里边说到。再比如说，“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

王敦：我插一句，那时你信这个话吗？

程禹嘉：嗯，我觉得不一定全信，但是会有一定的认同。

王敦：也就是说是有一定效果的是吧。你虽然看到母校里的一些很烂的情况，这些都见得多了，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那种场合你会比较容易相信那些好的方面，会觉得更中听。

程禹嘉：对对对，就是那种，那种仪式的魔性，我是这么觉得的。比如说，人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仪式上发言人就会对学生说要做“国民表率，社会栋梁”，而且还会说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出去以后不要给母校丢人，第二层就是以后发达了要回馈母校。

王敦：这和国外真的不太一样。确实，我国大学的官方校园仪式感，从大学生进来到毕业出去，都很偏重规训和心理暗示。我所熟悉的美国大学，则主要是从价值上，或者这么说，投入产出比上面来定位的。直白了说就是——家长说，老子花了几万美元，把孩子送到你这边去，看重的是你校的质量和名望，花了钱，就得值，就得在毕业的时候校方要请来什么名人说话，以此来证明“老子的钱花得值了”，而且孩子毕业以后他真地觉得这些都值了。把孩子送到你们这边上学，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花钱，我们是主顾，校方就要把事情给办好。中国的大学除了要规训和心理暗示，还要你膜拜。比如说北大，他们把蔡元培拿出来，或者中山大学把陈寅恪拿出来，你就没话说的了，只要是个正常人类自然就会崇拜这些东西吧，它没有说现在的腐败啊，或者官僚化的一些东西。

刘欣如：开学和毕业典礼，一般来说就是各个代表发言吧，颁发一些什么奖啊，握手之类的。有所谓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这算是学校的一个任务，你总得推选人出来，其次呢就是要看这些人的个性。请不同的老师和学生来发言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王敦：哈哈，对的。

肖婉琦：但是不排除有些发言是经过审核的，而且总是会有一些发言在网上走红，可能会冒出一些金句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做教师代表，你做学生代表，接到这个任务，那你要怎么操作，你说的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妥协呢还是更多的会带有个人的倾向和态度，作为一个代表你要说的话尺度在哪里，该说什么话，哪些话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王敦：代表和代表不一样，策略也不同。如果是学生，肯定就会说“尊敬的各位老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上学这段时间收获特别大，这种精神对我来说特别有启发，反正就是特别值，然后你们新来的人该怎么做，等等”。作为老师代表，画风可以差别很大，但共同点是都能够配合好，把这一出戏

演得有声有色。你们暨南大学的画风，肯定和中山大学又不一样。如果说是北京大学，那中文系可以随便挑，比如说陈平原，所有的高中生都知道陈平原是吧，陈平原开始讲，就是一种沉稳、隽永、渊博、绵密，还特别低调、谦虚的那样一种风格，或者北大可以找其他的大师，都可以。嗯，所以说，就是一种品牌，然后让这些初学者看到，我们这里人才济济，牛的很，从蔡元培，或者陈寅恪，根据各校传统，一直撸到当下。

肖婉琦：功能上还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对外的话就是品牌宣传，因为现在的舆论资讯流通非常方便，也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传播的。对内的话，确实是针对收进来的学生，或者说是让学生产生一种认同感。

五、“晚会”里面的校园生态与文化逻辑

宋雨霏：我想说一下晚会这种形式。在现在的学院的话我们做晚会比较少，但是在本科的时候这样的活动还是很多的。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说，一个是老师工作方面会有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源自学生有自发的展示自己的愿望，希望获得一个平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心态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说有些人从小有一些才艺，比如相声、乐器和唱歌等等，有一些喜欢表演的人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活动的安排也不一定就是强迫的，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做。如果是积极参与的人他会觉得对自己的形象、气质和活动能力，是一种锻炼和提升。从个人对集体的关系上来说，是个体对集体的贡献，这是很微妙的，不是说那种物质上的我为学校捐了多少钱，这样的具体的定额的东西。

王敦：你真是这样想？

宋雨霏：对。这种想法比较天真，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为了一个目标，通过很多筛选环节，来完成一个晚会。比如以班级为单位推送节目，然后大家再互相观摩，进行对比和淘汰，就像春晚选节目似的，这样也很有意

思的。每次进入下一轮筛选的时候，大部分的节目都会进行一个很大的改动，有很多进步。很多人在台上演节目的时候，还是很希望被选上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想法，就是比较纯真的，不会考虑到意识形态、各种利害关系之类的，学生就是学生，有自己的小心愿，就是齐心地做一个事情。

王敦：说的非常好，就是说规训是一种游戏，游戏需要人就范，就范之中取乐。但是跟国外不一样的是，国内这种校园演出文化的管理序列是很强势的，就是最先接触学生的是辅导员，再往上是团委，这样的一个架构。在国外的话，都是一些非行政化的团体在组织，很不一样。兄弟会、姐妹会、教会、社团都可以做这些。

宋雨霏：当你把节目选出来，比如说舞蹈，这个当然也有独舞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群舞、开场舞，需要 7、8 个人起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在长期的排练过程中就会形成特殊的感情。

王敦：你看不看美国的那种高中生、大学生电影？比如看到两个舞蹈队伍为了一个机会进行比拼，最后只能选一方的时候，你看这种电影的时候会有投入感吗？投入感大不大？

宋雨霏：还可以吧，毕竟电影中很多情节强调的是戏剧性，给人的感觉比较夸张，当然主要的情节设定还是有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

王敦：如果有投入感的话，不是在这个行政上面，而是在事情本身，你还是需要人来互相管和互相争，要抱成一个个“小团伙”，实质是一样。

宋雨霏：也不能说是“团伙”，我所经历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邪恶和复杂，就是大家参加活动多了的话，你在学校里面自己的存在感会更强一些，大家都会对你有了更多的了解。

王敦：绩点是不是也会跟随表现而改变？

宋雨霏：我们原来这个是与学习成绩分开的，但是也会影响到你综合的表现，比如评优评奖。

程禹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大家会挤很多的课余时间去排练，会有很多接触，这样也可能占据其他事情的时间。会投入很多心血，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付出了很多精力，自然会对这个事情越来越重视。在这过程中大家联系越来越密切，情感就会深，认识很多朋友，形成交际圈。

王敦：对，很有意思，在这个事情里边，你是很投入的。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时候，因为要指导一些学生的“百篇”，即一百篇日记，所以能得以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你就会看到，什么事情让他很爽，或者很委屈，比如耽误学习，抱怨评委不公，队友不给力，有人自私，不担当……等等。

还想到一点，就是斯皮瓦克说的，底层的人不能说话。但人总是要被尊重、表达和宣泄、倾诉，对不对？学校就要把这种能量疏导出去。既然年轻人荷尔蒙分泌旺盛，愿意蹦跳，那就组织和鼓励、疏导他们去蹦跳吧。学校也懒得去管，就将具体活动的组织形式交给基层的辅导员等人去筹备，总之是按照你们自己的方式去玩儿，如各种各样的风采大赛，评选明星呀，这个那个的。总之不要把能量引向其他一些方面，就好。于是，中秋搞了，Halloween 搞，Halloween 搞完了 Thanksgiving 又搞，Thanksgiving 搞完了 Christmas 又搞，然后新年又办，新年办过端午也要做，总是不停地在做这些。

反过来说，大家也把体制给玩儿了。在美国的话，兄弟会、姐妹会玩的也是这个东西嘛。还有教会，里面总有个 Youth Ministry，类似于我们的“团委”，就是一帮小青年儿在里面晃荡，弹吉他谈情说爱，但他们说他们在排节目，表达的是对耶稣的爱……这样的话，大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肖婉琦：功利的层面肯定也是不能少的，肯定会存在的。除了在学校能获得一些东西之外，因为我最近在找工作，觉得写在简历上面也会有一些亮点。至少，这些参与这些活动的经验，就能为你之后踏入社会做一些

训练和铺垫。你在这个活动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就能看出你的能力和你的性格。

杨安红：是各取所需吧。但是本科仍然有单纯的一面。比如我觉得这个小品很好玩，我就去看一看，管它有没有功利性，我就是来看小品的。

宋雨霏：需求确实是不一样。像原来本科的时候，我们学院里有广电编导专业，当时我们的晚会就会有很多学生来担任导演、编剧、剧务。当时我们特别专业或者可怕的一点就是，剧务更换台上道具的时候速度特别快、训练特别有素，灯一关就马上上去换道具，灯一亮就是下一个节目的背景摆设。等他们去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对口地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比如去电视台实习或就职，就需要做场务，但是到那时候大家对这些工作就会很熟悉了。

肖婉琦：各种活动分很多类，比如说青协组织的活动，去福利院、养老院的活动，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社团。要看你的取舍和爱好。

王敦：这就提醒我了，我观察到，大家毕业的时候除了与班级、老师告别聚餐，还会去社团聚会，一波一波的，最后搞得有的同学酒精过量，半夜送到医院打吊瓶去了。这些都能说明同学们在校园活动中是各取所需的，比如有的同学中学时候内向、沉默寡言，但是上了大学，突然之间就变得很活跃，开始跳舞、和同学一起跳舞，发现自己还挺有领导能力的；过去可能没法管理其他人，但是现在发现自己可以做到，变成一个“头儿”了。有的人上台表演，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天赋，但是一下子就发现了。还有追求学术的，去学术部。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手把手带出 08 和 09 级三个学生去美国的东亚系留学了，都是本科毕业拿全奖的。很有意思的是，09 级这两个人跟 08 级的那个师姐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这两个人先后去考中文系的学术部，都让这个师姐给淘汰了。她们后来回想这个事儿，当然是开玩笑说的，觉得很搞的。但是也说明了年轻人在甄别和筛选自家人的时候，标准是啥，本来就是挺“搞”的。

六、校区隔绝与性别失衡

王敦：接着刚才的话题，其实有两点。第一，分校区问题，导致在繁华城市的主校区与在相对荒凉偏僻的大学城、校区的分割。第二，局部的文化氛围失调问题。比如文科院系男生太少、女生太多，男生受到压抑，所有活动好像都变成女生的自嗨，男生较少得到自己的主体表达。

杨安红：男女比例失衡之后会带来话语权、说话方式、思维方式的较大差异。比如在文科院系，男生说话还是有很多的顾忌的，而在男生多的环境里说话可能会更加直接。女生多的环境里说话稍不注意就被批评“直男癌”。

王敦：现在所谓同学之间的说话，实际上往往指在社交网络上说话，在不太熟悉的男女同学之间，真正的面对面接触还比不上微信朋友圈以及过去的人人网上面互看状态。我原来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大家主要都在人人上说话，所以，如果男生不顾忌说话的话，可能会被女生“喷”，“名誉扫地”，不被原谅和认可。有可能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说过话，但是在人人网上，你的言论一出，所有人都会看到，就有可能会斗嘴。

王敦：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离广州有两个小时，所以完全是两个世界。老师上完课就走，顶多晚上住在招待所，和学生交流较少。所以学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活动特别频繁。各个院系的本科辅导员也就陪着大一大二的学生在那儿玩。于是他们在珠海校区的成长似乎停滞了。比如偶尔有个讲座的时候，他们会把教室用彩色气球装饰起来。其实这种做法是高中生那一套。但是珠海校区的学生见不到别的同龄大学生的进化，所以仍然停留在高中生那一套。

杨安红：我们在川大时候的新校区是有大三、大四、研究生和博士生的。

王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杨安红：但整体的氛围还是不一样的，老校区社会人员多一点，像一个大市场，新校区以前是封闭的，外来人员进不去。

王敦：你这说的还算好的，你不知道，中山大学处于偏僻的唐家湾的珠海校区，根本没有外人去。

肖婉琦：我在暨南大学本科阶段，在珠海的香洲校区待过两年。校园很小、很安静，跟广州完全不同，没什么人过去。上课就是老师比较累，师生交流多少这个也要看具体的个人（广州校区也有师生交流很少的情况出现）。我们当时是导师制，一个老师一届带一两个学生，大一大二和导师的确没什么交流。系里安排每学期开始和期中的时候会把老师送过来与学生交流，走了之后就没什么往来了。

王敦：香洲比唐家湾离广州市还要远半个小时呀。中山大学中文系将你说的这个见面制度搞得更制度化，不光是老师过去，还有学生过来。中文系每次要花好几万租大巴车将学生从珠海拉到广州，比如到五月花海的时候，就是学生在本部折腾一天：见导师、搞戏剧表演等一天的活动，傍晚再将学生送回珠海。就像是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这样的盛会一样，一年搞那么几次，到那个时候中文堂里到处都是珠海的学生过来，平时这些学生又被关在珠海见不到。珠海校区也有一些“土生的”成建制学院，就是从建制开始就一直在珠海的学院。本部在广州的学院，比如中文系，那就是大一大二在珠海。所以这就产生另一种校园文化的感觉。到毕业的时候又天衣无缝的形成粘合，学生们还要缅怀珠海，一个班的学生跑去珠海校区的运动场、食堂、隐湖、岁月湖拍毕业照，在官网上还会放出这些照片，表明“我们”在珠海待过，存在过，图文并茂，配着音乐，将它整合入美好的回忆。

杨安红：我们那儿有三个校区，华西校区全是医学院，我们一般去华西也只是找朋友玩儿，并不在那里学习生活，但是毕业的时候也会去三个校区缅怀一下，拍毕业照，但其实内心里是知道华西校区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

的，其实就像是另一个学校一样。

王敦：中山大学的校区情况非常复杂。中山大学还有一个大学城校区，理科生居多，有一些学院就在大学城。整个大学就相当于罗马帝国，广州主校区就是“罗马”，触角伸得很远，有相互穿梭往来的交通线，人、物和知识进行着流动，比如白天要把教马列和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和社会主义原理都送过去，晚上再回来。我们这些教专业课的也是这样。有的学生是为了听讲座穿梭，有的学生是和理科生谈恋爱要往返大学城。就好像这是古代的地中海沿岸，有着许多远隔着荒蛮之地的居民点的帝国。于是就产生“罗马大道”把那些具备文明火种的定居点儿给连接起来，外面就是荒蛮，是这样一种感觉。

肖婉琦：学习资源的差别也太大。其中一个是图书馆，分校区的图书馆的书没有那么多，不如本部。另一个就是讲座确实比较少，大一大二处于求知若渴阶段，挺喜欢听一些讲座，但是就是没有这些资源。

王敦：对，所以本科生一般在一个校区就会自己玩儿，却玩儿不出很“高明”的东西。

杨安红：国外也有很多类似于分校的校区，他们每个地方都很健全吗？

王敦：我不能说全盘了解，但我所在的加大，以及我混迹过的南加大，以及东海岸几个名校，是比较健全的。国外的“分校”，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等所组成的加州大学，实际上相当于“美利坚合众国”，就是每个学校都有独自的历史，开始的设施就比较齐全，然后走到一起，冠以一个名号，并不是从一个“主校”辐射出去的。

肖婉琦：资源问题其实有“小”和“大”两个层面。小是小到分校和本部的关系，大一点就和整个的高校生态布局相关。比如北京海淀区高校十分密集，相比之下，珠海则只有积攒一些大学分校、校区的命了。从这个方面来看，资源的问题涉及到大的方面，不是我们所能去控制的。

王敦：你说的对，资源的利用是一个问题，资源的配置是另外一个问题。从一个资源配置层面上来说，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珠海，珠海其实生活水平和风景，硬件设施是非常好的，并不是说它“low”，但是几乎见不到人，见不到外界信息；另外一个比如说五道口。如果一个珠海的同学到五道口，就会比较崩溃，因为信息量太多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五道口有多好，而是说各种信息比较多。

宋雨霏：不用说五道口和珠海，就是北京“上地”那边的学生过来这边也是很受冲击。中央财经在那边有分校区，生活、资源就比较少。他们周围没有像咱们这边比较健全的生活配套设施，购物中心、电影院这些也相对较少。

王敦：对、购物中心、电影院、骗子公司、咖啡馆、书店、讲座，还有一些学生社团，这是一个系列。

宋雨霏：如果你的周围全都是理工科的学校，而你是文科学校，那么不管是学习还是讲座资源，就会比较少。如果周围都是一些文科学校，那么相对来说，专业相同的地方比较多，就可能会相互之间分享学术资源的机会多一些。

王敦：记得你以前说，山东师范大学是在山上还是在哪里？

宋雨霏：就是在济南一个很远的区。坐公交车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到济南。我们的学校类似于就在一个山上，住宿楼是沿着山往上建的。

王敦：本科四年都在那边吗？

宋雨霏：对。所以挺闭塞的。不光是周围的一些生活设施。老师他们每天早上要五点多或者六点就要赶到本部去坐车，然后在八点之前就要坐校车到我们楼下，八点钟就要准时上课。虽然最高楼层只有五六层，但是对于老师而言，岁数大了爬楼还是比较消耗体力的，因为没有电梯。而且，我们的

教学楼构造，每个都像明德楼那样，是回形的楼，所以就很难找，有些老师需要找很大一圈才能够找到上课的教室。而十一点半下课以后，还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回家，回家之后可能就会到一两点。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就比较少。老师的办公室并不在分校区，而是在本部，

王敦：我明白，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也是如此。你每次到了之后首先要买回去的班车票，而且比较惨的是，如果赶到“五一”“十一”放假的时候，学生赶着出去玩，所以就会先把班车票买了，老师就会买不到。因为晚上六点到九点的课，但是班车是九点二十就开，学生如果问问题，你就会听到外边班车发动，然后就需要快速的跑过去才能赶上。因为到了广州都半夜十一点半了，经常有人在车上睡觉，还有人在晕车、呕吐。中间车停了在加油站的厕所，会有人突然醒过来问“这是到中大了吧？”——全车人都忍不住爆笑。

宋雨霏：而且我们接触社会实践的方面条件比较少，因为位置比较偏远，而且荒凉。

王敦：也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文院系，中文系被放在分校区，那么本部都有什么院系呢？

宋雨霏：本部有艺术学、化学、生物学、化工，还有研究生。就是艺术类的学科比较多，而大部分学院都是在分校区。

王敦：那人文氛围怎么样？如果把文史哲从本部拿走，就没什么人文氛围了。

宋雨霏：老校区和分校区环境是不一样的。老校区有个楼是梁思成设计的，相对而言，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历史环境氛围比较浓郁。

王敦：你们是齐鲁大学的旧址还是？

宋雨霏：我不太清楚。但是聊城大学是从我们学校分出去的，就相当于在聊城的另一个校区，但是后来自己独立出来了。

七、抵抗、就范，与主体性空间

程禹嘉：我觉得毕业典礼除了悲哀的氛围和对未来的惶恐之外，还有一种抵抗的姿态吧。

王敦：什么抵抗的姿态？说一说。

程禹嘉：就是觉得年轻人觉得自己是有个性的，是与成年人的世界不同的。

王敦：哦，也就是拒绝成长，彰显自己的主体性。

程禹嘉：像我们毕业仪式有喝酒、熬夜等行为，这些行为不遵守规则，各种闹腾，也就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去宣泄自己的情感。

王敦：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学校就会搞更为煽情的形式，比如学位授予仪式，校友缅怀仪式，让你记住母校。

杨安红：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不是毕业最触动的时候吧。我感觉就是可能会在你心里起一些反映，但不是你最难忘的。

宋雨霏：我觉得最难受的是喧嚣过去之后，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比如说收拾晚会的道具，大家都散了，只剩下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就会更不一样了。

王敦：还有宿舍最后要清场，一个个把舍友送走。

宋雨霏：其实这些也是一种仪式吧。虽然不是正式的仪式，但是是一些变相的仪式。打扫、收拾整理、送别这些都是一些变样的仪式。

王敦：在毕业之前几个月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处于倦怠的状态，还在写毕业论文。写完论文的时候都还没有真正感受到毕业的来临。时间的指针不是在你内心里面自然流动的，而是如同出生、死亡一样是“给定”的介入

性时间点，具体到某些毕业步骤上面，比如答辩结束，学院开会说关于户口转出问题等。这些时间表是被量化出来了，大家才真正感受到要毕业了。然后穿着学位服的人开始拍照，社交网站上关于毕业的话题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要毕业了。

杨安红：但是关于毕业，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早已经开始想着要做些什么。比如很多人都会想，在我答辩之后，入职之前，找哪些人聚餐，去哪里旅行。

王敦：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学弟学妹先围观毕业，然后就会说明年毕业要穿什么照毕业照等等诸如此类的规划。

程禹嘉：我发现有个变化，我不知道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不同，还是时间的变化。以前我们本科的时候，网上的很多毕业照都是搞怪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俗。但是去年上半年师兄师姐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很正式，都是拿着一束鲜花，很亲密的合照，有些更像电视里面的感觉。

王敦：对，这个对我也很震撼。我到人大之后，突然发现毕业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程禹嘉：我不知道是人大和北京学校的特点，还是时间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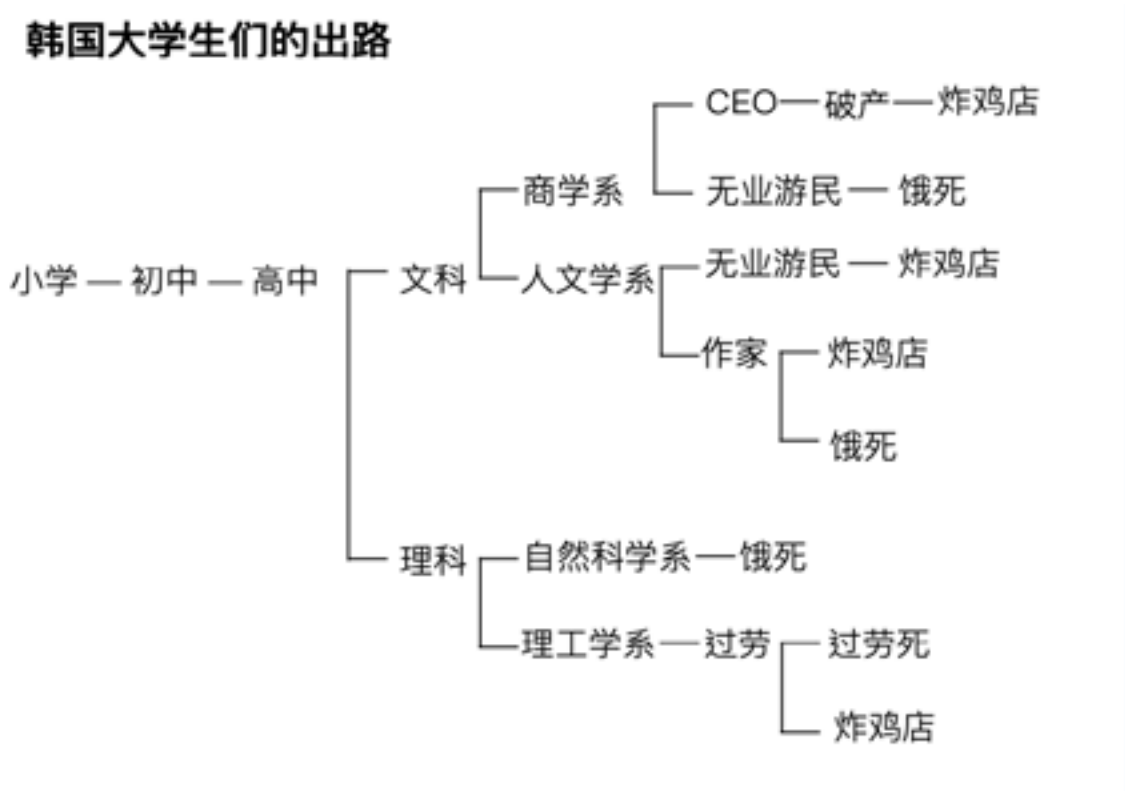
王敦：这个我也不清楚，不像南方学校的学生那么敢放得开。山高皇帝远嘛。

返回目录

带着社会学视角的人生漫游笔记

小乖 *

有一次我跟韩国友人一起吃炸鸡时开玩笑说：“我们大学生工作不如意或是失业了，都说要去卖鸡排。”朋友马上拿出手机点了几下，找出这张图说：“我们韩国大学生则是想卖炸鸡”。我看到这张“韩国大学生出路图”忍不住笑了出来。



虽然现在看这张图觉得有趣，但是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可是相当焦虑呢，经常心想就读人文学科的我“毕业后可以做什么？”

* 小乖，台湾，青春时期在草根社与社发所度过人生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希望以韩语为媒介，更贴近与认识韩国。可爱的狗狗与微酒精是目前人生重要的动力来源。

我出生于公务员家庭，家境算稳定。但不知为何，我高三时除了烦恼如何考上好大学外，已经开始忧虑念什么科系比较好找工作。理科我不在行，文科我扣除掉无法想像可以从事何种工作的科系后，选择了算是有兴趣，又有明确职涯目标的新闻系。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学生报社团，也参加了一个关心社会底层与问题、名为“草根社”的社团。现在回想，参加草根社决定了我日后的思想启蒙与人生方向，也让我大学毕业后选择投考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而非就读新闻所。

研究所就读期间，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上的学习，也与志同道合的好同学们一同参与社会行动，这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同时我也很幸运地得到了在独立媒体实习采访的机会，采访过都市原住民反迫迁、劳动者投票罢工等议题。虽然一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我仍有着就业的焦虑。在修完学分后，刚好遇到知名报社的公开招考，我碰运气试试看竟然考上了。于是在论文卡关的同时，我暂时休学，投入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拿到第一份工作那一刻，心里终于踏实起来。我被分派的路线是财经线，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想透过这个工作，看看以往从没接触、所学批判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貌。在那里，我开始学习透过数字解读这个企业或金融市场的成长衰败。也因为是第一份工作，我模仿着身旁前辈的模样(现在想想似乎是刻板印象): 戴上隐形眼镜、穿上较为正式的衣服，与人互动要自信且落落大方，不要显露出自己的年轻或不懂等等。那时经常出入在饭店举办的企业记者会，也初次与业者到越南考察招商环境，听他们抱怨越南工人会在厕所写字传递集体罢工的讯息。

这份工作有许多诱惑。例如那个专营国外各大赌场机台的经理邀我独家专访，我的学长前辈希望我多写某企业前景看好，我猜他们是想透

过释出消息影响股价。或者那位与我同行采访的记者访完后，直接问业者能否买该公司的未上市股票。那些所见所闻虽然与我所学的价值观不同，但除了无法做到“为新闻而不择手段”外，我没有太多矛盾或挣扎的想法，仿佛进入田野般好奇地看一切，也还好有以前做田野的经历，我大概知道如何与主管、同辈与受访者们相处（这应该是所谓“社会化”的能力吧），不需要浮夸的长袖善舞，诚恳、心存善念与一定程度的自我保护，大部分可以让对方也同样善意待你。

一年后我为了我完成论文而离职，那时我想有这样一年的工作经历，再找新闻相关的工作应该不难，但是距离完成论文的期限将近，若放弃了，我应该不太有机会重新拿学位因而遗憾终生，所以选择辞职。

完成论文后，我很幸运地到有进步色彩的专业教育报社工作，在这里接触的议题与人们都是我熟悉的。虽然还是有许多不足，但这里比起第一份财经记者的工作比较快上手，而以前在研究所的所学基础也帮助我较容易抓到问题点，问出好问题。我学到与财经媒体不一样的新闻视角。以前多半采访政府官员或企业家谈经济趋势变化，如今是尽可能到第一线现场接触人们或组织者，了解在教育领域或社会运动现场正在发生的现况，例如在重大风灾过后，到灾区学校采访师生处境等等。这里的报社主管没有架子，就像亲切的前辈般可以讨论新闻角度，追求好新闻但不迷信独家或哗众取宠的新闻点，我学习到许多。

偶然间，有机会转职到政府部门的公关机构，我想在新的环境试试看，也想认识到国会是如何运作，因而转换跑道。后来我才理解为何公务员总被批评没有创造性、只会“依法行政”。在当前的选举文化与人治色彩下，要做出超乎现行框架的事情有太多困难，公文上一个个的章都是需要扛责任的凭据，“多做”只会有“多错”的风险。

而且每当更换新主管，有时候得重新适应新主管的新作风。例如有主管很重视政绩被“看见”，公务员必须定期办记者会与大型活动，甚至规划拍部好看的短片，更别说平日还得照做例行公事。因此有时应该是下班时间的夜晚，抬头看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许多办公室的灯都是亮的，有些人可能这时候才能开始“做正事”。他们很常被指责故步自封，但我可以同情性地看见他们在这结构中不得不然的局限。

人生突然间转了个大弯。几年后，我辞掉工作与当时的韩国男朋友一起到韩国。一方面因为工作几年想休息，另一方面也很想体验在异国生活，很想贴近地认识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接着我也转换了身份，当时还开玩笑地对着主要研究外籍配偶议题的社发所夏晓鹃老师说：“我变成了你的研究对象！”

我到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上着专为协助外籍配偶适应韩国生活的免费韩文课，越南同学总是背着还不太会走路的可爱娃娃一起上课。我第一次体会原来全勤上课是多么不容易，同学偶尔会因为孩子生病或是必须准备祭祀而缺课。我的韩文教科书内容围绕着照顾先生、孩子、婆婆，或者学习韩国祭祀文化以及如何垃圾分类等。因为这些内容，我刚开始上得很闷，女性韩国友人看了书还会突然生气，因为她的母亲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而过得很辛苦。

部分同学嫁来韩国后多少有些后悔与辛苦，例如与韩国婆婆有矛盾、先生扣住存折不希望有自己的存款，怕孩子在学校受歧视而努力取得韩国国籍并改韩文名字，带着女儿回到好几年无法回去的娘家乡下，孩子看到自由走动的猫狗羊群在路边大便而吓哭，也有孩子嫌弃妈妈的家乡有种难闻的气味。我的许多同学努力学韩文与职业试探课程，希望等到孩子长大一点可以出去工作，期待有朝一日不再依赖不太可靠的另一半。这一次，我从观察她们的过程中看到了我自己的困

境，我在异乡也有类似的心情与孤独。

为了克服自己在异乡生活的困境与培养独立的能力，在政府的免费课程以及韩国朋友的协助下，我尽可能加强语言能力，参加了女性就业辅导班，在课余时间也初次担任中文家教。我慢慢有了目标：我想要努力学韩文，达到语言门槛后接着上进阶的口译与笔译班。我希望有机会从事翻译工作，成为一个窗口，引介有意思的韩文书。我还有个愿望是希望到多元文化家庭中心担任中文翻译老师，可以协助跟自己有同样处境的朋友，一同成长。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再精进教中文的专业知识，我在一边教中文、一边学韩文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语言的共通性关键，以及同时体验做为教 / 学语言的老师与学生两者的心境，非常有趣的历程。

去年底的我还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之际，突然间因为另一半来台湾工作，我也匆忙地收拾行囊回家乡了。从春天开始，我在工会开始新的工作至今，好像是绕了一大圈终于回来的感觉。劳动议题是我从大学社团一直关注的面向，社发所论文也是写同样主题。我在工会同时协助文宣工作， 这是以前担任记者时期所熟悉的领域。现在的我，在一边熟悉日常工作之余，期盼未来能有多一些时间发展我在韩国期间的兴趣：精进韩文与学习华语教学。

这一路的转折似乎是许多偶然的组成，但又仿佛是必然历经的过程。我带着大学期间学得文字能力的基础功，参与草根社以及就读社发所则奠定了我的待人处事的方式与价值观，在一次次人生的重大抉择与职涯转换时，就像是无形的指南针般隐约地为我指引着方向而不至于迷失。即使碰到困难，也能比较看清问题的结构以及自己处于何种位置，而不至于沦为个人命运注定论的自怨自哀。

返回目录

如果可以重新回到 20 岁，我很想告诉那时的我不用焦虑“念这科系未来可以做什么？”因为还未踏出校园，这只是瞎子摸象般的无谓烦恼。如果可以的话，尝试各种可能性找到自己兴趣与擅长的方向，即使后来发现不喜欢，至少也可以把这件事在人生选单上划掉，也是个收获。这些所有的尝试都是好的累积，不会白走，未来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现在的我还是会在每个人生转折时焦虑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是比起茫然的学生时期，我更清楚自己喜欢与适合做什么，或者在这基础之上想尝试什么新挑战。我将继续带着社会学视野，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旅程。

返回目录

这么远，那么近

尹舒慧 *

1、身处其中：逐渐丰满的现实

离开学校一年了，校园生活似在昨日，又好似非常遥远。工作这一年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中或困难或琐碎的任务外，更多时候是一个重新面对自己的过程。

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我要重新面对自己生活与学习的能力。离开学校后，并不意味着学习过程的停止，反而是工作上的任务扑面而来。比起学生期间，背着书包去图书馆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后很多东西都是边学边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反思自己以前在学习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有些“撒娇”的成分，拖延的阅读计划，拖延的文章，屡次拖后的deadline。

在这份工作之前，自己仅有过一次实习经验，因此对于工作的认识可以说少的可怜。尽管曾经在系里的读书会上读过一组与“工作”相关的文章及著作，从理论上了解了“工作”“休闲”“闲暇”等概念，也尝试着了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去构想未来工作可能的形式以及对人的意义，但终究觉得缺了点什么，讨论的时候底气并不那么足。

有一段时间，我对主流宣传的工作方法，例如时间管理，身体管理，情绪管理，外表管理等等，习惯性地抱有一些抵抗的情绪。内心觉得那些

* 尹舒慧，上海大学 2015 级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现为图书编辑。

管理方式是将人变成工具的过程，我们调整自身是为了融合一套被人规定出来的价值，而每一套管理说辞的背后都有可能是一套逻辑完整的营销术。

但真正进入工作的情境之后，发觉自己对于工作的理解的确有着隔靴搔痒之感。想起自己当时的毕业论文，在第二章讨论了社交媒介模糊了个人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当时在写论文时，觉得三章中最薄弱的便是这一章的论述。回想起来，这大概因为缺了一份作为中介的身体经验。

之后，当我经常在下班之后收到工作上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地关注与图书相关的资讯，周末把稿件背回家审读变成家常便饭时，自己也就成为自己论文中描写的那种人。无论图书编辑听起来多么像一份脑力的劳动，实际上它却是一项实在的体力劳动。在连着几天的加班后，所谓的“抵抗意识”早被自己抛之脑后，心里盘算着的更多是如何在 deadline 之前完成任务。

多年前，自己期待这份工作时，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如今的心境和状态。从事编辑这项工作大概从我高中时就开始期待的，虽然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憧憬。而当我研究生毕业真的开始做这项工作时，想法和经验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起初，会困惑，我是谁。

当我回到高中母校，路过学校门口的教辅书店，看到紧靠进门的位置放了畅销小说的书架时，忽然回想起大概 10 年前我站在那个书架前的样子。一个西部地区 16 岁的中学生，一个对课外书有着强烈热衷的青少年，一个稍显被动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当年的我站在那里能够读到什么书并不是偶然的，背后包含着当年流行的作家和流行的风尚。10 年后，我来到上海，变成一个通俗小说或畅销小说的编辑，眼见一本书从稿件最终

成为样书的过程，我的过去和现在开始交合，重叠。是的，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一批人，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千里之外的一个少年在青春期读到什么样的文字。

于是，站在书架前的我，开始困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去影响他人，又凭什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将文字内容传递给另一个人？尤其是，纸张上印刷的文字，一经销售，它就与读者开始产生联系，产生的效果经常会溢出创作者和策划者的想象之外。

也是在这个时候，“大众文化”这个在理论中多次出现的概念，开始变得具体，它向我展现了一种具体可感的形式——庞大组织中的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自己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从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成为了大众文化生产链条中的一环。我开始看到这个词语中的产品和看到身处其中的人。

2、日常思考：被营销的佩奇与缺失的想象力

2019 年上映了一档名为《小猪佩奇》的春节档电影，比起电影本身更加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映前的营销活动：“啥是佩奇？”——一则以询问小猪佩奇是什么来展开的短视频。

视频中的故事是这样的：临近春节，独居在乡下的爷爷期待着儿子一家能够回家过年，爷爷满心期待地想要为一家人准备礼物，问到孙子想要什么礼物时，孙子回答到想要一个小猪佩奇，这是近两年在幼儿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动画角色。就在爷爷想要进一步询问关于小猪佩奇的细节时，手机的信号突然断掉了。年迈的爷爷并不知道佩奇是什么，于是开始询问身边的人，“啥是佩奇？”一路上遇到的人回答各不相同，闹出了不少啼

笑皆非的笑话，最终爷爷得知小猪佩奇是一只像鼓风筒的粉色小猪，于是用生火的鼓风机筒自制了一个小猪佩奇带给心爱的孙子。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这则视频却在发布后迅速成为微信朋友圈里的“十万 +”热点，不少年轻人纷纷转发，并附言“感动”，“想要同款佩奇”，“非常硬核”等等，起先看到那篇文章的标题“啥是佩奇”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把它当作朋友圈中“朝生夕逝”的热点话题一样掠过，甚至没有打开那篇文章。

直到后续朋友圈又被一轮以“啥是佩奇”的文化分析或者说文化批评的文章再次刷屏后，我才开始好奇，到底“啥是佩奇”。

在文化工业中“浸淫”后的我，认为这明显是借春节的团聚情节展开的一波营销活动，从活动效果上来说，非常成功。换句话说，我能够从营销的角度理解它为什么火起来。

它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亲情的感知，并在人们丰沛的归乡情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视频里爷爷对孙子感情，虽然有些笨拙，但十分真挚，所以能够打动人。代际之间的冲突被转化为温情的结尾从而被大众所接受，里面反差的笑料也足以打动一波消费欲和分享欲较为强烈的年轻人。在看完这则短视频后，我大有恍然大悟之感，它顺理成章地激发了我对《小猪佩奇》那部春节档电影的兴趣，并在春节回家时就和家人约定，可以带着喜欢佩奇的侄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

同时，这则视频也有很明显的问题。为了加强爷爷对“啥是佩奇”这个追问带来的反差效果，老人和年轻人、农村和城市、大众文化的传播性之间的差异在片中急剧扩大。

我所看到的文化批评的文章，其中部分观点也集中于此，认为这个短片仍旧在塑造着奇观化的农村。一篇文章将这种扁平化的想象的来源归结于“城市中产”，认为这种视频是在迎合“中产”对乡村的刻板想象。当我看到这个论点时，我在脑中快速地回溯了一下转发那篇文章的朋友们，他们其中多数和我一样，年龄相仿，受教育水平相仿，大概连收入也差不多，所谓的“中产”大概与我们一点也不沾边。而从营销活动的策划者、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我猜那群视频背后的年轻人或许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并非中产。“生产”出视频的那群人，在我看来，并没有特意地去迎合中产（中产这个概念本来就是有些语焉不详的，究竟是以文化认同划分，还是以年收入划分，一直都有争议），在流量时代他们的考虑或许是很“单纯”的：如何能够让这个视频好看好玩吸引人，能够引起人们的分享欲。

与其说是中产乐于接受这类想象，或者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在迎合中产精英的想象，或许更可能的原因是城乡关系的隔离。在智能手机时代，我们有再多的抖音，快手，不同世界的人依旧被数据隔绝着。视频中有些自相矛盾的表现也加固了这一层现实，爷爷在向同村的伙伴求助时，一个会使用智能手机看直播的同乡，却“没有想到”可以使用智能机中的搜索功能。最终爷爷是从在城里当过保姆的同乡人那里得知佩奇是卡通动画里的形象，但经历过都市生活的同乡也没有使用手机进行搜索。在视频的叙事中，使用抖音的人基本可以默认为是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的，但使用智能手机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地去使用搜索工具。这种叙事方式，有可能是制作者的想当然和下意识，也有可能是为了强调冲突而导致的叙事矛盾，毕竟如果此时手机的主人对着手机喊一句，“手机助手，啥是佩奇？”那么手机中的 Ai 助手协助搜索出来的网页图片就可以直接导致“全剧终”。

正是因为看到了大众文化产品背后“生产者”和“消费者”，我开始

对这种批评感到不满足，以往这些生产者在我眼中是铁板一块的，我也习惯用这种笼统的描述来理解。但当我身处其中的时候，再说迎合，我反而觉得有些不得要领。在迎合某种想象之外，这或许更是某种想象力的缺乏。

除了营销——也就是商业流量本身的限制之外（要求有强戏剧冲突感），它背后的创作者或许也生活在某种限制之中，他们的想象力或许本来就是不够充足的。就像我们接受到的一些稿件，对乡村的描述也有着不合情理的想象。他们自小生活在城市之中，免不了缺乏真正的身体体验。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背后本身的原因和限制是很复杂的。

我甚至在想，如果上述的批评成立，那么这种将批评对象简单化的倾向，甚至是带有二元对立式的解释，将话语体系的争夺，消费主义的狂欢之类的词汇作为标签加在他人身上，是不是也正在落入他们正在批评的那种思维方式的圈套之中？

除此之外，更令我困惑的是，在我的朋友圈里，第一天转发“啥是佩奇”和第二天转发文化批评文章的这两群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关，彼此之间的对话也就难以想象。

作为一个以前自以为借助理论可以了解、分析文化的硕士研究生，到现在切实参与在文化工业的链条之中的螺丝钉，对于以往学习的理论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例如，舆论如何被引导，舆论的走向如何失控，如何酝酿或者借用热点，如何引导所谓的“乌合之众”，所有新的旧的理论在眼前呈现、混合。

而我需要在这种流动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再次出发：不断重启的“自我启蒙”

如今我重新去看我在学生时期关注的问题，我与它的距离更近也更远。更近是因为我成为问题中的那个对象，更远是我转换身份之后必须拉开一段距离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在经历了工作上初期的不适应后，工作上逐渐变得得心应手。以往被培养的表达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乃至持续学习的能力都使我受益良多。照说对这种顺利，自己应该觉得开心。不过在开心的同时，会有另一轮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轻易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

我会为一个文案终于通过，一篇文章的转发数据很好，一本书在排行榜的排位上升而升起雀跃之情，而在这种时候偶尔也会与自己拉开距离，去审视自己究竟是在为什么而开心。不能让表面的数据来代替思考、代替意义。

我的认知也逐渐从“边缘”向“主流”流动，认可商业考虑，认可营销的价值。这也让我怀疑，自己的“主流化”的过程是不是太顺利了些？有时候也不是没有质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会问一些令自己难受的问题，写这些类似标题党一样的文章有用吗？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文化产品”吗？虽然后来自己也意识到尽管在图书的选择上，我们具有的主动性也很有限，一个选题的通过与否并不单单由那几个直接与图书有关联的人来决定。

如果将工作与学生生涯做一下对比，其中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到了自己想破罐破摔的时候，学生的校园生涯始终是有尽头的，自己总会拿到一张最终的考核试卷。但工作不一样，它并不是以暑假寒假为节点，

更没有所谓的毕业典礼。

我还记得去年毕业时，写给自己的寄语：

“25 岁，长进之一或许是，开始不再迷信很多东西。

恋爱、婚姻、学术话语以及无所归依的自由。

不去迷信意味着要费一些力气去跳脱去自己原本相信，或者想要依靠的东西。能够使自己完整的，不是去依靠女生的性别优势去摆脱独立的责任，去企望他人将自己从庸碌平凡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就算是我发自内心的喜欢对方也不能，除非我们彼此需要；不去相信某种话语、学派能够直指人心，能够挽救我走出迷茫、焦虑与虚无，能够以这种单一和精致去理解世界。

但我仍应该怀着偏见和热忱去拥抱生活与未来。我要抬起头，一步一步走下去。”

一年过去了，如今我来到书店，看到自己负责的书摆在了书架上，总是会忍不住伸手拿下来看一眼，然后再放回去。此时，我与它的距离如此之近，也如此之远。它将在书架上经受读者的检验，迎来或畅销，或被冷落最终沦为库存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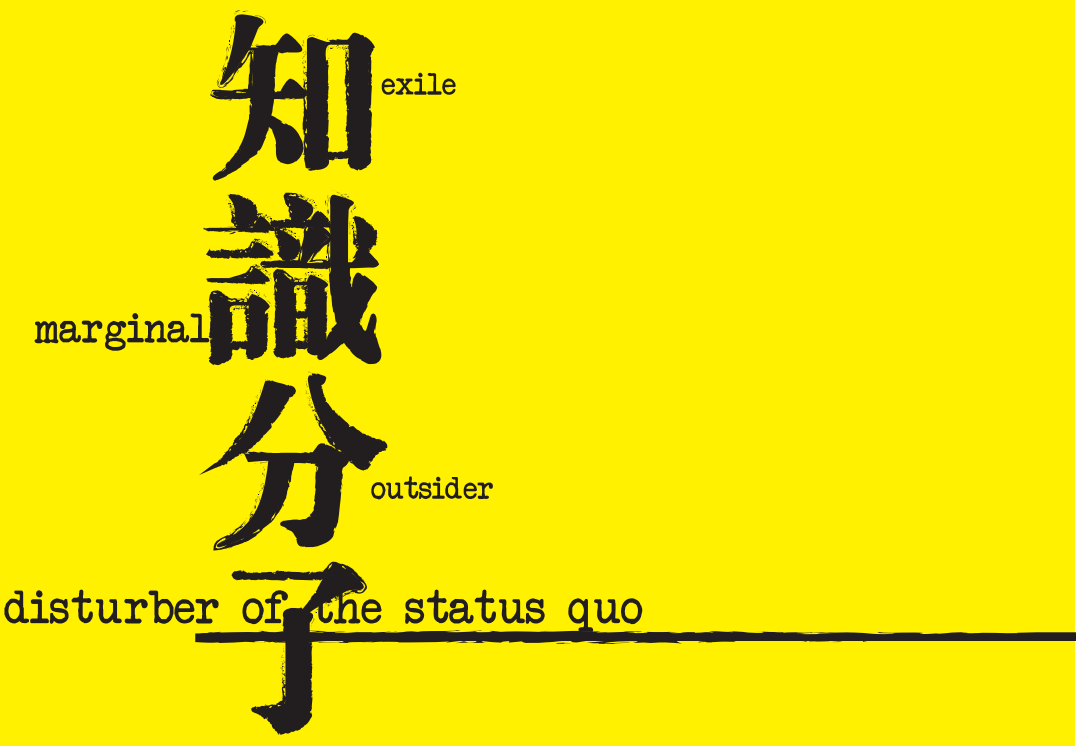
就目前来看，我试图拒绝丧，拒绝成为“社畜”，本着“自我启蒙”的精神，我依然想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要说对工作还带些理想化的初衷，我只希望自己能踏踏实实地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对每一稿文字负责，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得起作者，充当好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媒介，并尽量在所谓的市场考量之下尊重每一个创作者的努力和他们的表达欲。

返回目录

业余者小志

01 知识分子

发行 / 出版：Amateur 业余者（苏颖欣、吴小保、黄麒达、李志勇、卢姵伊）
地址：84c, Jalan Rotan, Off Jalan Kampung Attap, Kampung Attap, 50460 Kuala Lumpur.
美编：卢姵伊
电邮：amateursaid@gmail.com
印刷：Rumah Amok
发行日期：2017 年 7 月



業餘者宣言：為什麼要出版小誌 | 我們的知識青年在哪裡 | 馬來知識分子：傳統與當代挑戰 | 知識青年的出路：對談知識分子與華社 | 訪賽胡先阿里：學術政治兩棲的知識分子 | 沖繩經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 | 楊绛《我們仨》的時代側記 | 編後語：不是結束的開始

“业余者”：一群大马读书人的游离与驻扎

李志勇 *

现代社会强调专业知识的积累，我们需要熟识某个专业技术，才有可能安身立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虽然专业训练强调特定领域的学术互动和技能实践，但是我们的生活与环境各个层面环环相扣，甚至很多时候，大环境的变迁与冲击，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尽力改善，与它们进行对话。

然而对话一直是个艰难的过程。它涉及到不同视角、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立场观念的人群介入。彼此互相辩论碰撞，可能激起思考的火花，也有可能加剧矛盾的张力。此外，网络社会接受资讯虽然便捷，然而数量庞大紊乱，真伪难辨，群众往往缺乏时间沉淀厘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反而陷入碎片式阅读，导致表述平面化，知识体系零散。面对政治社会的变迁与日常生活的难题，我们不禁思考，所谓的“读书人”拥有什么角色？在学术体制内的专业学者能否回应当下难题？抑或，知识分子能否在学院以外发挥其作用？

“业余者”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亦如《知识分子》当中刊载的《业余者宣言》所言：

近十年来，马来西亚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变化，从2008年意外促成的政治海啸，掀开群众对改朝换代的热诚与行动后，却在2013年“505换政府”口号响彻云霄之后突然暗淡下来。

“业余者”正是在这样的低落氛围中，于2016年4月创立，成员都曾怀抱改变信心，也曾为攻顶失败而失落。但我们相信，改革不是一时三刻的事，而是长期耕耘的结果。因此，正当政治运动——在此且把它理解

* 李志勇，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为有关促成政党轮替等的选举制度改革——处于低潮之时，我们更没有理由抽身离去，等待下一个改革机遇从天而降。恰恰相反，这时我们应该积极地思考，如何把已经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留下来，让文化与知识运动维持着群众运动的动能。

“业余者”的名称源自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业余者，不为利益或奖励所动心，只是为了喜爱、兴趣和良心去从事知识工作，而不受限制于狭隘的“专业”或行业标准所束缚。“业余者”不是由专家组成，而是几位想提出困难问题，回应及突破马来西亚现状的搅扰者，希望以阅读、讨论、书写、实践，来连接众多反霸权体制的有机力量，以知识及行动发出抵抗的声音。

2016 年，“业余者”成员源自几个办读书会的朋友，他们在阅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想要回应近十年马来西亚的现状和议题，尤其关注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困境。“业余者”当然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而仅是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学徒，并且念兹在兹的疑问是：身在马来西亚，未必受过良好和专业学术训练的“读书人”，到底在当今马来西亚社会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2017 年，“业余者”、“之间文化实验室”和“区秀诒工作室”在吉隆坡甘榜亚答（Kampung Attap）藤街（Jalan Rotan）的一个活动空间，成立“亚答屋 84 号图书馆”。在这里，三个组织进行着文化研究、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知识领域的书籍和观念交换，也同时是阅读、讲座、工作坊、读书会、出版以及研究者和艺术创作者进驻的场域。这个阶段的“业余者”也添入几位生力军，形成一小群集合人文与社会科学训练背景的“读书人”，尝试在马来西亚推动阅读和知识的交流。

“业余者”因此紧扣社会当下的时事议题，尝试进行不同形式的活动。比如“业余读书会”旨在聚集愿意思辨与分享的青年，系统性阅读思想

论述。这系列活动曾经阅读孙歌《送别沟口雄三先生，1932–2010》以及《鲁迅的绝望与历史——读竹内好的 < 从绝望开始 >》，探究日本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与叩问；也曾阅读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思考华语语系研究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的价值和影响。此外，“业余者说”和“业余聊天室”则是较常举办的活动形式，前者邀请学者文人和各领域人士主讲，后者往往针对某个议题让与会者交流，形成聊天讨论的平台。“业余影院” 则选择从影像角度捕捉社会万象，从播放的电影和纪录片引导观众讨论相关议题。虽然“业余者”成立时间不长，但尝试涉猎的议题不少，包括知识分子、性少数、移工、左翼历史、抗争艺术、报刊媒体等课题，希冀营造多元的讨论氛围。

除了读书和各种讨论，“业余者”认为文字的记录和表达也很重要。文字既可以承载更深入的思考，也可以跟吉隆坡以外的各种人士进行对谈交流。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之下，组织成员开始筹备小志（zine），在 2017 年和 2019 年分别出版《知识分子》及《进击的青年》。这些小志从构思、撰写、编辑、排版、设计到印刷，都是组织成员的创作实验。他们希望通过小志传达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

第一期小志《知识分子》想通过探讨相关课题，尝试对“知识分子”提出规范性概念，也认为知识分子的批评与实践应该相辅相成：“在我们看来，知识分子必须面向群众，参与各种公共课题的讨论或活动。但不仅于此，他们也必须对‘当代’提出批判性的见解，并介入到实践之中。”

在《知识青年的出路：对谈知识分子与华社》一文中，曾剑鸣和苏颖欣讨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当中的知识分子，包括他们在什么背景之下被催生，他们的论述资源来自何处，以及时下青年与这种身份渐行渐远的问题。谈及知识分子今后的任务，曾剑鸣认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每个世代都需要厘清自己与时代的关系，批判和思考既是继承历史脉络，

也要契合当下环境做出转化，并且在追求理想之际，具备对现实世界的复杂理解。苏颖欣则认为，知识分子需要制造和重建发言的平台与环境，传达主流论述之下被忽略的信息，也需要确定自身在众声喧哗之中，依旧保持清醒的判断。

《学术知识两栖的知识分子：访赛胡先阿里》一文则通过理解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的实践和思考，勾勒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面貌。赛胡先阿里在八十年的岁月中，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他曾是马来亚大学教授，也曾积极参与政治。他研究尖锐、深刻的思想与现实问题，著作等身，也坚守跨越族群与阶级界限的公平与公正原则，积极地关心社会议题。在访谈中，赛胡先阿里分享自己的学习历程，政治生涯的感悟，以及自己对马来西亚现况的看法。虽然经历许多风雨，赛胡先阿里坚信困境肯定会有改变，强调年轻人必须勇于表态、改善社会、维护正义。

种种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都指向国家新生代，认为他们是未来的希望。这导向“业余者”策划第二期小志《进击的青年》。如导论提到，“青年”总给人两种相对的印象，“（一方面是）新鲜有活力的、令人期待的；另一方面，则是轻率不成熟的、应被教训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一般人将青年对象化的原因，而鲜少进一步挖掘青年主体在思想和行动上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面对模糊不清的青年主体，小志正是以此为切入点，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思考各类青年在马来西亚面对的状况，以及青年“进击”的姿态。

这期小志向马来语和英语圈的朋友邀稿，他们参与发起的组织和“业余者”有相似之处，都希望通过知识讨论回应种种社会问题。雷智宇（Zikri Rahman）是游击读书组织“街头书坊”（Buku Jalanan）的共同创办人，他和苏颖欣就青年定义、青年的社会角色和政治现状等课题对谈。张李建（Teo Lee Ken）是社运组织“青年马来西亚”（Malaysia

Muda）的创办人之一，他们为纪念左翼反殖的“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创立 71 周年而成立，盼能延续青年抗争的火焰。Imran Rasid 则来自“想像马来西亚”（Imagined Malaysia）这个关注历史论述的青年组织，这次撰文论述象征崭新未来的青年，他们和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如何以去殖民视角反思历史。陈子豪（Tan Zi Hao）的组织“抗争中的学生”（Students in Resistance）自资出版多期小志，免费派送，强调学生的政治参与。他在文中也梳理了“学生”和“青年”的不同意涵。

小志的主题往往是组员闲聊之中“集思广益”而成，内容策划则离不开几个大方向。首先，小志的主题必然是组织成员所关注的，尤其较为游离焦虑的社会身份，比如知识分子或青年，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张力。其次，每一期小志都尽量收录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文章，从中展示不同族群的表述和思考，呈现多元文化的讨论面向。第三，前辈人物的访谈是小志重点，通过这些人物的表述、实践和追忆，或还原一些模糊淡忘的历史背景，或提供一些扎实广阔的思考视角，作为借鉴和启发。

“业余者”的成员，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依旧学而不精，面对社会议题也无法及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只是想通过阅读、思考、讨论和记述，充其量当个“搅扰者”，松动庞大的、僵化的、模糊的历史叙述与现实难题，并尝试营造多元思想和视角碰撞的交流平台。这群“读书人”在象牙塔与市井之间游离，也沿着各种议题驻扎探究，结交各路好汉，也留下思想轨迹。这种种事迹，是“业余者”自身的摸索与成长，也希冀这些积累能够为社会带来新的气象与格局。

马来知识分子：传统与当代挑战

吴小保 *

知识阶层的出现，有赖于养育它的土壤。在传统马来社会，这土壤指的就是宫廷。由于宫廷掌控了绝大部分资源，知识阶层必须依附于它，才有可能兴起、延续与发挥影响力。然而，相对于封建社会以宫廷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代社会的情况略有不同，尤其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各领域，在理论上被认为有着相对自主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从这一面向看，马来知识阶层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经历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此转型的描述，能够让我们掌握、并理解该知识阶层所面对的当代挑战，以及根植于其生存土壤上的局限性。

马来封建社会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构成，前者由统治者与贵族组成，后者则由平民与奴隶组成。在传统的封建价值观中，政治是统治阶层的玩意，平民、贱民、奴隶等一概无权干涉政治，否则就是侵犯统治阶层的权力。这样的观念，制约了平民透过形成群众力量来捍卫自身权益的可能性。其结果是，被解除政治能力的平民阶层，只能任由统治阶层鱼肉。

签下卖身契约的平民

从马来文献《马来纪年》的记述来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当

* 吴小保，亚答屋与业余者成员，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初所签订的契约，已暗示了两者之间不平等地位。根据传说，Sang Sapurba 与 Demang Lebar Daun 所签订的契约内容是，人民不能背叛统治者，即便后者是多么地残暴；反之，统治者不能以粗言秽语来侮辱其子民，如若人民犯错必须处以极刑，也须以合乎伊斯兰教之法规处之。就后者来说，某程度上算是一种退化、缩水版的“法治”，但却远远无法约束权力膨胀的统治者。根据学者分析，《马来纪年》的契约概念，尽管套用了伊斯兰教法规的说辞，却忽略了君民之间的正义与义务关系，因此违背了伊斯兰教义。

无论如何，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难把《马来纪年》归类为史书，因为它涵盖了大量的奇幻内容，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书写的规范。但作为文献，我们却可以从旁推敲，即便这份契约不曾存在，但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无疑是当时的统治者所欲提倡的。这样的不平等契约概念，我们不妨把它当作“卖身契约”看待。

毫无疑问，平民在这样的卖身契约之下的命运是相当凄惨的，权益完全遭到否定，并被无情剥削与欺压。

十九世纪，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师阿都拉（Munshi Abdullah）从新加坡到半岛内陆一游，留下了他对马来封建社会的犀利批判。根据学者分析，不像西方国家，马来封建社会不存在自由城市，因此被压榨的人民无法轻易找到庇护所，也无法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凝聚起来，形成反抗的势力。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殖民管辖下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却有着相对自由的经济与政治风气，扮演了类似自由城市的角色。来自马六甲、新加坡的文师阿都拉，正是一位在当时感染自由风气的知识分子。

阿都拉对马来封建社会的批评，包含各个方面，如食古不化、吃人的礼教（adat）、统治者的残暴等。值得注意的是，阿都拉在当时注意到内陆马来社会的普遍贫困现象，而这与当地马来人的懒散有直接关系。然而，阿都拉却不轻易地把懒散视为起因，因为按常理，不可能举国之民皆尽懒散之徒。他敏锐地察觉，人民之所以懒散，乃因为其人身与财产在封建社会下毫无保障。任何人，如果勤奋耕耘，所累积的财富，很快就会引来权贵的觊觎。在此情况下，勤奋反而会招惹杀身之祸；维持懒散、乐天知命的态度，才能明哲保身。故此，内陆马来社会由于缺乏诱发人们奋斗的因素，导致经济萧条，百姓生活贫困。

很显然地，长期身处殖民地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阿都拉，理解到法治、财产权等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这也是后世许多学者所强调的观点——西方世界之所以富裕，乃与财产权制度的建立、维护与完善化有关。

马来封建社会之下的平民，正是如上述所言般，被统治阶层鱼肉、糟蹋，且被禁止参与政治，无力反抗，只能听天由命，或逃离到他方，但一旦被捕获，就是死路一条。

来自草根的反殖民知识分子

然而，这样的社会结构，随着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末的扩张，出现了变化。在英殖民统治时代，各种现代制度、规章、知识与思潮涌进殖民地。除了这些外在因素，知识分子个人的意志，他们对理想社

会的憧憬以及行动力，都是带来变化的内在因素。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落败，促发近代中国的大移民浪潮，许多人飘洋过海，在马来亚上演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下南洋”剧目。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各土邦与英殖民也从印度引进大量劳工。这不仅为马来亚带来大批生力军，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文化生态与政治的秩序。

这种局势的改变带来两个后果。首先，殖民地经济并未给底层马来人带来多大好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达，并没有促成马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至于马来贵族，则成为殖民者的勾结共谋者。因此，没有群体能挺身而出捍卫马来平民的权益。

移民人口剧增的第二个后果是，由于马来人遭到边缘化，加上外来人口节节攀升，大有超越本地人口之势，引发了民众的忧患意识，促使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过去平民不该参与政治的封建观念逐渐被动摇。这种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人们告别过去以宫廷为政治文化中心的运作模式，开始以“社会”为中心。一般论者称此过程作“去封建化”。

除此之外，殖民地政府创办的英文和马来文教育源流，分别培育了亲英和反英的马来知识阶层。前者如江沙马来学院，这所贵族学校专门为殖民地培育行政官僚。后者则如丹绒马林的苏丹依德里斯训练学院，目的是培育马来平民阶层子弟成为马来教师。

这批草根子弟在当时接触了大量印尼书报，受到印尼政治思潮的冲击，催生了大马来由（Melayu Raya）的民族主义。他们深信殖民者夺走了他们的国家，这是马来人受苦的根源。因此，反殖民主义，并争取与印尼共同独立，是当时殖民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然而，由于平民不得干涉政治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二战之前，平民马来知识分子仍然无法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太大影响力。换言之，此时平民马来知识阶层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破封建观念对民众的束缚，把他们动员起来。

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现代教育的普及化、外来思潮的输入等，二战后马来群众成功被动员起来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 1946 年反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抗议行动，该次政治行动催生了后来的巫统，后者以马来人捍卫者自居，统治马来亚、马来西亚长达六十年，迄今其执政党地位仍然稳如泰山。

当代挑战：政治的败坏

然而，尽管马来社会成功被动员起来，却迅速地被民族主义政党给绑架，使得群众无法清楚地辨别国家、政党、社会、个人等不同的利益。

独立初期，东姑阿都拉曼政府的亲英政策引起马来社会高度不满，最终在 1969 年遭到选民的惩罚。为了挽救政权，继任首相拉萨重新改造国家体制，并改写民族大叙事，以合理化、正当化其统治基础。

从 1970 年代开始，执政党国阵（Barisan Nasional）扩大政府职能，为土著提供各种福利和服务、把马来人吸纳进官僚体制、透过新经济政策栽培马来民族资产阶级等。由此，国家、政党与马来人形成了同一阵线的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国阵透过选举舞弊、滥用恶法、打压异议分子、收编知识分子、破坏司法等，一步步地摧毁针对国家权力而设计的制衡机制，如民主问责制、法治等。

以上的管道得以实践，当中关键乃是非马来人的存在，特别是以华人为主要假想敌。透过民族论述，执政者强调马来人大团结之必要，否则将被华人所欺压或消灭。故此，为了维护利益共同体，马来民众对国家制衡机制的退化与堕落，必须要有一定的忍耐，否则马来民族主义政党的沦陷，就意味着由政党串联起来的，马来人的社会、资本与国家等单位组成的共同利益连锁，将会被解除。

以上，是国家由上而下明示暗示、由被体制收编的知识分子涂脂抹粉、并获得社会由下而上认同的民族大叙事。

另一个社会契约

如此的民族论述，可借独立时期的社会契约加以阐述。

独立后的马来亚，从英殖民手中接管了相对完整、稳定的官僚体制，在国家打造方面并未面对太大的困难。但是在往后很短时间内，殖民者的遗产很快就败坏了。如前所述，民主问责制、法治、有效的行政单位等，全都成为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者的私有工具。另一方面，这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在独立初期就因为语言、文化、宗教等的多样化，碰到了国族打造的难题。

应该如何建构新的国族身分，在独立前就引起很多讨论，而在各种争论中取得妥协的，则被视为是各族共同议定的社会契约。正如学者们指出的，这份社会契约的内容在不同时候被赋予不同面貌，例如宪法第 153 条文逐步从过去的“扶弱”转向现在的“特权”。

如果说《马来纪年》的社会契约是一份“卖身契”，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是绝对王政，而这是马来人在封建社会时期的苦难根源。那么，

独立建国后的这份社会契约，则是“马来主权”的意识形态，强调马来人在捍卫其主人地位时必须大团结，从而放弃对其他权益的追求。

因此，尽管马来社会从封建走向现代，告别了以宫廷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却在转身那一刻，不小心掉入另一个深渊。在此，马来人被喂养以民族主义大义，尽管比过去多了一点利益，却仍然任由统治阶层鱼肉，被利用与出卖。更甚的是，吃此苦果的不仅是底层马来人，还包括其他不同的族群。

因此，如何把捆绑着国家、马来人、宗教团体、政党等的连环扣给解开，是马来西亚民主转型的其中一个关键所在。而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挑战。

返回目录

业余者小志

02 进击的青年

发行 / 出版：Amateur 业余者（苏颖欣、吴小保、黄麒达、李志勇、卢姵伊、刘华丹）

地址：84c, Jalan Rotan, Off Jalan Kampung Attap, Kampung Attap, 50460 Kuala Lumpur.

美编：卢姵伊

电邮：amateursaid@gmail.com

印刷：Rumah Amok

发行日期：2019 年 1 月

目录

啊，青年！ / 业余者

殖民地青年的诞生 / 吴小保

我们这一代青年 / 苏颖欣

文学青年：测试马华文学的土壤 / 卢姵伊

谁怕大马青年？ / 苏颖欣 X 雷智宇 Zikri Rahman

The Struggle for a Young Malaysia 为青年马来西亚斗争 /Teo Lee Ken

Pemuda Pembebas Sejarah 解放历史的青年 /Imran Rasid

Students in Resistance and Youth Politics: A Reflection 反思抗争学生与青年政治 /Tan Zihao

文学青年的养成与沉淀：访问张景云 / 卢姵伊

1114 学潮：一甲子的记忆、口述历史与感想 / 林士妆

啊，青年！

业余者 *

“业余者”于 2016 年 4 月成立于吉隆坡。萨依德（Edward Said）说，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业余者，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兴趣和良心去从事知识工作，且不受限于狭隘的“专业”或行业标准束缚。“业余者”是几位想提出困难问题回应及突破现状的搅扰者，冀望革新失衡的知识结构，将知识从学院体制释放至民间，与运动及生活连结；更是在反智的时代找到相信知识的途径。社会变革需要知识的积累，虽缓慢但深远。业余者通过阅读、讨论、书写、实践、行动，来连接众多反霸权的有机力量，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我们定期举办讲座、论坛、读书会、电影分享会等。

业余者在 2017 年 7 月出版第一本小志《知识分子》后，终于迎来第二本《进击的青年》。这次，我们更直接面对切身的问题——身为青年，身为马华青年（重要吗？），在当今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自己的知识构成和实践？

马来西亚迎来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但今年 509 大选的结果无不令人感到意外。当人民为自己投下的一票起了如此大的作用而感到兴奋之余，我们不禁思考这样的“意外”之感从何而来，和十年前 308 政治海啸的“意外”有何不同。

* 李志勇，业余者与亚答屋成员。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目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卢姵伊，毕业于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目前任职出版社编辑，亚答屋与业余者成员，在《什么？！诗刊》打杂。吴小保，亚答屋与业余者成员，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苏颖欣，亚答屋与业余者成员。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博士后研究员，关注东南亚文学、历史与思想。黄麒达，马来西亚不入流学府中文辩论社教练，耕耘读书会，亚答屋和业余者成员。刘华丹，一位怕毕业即失业的人类学徒，目前在吉隆坡从事影像行业，也是亚答屋和业余者成员。

大选来临前，业余者惭愧地发现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当下情境，更罔论分析现象和问题，突破僵局。我们自然不敢视自己为知识分子，仅是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青年。因此，在关键时刻没足够能力为社会提供思想的准备（甚至自己也未有思想的准备），是我们力有未逮。这一本小志的延宕出版，或许亦是让我们借机好好思考政党轮替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青年介入社会的方式。

不把青年“对象化”

“青年”总给人两种相对的印象：一是新鲜有活力的、令人期待的；另一方面，则是轻率不成熟的、应被教训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一般人将青年对象化的原因，而鲜少进一步挖掘青年主体在思想和行动上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因此，青年总被视为一个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对象，或是被一厢情愿地想像成一个自然饱满的集体，因此面目模糊。

这本小志旨在回应这个问题，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思考各类青年在马来西亚面对的状况，以及青年“进击”的姿态。他们是文学青年（拒绝消费“文青”一词的文学爱好者）、社运青年（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的“愤青”）和知识青年（仍相信知识的社会实践意义的“知青”）。

吴小保以早期马来民族斗士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kob）为例，讨论“殖民地青年”的特殊性，尤其提出殖民地语言和教育政策的影响。苏颖欣试图分析青年的愤怒和烦闷，提出对十年的“Bersih世代”在改革理想上的反省和期许。卢姵伊则指出马华文学生态的问题，尤其青年写作者在文学奖和文学营“光环”下，应该如何深刻面对自己的创作内容和关怀。

连结马来与英语组织

与上期不同的是，这期小志请来马来语和英语圈的朋友共同思考青年问题。他们参与发起的组织和业余者有相似之处，即希望通过知识讨论回应种种社会问题，强调青年知识人在地的、行动的实践。雷智宇（Zikri Rahman）是游击读书组织“街头书坊”（Buku Jalanan）的共同创办人，他和苏颖欣就青年定义、青年的社会角色和政治现状等课题对谈。张李建（Teo Lee Ken）是社运组织“青年马来西亚”（Malaysia Muda）的创办人之一，他们为纪念左翼反殖的“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创立 71 周年而成立，盼能延续青年抗争的火焰。

Imran Rasid 则来自“想像马来西亚”（Imagined Malaysia）这个关注历史论述的青年组织。青年总是象征崭新的未来，但他们和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如何以去殖民视角反思历史？陈子豪（Tan Zi Hao）的组织“抗争中的学生”（Students in Resistance）自资出版多期小志，免费派送，强调学生的政治参与。他在文中也梳理了“学生”和“青年”的不同意涵。另一方面，曾访问多名亲身参与 1957 年学潮抗争者的林士妆，也分享访谈经验和自己的思考。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受访者们，如何记忆一甲子前的抗争历史？

业余者小志十分重视访谈，因此在今年初访问了马华诗人、文化人张景云先生，听他分享自己青年时期的文学养成和阅读经验。张生写诗、散文和评论，他担任本地报章总主笔时引领的文化和政治评论水准，是 90 年代马华学院体制外思想界高度的标杆。小志的体积原来无法承载这四个小时的访问内容，但我们还是希望尽量完整地将它呈现在读者眼前。

漫画《进击的巨人》里尤弥尔说：“等我再度醒来时，在我面前呈现的是无限的自由。若世上真有所谓的命运，我也只能放声笑看命运的无常。但那时我对自己许下誓言，再也不要说谎，永远不再欺骗自己，要诚实的活下去。”

进击的青年拥抱无垠未来，同时也向自己许下要诚实活着的诺言。谢谢你拿起这本小志，希望你会感受到我们 DIY 把它生出来的用意。

n. n. n. n.

2019“n 地域”投稿指南

2019 年，“n 地域”将征集围绕以下话题的稿件：

“财务处的故事” 在一轮又一轮的制度改革中，各类“奇葩”的高校报销规定，持续出新，变本加厉，构成了今天学术发展的巨大障碍。“n 地域”，不仅是要将这些规定记录在案、立此存照，以待未来 IT 考古学的研究，更希望由此引发现世的讨论：对于中国而言，今天的“经济基础”——财务经费，究竟如何决定了上层建筑——不仅是思想和知识的生产，更是对学院中人的再生产？

“国际化的，更国际化的” 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莫不以“世界一流”为旨规，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程度。中国大学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与之相伴随的一个新颖现象是，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出台规定，凡是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会议，一律不算国际会议。这个新颖而吊诡的现象提醒我们，“国际化”在今日之中国，早就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定解，而是“俱分进化”为一个极具时代特点的混乱词语。记录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学术交流、留学观光、“外国人”，将有利于我们更整体性地思考，究竟什么是这二十年来正在形成的中国人的“国际化”和新的国际视野。

“青年与工作” “青年人如何工作？”“如何通过工作走出自己的路，找寻未来？”是现代社会的常设话题。只是，倘若对照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一路陪伴人们的成长小说，便会发现，这个老话题，正面临新的社会状况和青年人自身变化的最为强烈的冲击。这不光是指，在互联网、弹性工作制、（伪）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的或可能的制度设计中，青年人正面临看似越来越多的选择 / 限定，也是指，青年人越来越将自己细化为“** 后”，企图以公元纪年来标示或凝结自身对于工作、生活乃至未来的基本态度。当国家和社会企图用“匠人精神”来填补漏洞百出的现代工作伦理的时候，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定义和想象“工作”已经成为争夺文化霸权的焦点所在。“n 地域”企图记录文化研究的师傅和学徒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和思考，期待由此展开更多样的线索和探讨的可能。

“学以致用” 2019 年的“n 地域”，将在访学交流积累的经验之外，试图展开另一方向，即征集在学术体制之外展开文化研究，从而“学以致用”的各色经验。如果说，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文的话，那么，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学习，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的那些文化研究的“种子”，正在如何发芽、生长和结果？它们如何展开和不同行业的对话和角力？如果说，文化研究不是一味的理论和情怀，而是希望和现实短兵相接的话，那么，散播在各行各业里的这些实战经验，如何被呈现、讨论和思考，并成为文化研究在学院建制之下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和鲜活刺激？当学院体制里的空间日益缩小，变得越来越和其他行业一样的时候，这样的积累，既是对于之前文化研究的正视和修正，也是后续进步必须澄清的现实条件。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1 本刊为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议题的文化研究类刊物。这一立足，不仅是指聚焦于中国的当代性，关注中国问题，解析这一快速变动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更是指，在“亚际”、“第三世界”、“全球”等这一系列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框架的选择和比照之下，重新放置和结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议题。

2 为保持文化研究的野气和灵气，本刊对来稿有两个“不在意”。一，不在意是否一定写成论文模样，欢迎以生动、恰当的文体形式，呈现“问题意识”和清晰思考的文字。二，不在意是否一定是首发稿，提倡各个友邻刊物和网站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推广。

3 在此共识之上，本刊欢迎各类来稿，来稿请注明是否首发。凡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其中，“专题”一栏为特约组稿栏目。如有专题的组稿建议和想法，欢迎来信，来信请注明“专题”字样。

4 来稿请用word文档发送至《热风学术（网刊）》邮箱（refengxueshu2017@163.com）。本刊会在收到稿件的一周内确认收到投稿；并于收稿后一个月内，回复作者是否用稿。

5 来稿一经录用，除在本刊刊登之外，也将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及其微信公共号陆续发布。同时，本刊拥有授权友邻刊物和网站共享的权利。

封面故事：《加班》

小 G 没想到家里的电脑突然出了故障，卡顿得厉害，平时一小时能搞定的表格，现在已经盯着屏幕两个小时了，却还是只做好了一半。小 G 有点着急，尽管是周末，但是明天孩子的学校还有活动，肯定是大半天都无法脱身的。如果等活动结束直接去单位加班，估计又要到晚上——去单位加班倒是会有加班费，但是小 G 不愿意牺牲难得的周末时间，即便是加班，在家不仅舒服一些，还可以随时照顾孩子，这大概也算是某种自由？一种周末需要加班，但是可以在家完成的自由，而代价则是做一个免费劳动力，并且是一个深夜面对电脑生着闷气的免费劳动力。她和朋友在微信聊天抱怨，朋友半是建议半是开玩笑，不如去网吧做好了，网吧网速快，肯定一下就搞定。小 G 苦笑，我们家住得偏，附近哪有什么网吧？算了，明天去找附近的朋友借台电脑吧，或者，实在不行也只有去公司。

和朋友聊完，小 G 正打算合上电脑，明日再战，却突然想到公司的新规定，如果要去公司加班，需要填报加班申请单。明天去不去公司呢？小 G 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打开了公司系统的登录界面，再打开申请单——这个简单的操作，又花去了至少两分钟，小 G 硬着头皮填好了全部信息，又核对了一遍，然后提交，退出系统，关机。

终于可以睡觉了，小 G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她想起前段时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996ICU，当时她还出于好奇浏览过网站提供的企业黑名单，那里面没有自己公司的名字。小 G 想，大概是这样的公司太多了，黑名单又怎么能穷尽呢，再说，自己毕竟只是月初月末忙一阵子，周末虽然要加班，但至少可以选择在家里——都怪这台破电脑，明天可能还要去公司 ..... 这些零碎的念头慢慢淡了下去，在夜晚 12 点之际，小 G 终于入睡了。

主　　编 _ 罗小茗

学术编委 _ 包宏伟　Fran Martin（澳）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韩）　王智明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王欣然　美术编辑 _ 刘 睿　编辑助理 _ 李许涛

《热风学术（网刊）》来稿邮箱　refengxueshu2017@163.com

本刊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5 日上线。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 – 非商用 – 非衍生 – 保持署名。

请登陆“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下载《热风学术（网刊）》。

热风学术周刊

扫描二维码，回顾往期。